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 年创刊　双月刊
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176 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金焱

委　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池田大作（日本）　窦秀艳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谭好哲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吴义勤　钟永光　周　潇

主　编： 孙继国

副主编： 冯济平　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2

东南学术

4

双月刊

总第 176 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周海波 · 1 ·

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与文学研究(下)　关爱和 · 14 ·

□ 金融研究

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贺立龙　刘雪晴　董子立 · 46 ·

企业金融化的收入效应

——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孙维峰　姚泽辉　孙华平 · 58 ·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

——来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证据　吕勇斌　文　琳 · 70 ·

□ 管理研究

质疑、反思与深耕：案例研究的价值维护与类型划分　王　刚　张　玲 · 85 ·

期刊基本参数： CN37-1216/C * 1988 * b * A4 * 156 * zh * P * ¥10.00 * 1200 * 12 * 2022-07

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型学考察及其治理策略　　李慧玲　陈洪连 · 96 ·

富则思安与富而思进：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王克稳　于岩平 · 106 ·

□历史研究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崔明德　王　硕 · 117 ·

□语言研究

介词认知语义模型及语法化机制　　崔云忠 · 129 ·

近代日本敬语政策的嬗变及其影响　　洪仁善　姜言胜 · 142 ·

金融与艺术的融合

——《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评介　　胡金焱 · 155 ·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未授权任何机构受理稿件。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4th Issue for 2022

Literary Anxiety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 Zhou Haibo (1)

Chen Yinque'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Literary Research (Part II) ..... Guan Aihe (14)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 He Lilong Liu Xueqing Dong Zili (46)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ity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on Employee Income
Based 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Sun Weifeng Yao Zehui Sun Huaping (58)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Governance: Evidence of Disputes
over Rural Land Contracts ..... Lyu Yongbin Wen Lin (70)

Question, Reflection and Delving: Value Maintena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ase Studies
..... Wang Gang Zhang Ling (85)

Typology of Ethical Anomie in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Its Governance Strategy ..... Li Huiling Chen Honglian (96)

Contentment with Wealth and Progress Driven by Wealth: the Curvilinear
Impact of Positive Performance-Aspiration Gap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 Wang Kewen Yu Yanping (106)

The Though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Southern Qi ..... Cui Mingde Wang Shuo (117)

Cognitive Semantic Model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Prepositions
..... Cui Yunzhong (129)

Evolution of the Policies on Honorifics in Modern Japan and Its Contributors
..... Hong Renshan Jiang Yansheng (142)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Art -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Finance and Art's Integration ..... Hu Jinyan (155)

英文翻译：岳玉庆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周 海 波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文学史; 重构; 文学性焦虑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01-13

1930年,钱基博出版了引起广泛争议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中,钱基博首先区别了文学与文学史,认为"文学史非文学",文学是文学的,其"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者,科学也",其"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所以,文学史的撰述应当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文学史属于"科学之范畴也"[①]。将文学史区别于文学,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史的一般性认识,能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而认为文学史是科学的,客观的,则未必能得到人们的完全赞同。这里的问题在于,叙史者可以对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少加或者不加臧否,但却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客观。文学史家的选择与叙述,总会以不同方式带上叙史者的个人情感与文学观念,带有是非评判的价值观念。稍早出版的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在讨论"何谓文学史"时说:"文学史,是全部历史中间的一部分。凡是已经过去的事实都称为历史。所以文学史就是关于文学的已经过去的事实。"同时他又特别指出:"文学史,一方面是历史中间的一部分,一方面又是文学中间的一部分。"[②] 胡怀琛承认文学史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文学史的撰述当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的文学位置。胡怀琛的观点在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着文学界、学术界对文学史的基本认识。

钱基博和胡怀琛在其文学史著述中所表达的文学史观,透露出如何认识文学史,如何把握文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体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研究"(17BZW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海波,男,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4页。

②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页。

史著述的科学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叙述文学史中的文学性问题。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所谓文学性立场也正是史家以自己的方式对文学历史开展的一种认识与写作。

一、“重写文学史”的文学性诉求

“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化思潮,主要包括钱理群等学者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与论争,各种新的作家位置排名和作品重读等一系列文学事件。重写文学史不仅确立了新的文学史坐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确立了新的范畴,对于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构建了新的历史框架,而且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重新认识和知识分子参与社会重大文化变革的进程,尤其对于随后而至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

“重写文学史”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以切实的材料补充或纠正前人的疏漏和错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借以“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在倡导者看来,“正常情况下,文学史研究本来是不可能互相‘复写’的,因为每个研究者对具体作品的感受都不同,只要真正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重写就是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立场上对历史的重新打量,并试图回到并接近历史的真实。重写的本身就是探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在这种历史反思中,给予“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刺激”。[①] 重写文学史既是对新文学的重写,也是对当代文学的重写,是借文学史的讨论表达对一种文学性缺失的“焦虑”。对新文学的重写是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文学坐标,对当代文学的重写则是为新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经历了两次重要的“重写”。一次是对文学思潮及其作家作品的“拨乱反正”,对那些从文学史上消失的作家作品进行平反,如丁玲、萧军、艾青、胡风、冯雪峰等。当然,这种平反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即对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文学史地位的恢复,较少涉及文学层面上的问题,没有真正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确立这些作家的地位。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认识和学科意识的强化,当文学界基本完成了部分作家的政治平反之后,开始着手文学史的重新确认。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一些作家文学史地位的重新确认,如对胡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施蛰存、张爱玲等作家,人们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恢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二是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如对茅盾、赵树理等作家的作品,对那些过去在文学史上居于重要位置的作品,开始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重写的问题。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重写文学史是一次不可忽视的文学性自觉。在这方面,包括随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人文精神、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潜在写作、无名与共名、民间性等学术话题,都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和书写新文学史的

① 参见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问题。在这里，人们不再是一般性地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重写，而是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高度，重新寻找那些制约中国文学发展的要素，把中国新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追求，成为一代学人的学术情结和精神体现。不可否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于 1980 年代初与新时期文学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来说，其文学与文学史的知识结构显然停顿在相对偏狭的空间，文学性的焦虑成为批评家和学者们在追求文学女神的脚步时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在随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界又迫于那个疯狂奔跑的现代性问题，似乎忘却了文学自身的问题。在 1980 年代的一代人意识中，所谓文学性往往是那些具有社会特征的文学作品，是以文学干预社会生活的某种文化现象。今天再来回顾 1980 年代初期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无论对《班主任》《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还是《本次列车终点》《布礼》《蝴蝶》《芙蓉镇》《李顺大造屋》，或者曾经轰动一时的“朦胧诗”，话剧《于无声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等，这些成为一代人的文学读物，更多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却较少对读者提供文学的滋养，文学本体性问题被有意无意遮蔽了。

就在文学界的拨乱反正正在进行，文学创作仍在呼喊与追求时，文学理论界却悄然兴起了一股对文学性追求的思潮。应该说新时期文学理论是最早意识到文学性困扰的学科，也是最早注重将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思路开始“向内转”的。1984 年 11 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刘象愚等人翻译的《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对文学批评与研究，对文学史的认知与书写，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而随后在文学界出现的文学寻根、现代派思潮等，都表现出对文学性追求的强烈愿望。《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常识性阐述以及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论述，使处于亢奋激越中的文学研究者平静下来，能够回到学术的层面思考文学问题。这时，冲破文学壁垒者仍然是作为先锋的中国现代文学，林兴宅的《论阿 Q 的性格系统》、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总论》等撕开了文学研究被封闭已久的坚硬冰冷的一角，开始以文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文学。尽管这些研究仍然致力于探索鲁迅小说的思想革命或者政治意识，但他们已经开始回到文学本体，探究人物的性格系统，研究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此同时，一批以文体为专题的文学史开始出现，如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年），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祝宽的《五四新诗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年），等等，都努力于文学的系统建构，着力阐释各种不同文体的文学特征。这些分体文学史，虽然还不能说完全进入了文体学的视野，对于各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关注较少，但至少说明文学史家具有了初步的文体意识，自觉以文体类型的观念撰述文学史。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是更侧重于对失去的文学精神的追忆与重拾。无论是“20 世纪中国文学”还是“重写文学史”，大多被人们视为“重返五四”的行为，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再出发。不过，当中国文学现代化被解读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现代性时，文学

的现代性探究显然压倒了文学性追求。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文学史撰述的突出影响,在随后的“现代文学大排座次”事件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部文学文库的小说卷,收入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却冷落了茅盾等原来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随后,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① 此后也还有某些报刊或组织推出的现代作家文学史地位的排行榜,在这些榜单中,过去人们比较陌生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无名氏等作家进入视野,而过去在文学史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作家被淡化甚至边缘化。现在看来这次作家的排座次并无太多的文学史意义,甚至带有某种新闻炒作的嫌疑。但这一事件又说明在人们习惯的文学史思维模式撕裂开一角是多么重要,也能够看到学术界对文学性的诉求,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被文学史重新“发现”的作家来看,似乎更注重追求美学品格的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人们在《边城》《萧萧》《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那里,突然发现了一种久违的文学之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现代文学。

二、从思想启蒙到文学性问题

重写文学史中的文学性谱系,主要有三个知识来源,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思潮,三是外来文学思潮的冲击。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思想启蒙及其文化热,对文学的诉求以及文学史重写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文学及其文学史书写成为当代文化热潮的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学史的撰述,几乎走过了与100年前中国社会及其文学所走过的相同道路,人们对文学的审美性的追求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文学成为启蒙话语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形态。

毫无疑问,1980年代开始的思想启蒙,是对“五四”传统的回归,是鲁迅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人们发现,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相似的背景,存在着诸多共同性。晚清到“五四”时期,当社会革命在某些方面遇到挫折之后,试图以文学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危机转移的一种方式,正如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之后转向文学革命那样,他们在文学革命那里发现了“新民”及其战略转移的目标,在“新小说”“新文体”那里发现了社会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可以通过文学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之中,“新民”作为启蒙的目标之一,成功地将文学注入社会革命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成为社会革命受挫之后的一个重大转机,一场以反对孔教为重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为解决繁杂的社会问题寻找到了一条路径。随后而起的新文学则成为这条路径的最美风景,文学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与“五四”前后的启蒙运动存在诸多共同性,启蒙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狂欢,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遭受重创、外来文化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试图以新

① 钱理群、吴晓东:《“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的启蒙话语解决大众的精神问题。其实这里的错位是显然的，作为启蒙对象的社会底层大众与知识分子启蒙活动的方式是不对应的，启蒙者往往是一厢情愿地开展并实施启蒙的活动，认为解决了大众的精神麻木问题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或者通过启蒙话语转化某种社会危机。这种简单的理想化的文化运动从近代以来就被不断重复、不断模仿、不断阐释，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社会更深层次矛盾的纠结。1980 年代以鲁迅研究为突破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中国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质的变化，为启蒙理想寻找到了最具现实意义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来说，1980 年代的文学可以直接解读为启蒙，或者将启蒙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命题。正是在这种启蒙活动中，文学仍然被看成了“一面镜子”，由“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到“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革命发生了变化，而革命中的文学并无二致。

正是在强大的启蒙话语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成为最重要的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毫无疑问地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被视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本质意义的题目，成为阐释文学性的切入点。正如黄子平等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所说的那样：“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由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在历史的转折中，逐渐建立起现代民族政治、现代民族经济、现代民族文化，实现整个民族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① 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时间性问题，而且是性质的规定性问题。以现代性代替文学性的讨论首先是一种学术策略，既可以避免文学性讨论中的若干尴尬，也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的文学性想象，在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中建立起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想象共同体。文学性的尴尬在于，当我们从一个文学荒芜的时代走出来时，还没有真正寻找到文学世界的入口，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研究的方法。1980 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次次文化狂欢的表演，而没有多少能够成为探索文学世界的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等概念及其方法，可以探究文学的某些方面，带给人们新奇感、兴奋感，但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很难从这些批评中感受到文学之美。因此，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热潮很快被蜂拥而至的现代性浪潮湮没，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文学前景更多美好的想象。这时，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与其说是文学讨论，不如说是借文学而掀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讨论，借文化而推进启蒙现代性的进程，并由此建立的一个现代性的想象王国。

进入 21 世纪之后，现代性与文学性讨论热度不减，人们再一次认识到回到文学本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回到什么样的文学本体，如何回到文学本体，认知与常识，路径与方法，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给予回答。这里既是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也是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的问题。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文学史的重写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文学史定位，而且也是文学史自身书写过程中提出来的范畴和体例问题。当文学史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早已超越了平反与讨论的阶段后，撰写文学史就是必须要完成的课题。比如在这其中提出来的“共名与无名”的问题、“民间性”问题、“潜在写作”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现代中国文学”的学科命名问题，都会涉及到文学史撰述中的价值评判和如何认识现代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于是，文学的本体性就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51 页。

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重回文学性的必经之路。因为“对于文学史建构主体来说,文学史要有本体性不仅应充分尊重并固守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不仅应承认并肯定文学的特质是其文学性或审美性,而且还要承认并揭示所有的文学样态是遵循美的法则创造的,而且要承认并发掘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与内在机制,从而展现现代中国文学是个独立自足的异彩纷呈的审美系统”①。也就是说,文学史的建构就是如何回归到文学的美学范畴的问题,是如何以自觉的文体意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的问题。

提出以文体学为文学史建构的理论范式,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质的突破,而且是新的文学话语、新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文体既是文学类型分类,也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是文本的结构方式”②。某种意义上说,回到文学本体就是回到文体世界中,在文学作品的话语与结构中寻找文本的存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各种以文体类型为体例的撰述者较多,而真正回到文本之中,探究文学的文体特征者较少。当文学性的追求致力于现代性的考察和文本解读时,文体研究成为一时的热点,也成为突破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困局的突破口。如果说,在1980年代文学研究中,中国现代文学以思想启蒙为学术突破,并引导了整个文学研究的潮流的话,那么,1990年代尤其进入21世纪之后,以文体学为突破口的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引导人们开始走向真正的文学世界。在文体学研究方面,从较早的王元化的《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童庆炳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到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从吴调公的《文体分类的基本知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王凯符等人的《古代文章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到吴承学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花城出版社,1993年)和《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再到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内,有关文体及文体学研究的著述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尽管这些文体学研究带有学院派的倾向,注重学理的讨论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但文体研究对整个文学的辐射,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撰述的影响力,仍然是无可估量的。

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做出了应有的学术姿态,对作家作品的文体学研究成为回到文学本体的关键性一步。这些研究主要有文体史的撰述,如冯光廉等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以全新的文体学眼光梳理“近百年”中国文学,付平的《中国现代文学序跋的文体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袁国兴的《文体意识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从话剧与现代戏曲的关系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李继凯的《文体史视阈中的鲁迅文体》(《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10期),等等,这些研究从某个角度阐述了中国现代文体与文体学的内在关系,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学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而真正将文体学上升到文学史建构的层面上的,是朱德发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现代中国文学新探》(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著作,这些著作从现代

①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新探》,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5—86页。

②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中国文学史学科范式重建的角度，提出了文体自觉意识与文学建构的关系，在对政治型文学史、人本型文学史的反思中，在人的文学与现代文学文体之间寻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建构的内在关联，从宏观上规划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布局与理论范式。与中国古代文学不同，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学是在继承古代文体学和吸收外国文体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呈现着更为复杂的文体特征。正是如此，如何建立中国现代文体形态的研究范式，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在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中，虽然对中国现代文体形态及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与中国现代文体的复杂性相比，显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不可否认，从文体的角度认识文学史，可以真正回到文学本体，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条通向文学本体的一条道路。但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体，如何把握中国现代文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关系，如何把握中国现代文体形态的分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其内部构成，都需要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中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常识中来。

三、文学史的扩容与调整中的文学性焦虑

21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呈现出诸多新的变化，在诸多新的探索中取得了新的突破。

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不断补充、扩容和调整的过程，或者说是文学史对文学性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当文学史的撰述以“现代性”作为核心理念时，文学性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而“现代性”成为阐释文学史、追寻文学世界的最重要的突破口。这时，文学史的目光对准了那些主流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人们习惯上已经接受的文学史框架中寻找文学的存在。毫无疑问，“现代性”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好阐释。当人们的目光超越了已有研究模式，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自由的表达方式时，就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文学史框架，而试图突破固有的模式，以不同形态的文学现象、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等方面的内容重新界定文学史的概念。例如传统的文学史框架中，“鲁郭茅，巴老曹”，再加上叶圣陶、王统照、丁玲、赵树理以及几位左翼作家，几乎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部分版面。1980 年以后，随着文学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与突破，随着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与深化，沈从文、徐志摩、无名氏、张爱玲、穆旦与新月派、九叶诗派等作家、流派的被“发现”、被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被一次次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改变的既是“现代”的特质，更是“文学”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种研究与撰述现象，到 1990 年代尤其 21 世纪之后，出现更明显的更大幅度的变化，从而引发了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以及进一步扩容的史学诉求。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撰述而言，由于各种原因，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于文学之外的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等不计其数。1980 年代中期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以及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一些作家被重新“发现”，诸如沈从文、张爱玲、施蛰存、穆时英、徐訏、无名氏等作家相继出现在文学史著述中，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给予这些作家一定的地位。但是，更大的扩容与调整不限于某些作家，而是观念性、框架性的，是对文学史撰述的革命性变革。文学史的不断扩容，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增添了可观的材料与研究对象，丰富、充实和扩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容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新文学史往往局限于“新文学”和主流作家作品的话,那么,扩容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具文学性特征。进一步说,文学史的扩容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焦虑的表现。从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论指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以思想启蒙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现代性”“文学性”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反映了文学史研究与撰述在焦虑与克服焦虑中向文学自身靠拢,也显示了学术界对文学性问题的执著与追求。

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的扩容与调整是一种无奈之举,当文学性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著述的追求时,原来文学史中的内容已经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对照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个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看到文学史观念的巨大差异。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有关文学史编著的主要原则和问题中带上了突出的时代特点。该文学史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如此的伟大和丰富”,要概括如此“伟大和丰富”的文学史,首先要对“现代文学史中几个基本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一,关于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二,关于新文学运动的性质,三,关于贯穿在新文学史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四,关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五,关于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分期”。[①] 这里主要关注的一是文学运动,二是文学史的运动斗争,作家、作品置于次要的地位。即使如此,这部文学史书写的作家作品主要还是强调其革命斗争的特点,“我们倾注了全部热情,歌颂历史上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我们给予革命的作家与作品以应有的地位”,“对于进步的作家与作品,我们是既看到他们一定的历史作用,又指出他们的局限性,不一概的加以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对于反动的作家与作品,我们编排了专门的章节,当作反面的教材加以批判,以澄清其不良影响”。[②] 这一文学史观念虽然有些极端,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共识。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这一文学史观念才开始松动,新的文学史观念开始广泛被接受。1998年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中国“现代文学”表达了不一样的理解。他们认为,“现代文学”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并且特别指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③]。这种迥异于以往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与撰述方法,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种观点也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文学性追求,回应了重写文学史所提出的“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以“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④] 也就是要把中国现代文学“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⑤]。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扩容成为文学性追求的一个方向,文学史家试图通过对那些长期被埋没的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对那些长期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外的各种文体的文学、文学现象重新予以关注,重新写入文学史。大体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页。
②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3—14页。
③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④ 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⑤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第一,以文学史框架调整为主导的文学史撰述内容的扩展与调整。199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进入到新的层面,从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开始,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不仅将此前已经被“发现”的作家如徐訏、无名氏等写进文学史,而且将“通俗文学”“港台文学”作为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写入其中。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也开始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王富仁、黄修己、高玉、袁进等较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高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①] 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新文学”为本位的核心内涵,把“作为时间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作为性质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混同”,从而从根本上排斥了旧体文学、翻译文学等。陈友康的《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与现代性》[②]、刘梦芙的《20 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③] 等,对“旧体诗词”研究与入史的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对于进一步扩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阵容及其文学史的撰述问题,提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这种观念在文学史的撰述中并没有真正被接受,在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两张皮现象,但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开始将“旧体文学”“翻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内容吸收进去,从而在文学史撰述内容和文学史体例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态。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与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都程度不同地将“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的叙史范畴。这种文学史撰述现象说明,人们对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与文学史的撰述风格所产生的深刻思考,已经影响到对文学史的进一步调整,同时也影响到“现代文学”观念的深层次调整。

第二,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延伸的文学性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关注与讨论大体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并将这一文学的起点提前到 1898 年。[④] 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问题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诸如范伯群的《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⑤]、陈国恩、范伯群、周晓明、汤哲声、何锡章等的《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⑥]、陈国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⑦] 等。在文学史著述方面,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与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都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延伸到了晚清,将甲午前后的文学现象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这些著述所讨论的不仅仅中国现代文学起于何时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过程中,如何界定中国的“现代文学”,如何确认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在重新认识和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过程中,大多以文学的“现代性”作为立论的依据,以文学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标志。但在实践层面上,又往往表现为文学性的焦虑,或者说是对“现代文学”的“文学”存在的焦虑。

① 高玉:《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文艺研究》2003 年第 5 期。
② 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③ 刘梦芙:《20 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学术界》2009 年第 2 期。
④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
⑤ 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⑥ 陈国恩、范伯群等:《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 年第 3 期。
⑦ 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 年第 3 期。

这两部文学史之所以将“现代文学”延伸到晚清时期,不仅在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而且更在于文学性的变革与明晰,“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也是一个文学概念重新明确,文学与其他文字门类分离而获得独立地位的过程”。[①] 文学的独立过程以及由此获得的文学性,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第三,“被遗忘”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与调整。所谓“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是由于各种原因,诸如战争、自然灾害、遗失以及其他政治、文化等原因造成的作品“遗失”,这种遗失更多的是被文学史遗失,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如《礼拜六》《红玫瑰》《万象》等报刊及其相关作家作品,由于文学史观念的制约,长期被遗忘,无法进入文学史的视野。1980年代中后期,相当多的作家作品突然被发现,先后被写入文学史,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特意为“通俗文学”开设了专章,将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李涵秋、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顾道明、还珠楼主等作家写入文学史,随着大量作家作品被“发现”,文学史的规模被不断突破,文学性特征被不断刷新。这种新的突破,既是为在文学史上失踪的作家作品寻找新的文学史位置,还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存在感的一次认同,也即通过文学史上的“失踪”作家的重新发现,更重要的通过人们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陌生感”,引发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关注。

四、纯文学:文学史撰写中的文学性焦虑

1931年,文学史家胡云翼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过:“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②] 胡云翼批评了此前中国文学史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的现象,这个批评是在中国新文学已经有十几年发展进程时说的,中国文学观念与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时的情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胡云翼阐述的是“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早期文学史著中所撰述的大文学史,他所要求的也是以“纯文学”的标准选择作家作品。199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呼声再次响起。这种呼声不仅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而且也指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述。这种呼声不仅要求“文学回到文学中去”,而且要求在“纯文学”概念阐释中实现文学的自觉。在这种语境中,“纯文学”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指文学从政治制约中解放出来,实现文学的主体性;二是指中国文学的美学形态,是指在文体形态、文体类型、文体构造等方面的文学性特征。这两个方面是具有辩证逻辑关系的,当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时,才会实现其纯文学的美学特征,而当文学获得美学形态之后,也才能从人们习惯了的政治文学中脱身而出。正如贺桂梅在回顾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追求时所说:“所谓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之分、‘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自律性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声明、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联等,诸种有关‘文

①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② 胡云翼:《自序》,《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43年,第3页。

学’的知识表述都是在 80 年代建构起来的。”[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文学并不特指文学自身，而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所寻找的恰当位置。

贺桂梅为“纯文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纯文学”被纳入到哪种文学类型之中，处在什么常识性的知识体系中，都是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在 1980 年代文学被广泛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文学的功能被重新阐释，在现代性、诗化哲学、人道主义等语境中，表现出杂乱而无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成为“纯文学”的最佳停泊港，“《文学理论》广受欢迎的原因，或许正在于它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核心观点，与当时力图使文学‘非政治’化的历史诉求一拍即合”[②]。也就是说，提出“纯文学”的背景是文学“非政治化”的表现形态，是文学在特定条件下的被动化。通常来说，我们知识谱系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以“新文学”等同于“纯文学”的文学，是不断被现代化和纯粹化的文学。正是这样唯“新文学”独尊的文学史替代了所有文学形态，“纯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代名词，或者“新文学”成为“纯文学”的代名词。

与这种“纯文学”观念相对应的，是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无论“20 世纪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其主要目的是在文学史的“重写”中寻找“纯文学”，为当代“纯文学”提供理论资源。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③]。被称为“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不同概念的文学，是人类文化史上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新的文学形态。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被重新解读，重新阐释，重新确立文学史的新秩序。对此，贺桂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以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钱钟书、梁实秋等曾被革命文学史剔除出去的作家构造出一个现代文学新的‘伟大的传统’时，‘文学’的内涵是被如何重新定义的，并且形成了怎样的知识表述。”[④] 这个被重新定义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传统，是后来被文学界视为“纯文学”的理想文本。1980 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文学的发展，被学界称之为回归“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当“纯文学”从中剥离出来的时候，文学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1990 年代开始的新状态、新写实、后现代、第三代诗人等概念，及至 2000 年前后开始的形式主义批评，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表现出文学界的新的期待。贺桂梅进一步指出，在“诗化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语言谱系中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学，在多方面的文学试验中开始寻找文学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纯文学”被打上了一个大的问号。与胡云翼对“纯文学”的描述进行对照，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形态文学。在胡云翼那里，“纯文学”对应的是以学术为主体的学问，如早期林传甲、黄人、谢无量等文学史家多在文学史中叙述相关语言文字及其相关的学术，是被纯粹化的以文学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这部文学史主要叙述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文体。所以文学史就是胡怀琛所说过的：“一方面是历史中间的一部分，一方面是文学中间的一部分。”[⑤]1980 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则是与“政治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被重新装置的文学系统。

---

① 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② 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③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1 页。
④ 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⑤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第 5 页。

愿望总是好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撰述中,我们对于“纯文学”的追求既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对不正常的文学环境的逃离。在这种表达中,我们习惯性地将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巴金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称之为“纯文学”,而将周瘦鹃、吴双热、徐枕亚、张恨水、周天籁等视为“通俗文学”,同时又将柳亚子、吴宓、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古典诗词称为“旧体诗词”。在我们的文学知识谱系中,这种“纯文学”遮蔽了几乎所有形态的文学,以误解中的文学形态代替了文学。首先,将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古典”形态的文学排除于文学之外,将古典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排除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这种“新”与“旧”、“纯”与“俗”的文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仍然制约着我们的研究视野,制约着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可以这样说,缺少了古典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能是一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缺少了“通俗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只能是以新文学为主体的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这些年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朱德发与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等,部分地将现代古典文学、通俗文学写入文学史,诸如同光体、南社诗词、章士钊的逻辑文等,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形态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纯文学”的文学史观念。其次,将依托现代传媒及其市民文化发展起来的都市流行文学排除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并且以“通俗文学”命名,实际上是对这类文学的误解,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态的误解。以报纸期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载体,《小说月报》《礼拜六》《红玫瑰》《紫罗兰》《万象》等畅销一时的报刊,《巴黎茶花女遗事》《玉梨魂》《孽冤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为代表的都市流行小说,当被文学史冠之以“通俗报刊”“通俗小说”时,一种不言而喻的评价标准已然将其视为“非纯文学”。实际上,文学并无通俗高雅之分,王国维所追慕的文学“古雅”境界也只是一种文学的理想,吴双热、张恨水等所谓通俗文学作家对写作的极致化追求,对语言文字和篇章结构的雅化讲究,恐怕是几乎所有新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谓“纯文学”是不存在的,而打着“纯文学”的旗号进行的文学活动也往往是对文学的误解。

实际上,当我们谈论“纯文学”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文学立场看待文学,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观,也会有不同的“纯文学”。胡适的“纯文学”可能不同于胡云翼的“纯文学”,而作为文学史家的郑振铎与胡怀琛在“什么是文学”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时,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却并没有受到那些从事文学者多看一眼,而当都市流行文学兴起时,小说却作为“通俗文学”成为最受市民喜爱的一种读物,而当新文学视都市流行文学为世俗低下的东西时,自身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嘲笑。新文学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看都市流行文学,看到了“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①]。当文学研究会批判鸳鸯蝴蝶派是黑幕大观时,而学衡派却嘲弄改刊后的《小说月报》:“今世所称为提倡新文学之重要机关也。然读之使昏昏欲睡,原白话文学催眠之魔力奚自乎,以其为欧化的白话而已矣。”[②] 陈独秀批判了古典文学的陈腐,而古典文学者则批评新文学已经丧失文学精神。这种混乱杂糅的现象说明“纯文学”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

①《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② 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学衡》第32期,1924年8月。

固化为某一种文学形态。1980 年代以来对“纯文学”的追求更主要是对一种文学精神的呼唤。但是，随着文学史的学科意识增强，随着文学史撰述的学院化，文学史撰述与文学创作产生分离现象，“纯文学”的问题更集中在当代文学的文学性阐释方面。一方面，当重写文学史逸出于文学的现场，成为学院派对其学术性的一种思考时，“纯文学”已经不再作为一个问题存在，而仅仅是文学史撰述中的一种姿态或者方法。另一方面，当文学创作对“纯文学”进行实践性阐释时，呈现了作家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焦虑，表现出对文学的坚守与维护。

从文学史的理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都已经形成了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巨大冲击，这里不仅仅是对文学史体例或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冲击，而且是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诸多文学观念的冲击，诸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及其价值评判的问题，对一些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施蛰存、张爱玲等的重新认识与文学史定位的问题，如对一些作品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诗歌、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或者如《边城》《雷雨》《寒夜》《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的重新理解与解读的问题，等等，这些困扰着文学史书写的问题，成为文学史撰述过程中被一次次提出一次次讨论的话题；从文学史的实践层面上来看，文学性的焦虑并没有因为重写文学史或者 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就得到了化解，对于什么是文学性，什么是“纯文学”，甚至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将理论探讨过的问题在文学史撰述的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落实。现代性问题如何在文学史撰述中得到体现，文学性如何体现在文学史中，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更多的回答。

责任编辑：冯济平

Literary Anxiety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Zhou Hai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266071,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exist with each other, but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and the position of literature in history, but als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basic attitude towards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literariness of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basic position of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ll literary historians will always reflect a certain literary thought and express a certain literary spirit in their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However, how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riness of literary history, especially the literarines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as form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different viewpoints over the years. The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its continuous "rewriting" reflect precisely the literary anxiety i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From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to literary modernization, from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to the appeal of "pure literature", literary anxiety has restricte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oncepts.

Key word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literary anxiety

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与文学研究(下)

关 爱 和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文史兼治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经历了早年"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年隋唐中古史、元白诗,晚年《再生缘》弹词、钱柳因缘诗三个时期。陈寅恪对文学的兴趣爱好,使其在穷尽材料治东方学、治中古史的同时,别具只眼,关注文学的演变与发展。尤其在《元白诗笺证稿》成书之后,其在反复修订增补过程中,创造完善了以诗证史的文史考证新方法。以诗证史的新方法,紧紧把握中国诗歌中人、地、时要素,阐释社会历史的变化演进。晚年陈寅恪从诗文入手,辅以地方志乘之书,从事《再生缘》的解读,钱柳因缘叙事,正是以诗证史考证方法的成功实践。陈寅恪留下的近300首旧体诗,更是诗人的沧桑濡泪之作。

关键词: 陈寅恪; 文学研究; 以诗证史; 颂红妆

中图分类号: I206.6;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14-32

下篇:文学篇

文学研究一直是陈寅恪学术研究与学术关切的重要内容。他少年居住在南京这样一个见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故事、有着丰富文化资源和积淀的古都。陈寅恪对佛学、历史与文学有天然的兴趣与热爱。其早年"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年隋唐中古史、元白诗,晚年《再生缘》弹词、钱柳因缘诗学术取向的转换,与年少时的读书兴趣有关,也与文史学科之间的亲密无间有关。陈寅恪因佛教翻译研究,而旁及语言学的四声三问;由魏晋清谈之风的讨论,而拈出陶渊明、《世说新语》话题。又因研究隋唐史,而讨论韩愈与古文运动、小说之关系;由元、白与新乐府研究,涉及中唐文体之关系,文人之关系的梳理。"文化托命"与"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从清华、到港大、燕大、最后在中大,陈寅恪坚持兼任历史系、中文系教授,在中文系讲授佛经翻译、元白诗、唐代乐府等课程。陈寅恪将王国维治学方法概括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 三种,其本人在《元白诗笺证稿》的写作与修订过程中,创造了以诗证史的文史考证新方法。陈寅恪晚年凭藉以诗证史的方法,加上地方志乘之书的帮助,研究明清间人诗词,便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两部"颂红妆"之作,以女性为切入点,在高头典册史著之外的文人诗词弹词中,寻找并述写易代之际及乾嘉盛世文人雅士的情感生活,阐发正史之外社会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21&ZD2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关爱和,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生活的潜德之光。陈寅恪对旧体诗词喜爱,留下近三百首诗作。这些直通诗人心灵的情感之歌,曲折地显示出一代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

晋至唐文学研究

陶渊明是晋宋时代的文人,生活在战乱纷纭,樊笼如盖的时代。陶渊明身心经历,志尚情趣,是研究晋宋之交士林风尚、士大夫言行出处的最佳个案。陶渊明出生于江南世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作过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留下来诗约 125 篇,文计 12 篇。其诗文的艺术成就自唐代起,就备受推崇。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论文,有《〈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数篇。

写作于 1936 年的《〈桃花源记〉旁证》,开宗明义,以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①]。而《〈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旨在讨论纪实的部分,不涉及寓意部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所讲述的避秦故事的背景,实为西晋末年的避戎狄。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盈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陶渊明把与其熟悉的征西将佐见闻,与《搜神后记》中卷一第五条《桃花源记》中之太守,及第六条刘骐衡山采药,失道问径的故事杂糅混合而成《桃花源记》讲述的故事。在经过步步假设与论证后,陈寅恪关于《桃花源记》有结论若干: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骐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②]

陶渊明《拟古》诗第二首为:“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士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③] 诗中的田子泰即田畴,东汉无终人。幽州牧刘虞派其到长安见献帝,返回后到刘虞墓祭拜,而激怒杀害刘虞的公孙瓒,被抓后复释放。田畴遂隐居徐无山中,归附他的百姓有五千余家。陈寅恪认为《拟古》诗中田畴这样的高士率百姓山中“隐居”事,可以与《桃花源记》中“避秦”者互相印证发明。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写作于 1943 年的桂林,哈佛燕京学社 1945 年在成都出版单行本,此文重在论述魏晋两朝清谈内容的演变及陶渊明思想的进步。陈寅恪论文认为:魏末西晋是清谈前期,其清谈大多与政治有关。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转为口中或纸上玄言,是名士身份的体现。记载魏晋清谈之书的《世说新语》,所录诸名士,上至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谢灵运止,止处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88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199 页。

③ 陶渊明著,袁行霈、杨贺松编校:《拟古》其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4 页。

恰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与政治有关的清谈起于东汉时的郭泰,成于阮籍,其作为皆表现为以自然对抗名教,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竹林七贤所谓的竹林,陈寅恪认为是由“天竺”二字格义而出,与地方名胜无关。七贤中,“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明不仕当世,加之与曹家有姻亲,被以违反名教之罪杀之。阮籍不似嵇康之积极反晋,虚与委蛇,终得苟全性命,但依旧保持放荡不羁之行为。阮籍得以苟全性命的奥秘在秉自然之旨,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将早期清谈指斥天下是非之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之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之风派。流风所至,清谈遂成以下结果:

> 至东晋时代,则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夫清谈既与实际生活无关,自难维持发展,而有渐次衰歇之势,何况东晋、刘宋之际天竺佛教大乘玄义先后经道安、慧远之整理,鸠摩罗什师弟之介绍,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实于纷乱之世界,烦闷之心情具指迷救苦之功用,宜乎当时士大夫对于此新学说惊服欢迎之不暇。回顾旧日之清谈,实为无味之鸡肋,已陈之刍狗,遂捐弃之而不惜也。②

陶渊明就是生活在清谈自然,而佛教渐起的时代。陈寅恪认为:研究陶渊明的人,发现其虽与佛界人物有所往来,但其绝不受佛教影响。原因在于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有一类如范缜者,其家世奉天师道,为保持家传道法,排斥佛教。陶渊明家学奉天师道,于佛学的立场与范缜同。文章认为:“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③陶渊明之为人为学实外儒而内道,表现对道家自然之说最充分的是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五言诗,而在《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自祭文》中因书写的朦胧而变得难解。陈寅恪解读《形影神》诗结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之语,以为陶渊明既然视“旧自然说与名教说之两非”,陶渊明之学则可称为“新自然说”:

> 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考陶公之新解仍从道教自然说演进而来,与后来道士受佛教禅宗影响所改革之教义不期冥合,是固为学术思想演进之所必致,而渊明则在千年以前已在其家传信仰中达到此阶段矣,古今论陶公者旨未尝及此,实有特为指出之必要也。④

以主要来自于道家的新自然说概括描述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是陈寅恪学术的贡献。陈寅恪不仅看到陶渊明与嵇康、阮籍的不同,还看到陶渊明与嵇康、阮籍有着许多精神上的连接:

>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似,然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2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7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9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5页。

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①

陶渊明自唐代之后,受人追捧。不同的人读陶集,即勾划出不同的陶渊明。陶诗平淡静穆与金刚怒目的多面性,在陈寅恪的论文都得到合理的诠释。

在对晋宋时代士大夫清谈及陶渊明思想的研究中,陈寅恪引为自得的家世姻族联系、宗教信仰两大观察视角,带入了许多晚清的经验。晋宋江南与晚清江南,世家姻族与宗教信仰,有许多相通与可以相互发明之处。同样是在此文中,陈寅恪批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对陶渊明的认识,局限在"不屑与热官为伍"的层面,近于不得要领。其原因是因为"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②。而陈寅恪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强烈地"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的自我色彩。平心而论,东汉至晋宋清谈的演变及陶渊明新自然思想的渊源、构成和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史家陈寅恪的研究,揭示得更准确深刻,因而更有说服力。

文学不仅与思想紧紧纠缠,与语言也不可分离。陈寅恪因一次率性而为的行为,使其更深刻地理解了语言对文学的意义。因此,对语言的流变,陈寅恪也予以充分留意。1932 年夏,清华新生入学考试,时任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试题。陈寅恪原计划第二天去北戴河修养,遂匆匆草就国文试题:作文六十分,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标点三十分;对对子十分,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等句供学生属对。二千多学生考完后,议论纷纷。舆论界指摘"清华复古"的评论登上报端。

受到批评后,陈寅恪 8 月 17 日在《清华暑期周刊》上撰文,力辨"对对子"对学习国文的意义。陈寅恪认为:入学考试国文,所考主要在国文文法与文字特点。"'对对子'即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足测验文法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子亦为基础知识。"③ 文章列举出对对子测验学生词类虚实分辨、四声平仄掌握、读书识字多寡、及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的辩证思维能力,应该是好处多多。《清华暑期周刊》读者有限,9 月 5 日,陈寅恪又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再作申论。文章以为对偶确为中国语文之特性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 ④。1965 年,陈寅恪又为三十余年前所写旧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增写附记,以为当年对对子题中的"孙行者",其最理想的对子是"胡适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 ⑤ 陈寅恪以正、反、正之辩证法解对对子的奥妙,能通解的只有研究西洋哲学又游学于苏联的冯友兰。这是晚年陈寅恪自证自己懂辩证法的例证。另外陈寅恪所说的"一时故作狡猾",其潜台词是当时不过是想幽我的朋友胡适之一默,又稍稍显示一下自己包括对对子在内的文学童子功。大师的"一时故作狡猾",对学堂中走出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27—228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28 页。
③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42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56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57 页。

来的学生而言,不知所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因此,学生以“复古”猜想清华,也在情理之中。

无独有偶,此类考题三十年后灵光再现。据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钱钟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回忆:比陈寅恪小二十岁的钱钟书,在20世纪60年代招考研究生时,所出试题是抄录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其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诗学何人何家,是晚清诗者与诗话津津乐道的行话。在大学教育的体系中,其已成为非主流的冷知识。以此为题目考试研究生,其理由是大师真的认为这是学问之一种,或解释为大师“一时故作狡猾”的行为。

区分四声与运用平仄,形成诗词格律,同样是根据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形成的文学创造。关于汉语四声的形成,陈寅恪认为与佛经翻译有关。他1934年写作《四声三问》,以问答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四声的理解:中国自古以宫商角徵羽五阶论声。印度古时分声之高低为三种。南齐永明时期,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同居建康一城,在考文审音的过程中,借鉴摹拟天竺转读佛经的三种高低声,将其描述为平、上、去声,加上中国语附有k、p、t等辅音缀尾的入声,成四声新说。四声新说逐步应用于中国诗歌韵文,使音节和谐,平仄有致。自此,宫商角徵羽仍为声之本体;平上去入之则供行文应用。永明时期周颙、沈约等人依据“中体西用”的原则,发明四声,对中国诗歌韵文的发展影响极大。

文学作品创作,除讲究对仗、四声之外,还有音韵问题。陈寅恪反复声明于音韵、声律之学,绝无通解。讨论声律、音韵诸问题,只因读史所及,略附诠释而已,以供学界参考。1936年陈寅恪有《东晋南朝之吴语》,1948年有《从史实论〈切韵〉》均涉及音韵问题。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陈寅恪根据史书记载,梳理了东晋时期吴语在日常交流与诗文作韵时的使用情况。《宋书顾琛传》记江东贵达某某数人,吴音不变,说明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再进一步考史,则得出江左士族操北语,庶人操吴语的推论。南朝吴人进入士阶层者,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时不讲吴语,而北方士人如王导,在基业未固之际,也曾作吴语接待访客,以笼络人心。在北语与吴语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但无论原籍北朝还是南朝的士人,作韵语皆用北音,即洛阳附近方言。这就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洛生咏”现象。

《从史实论〈切韵〉》是《东晋南朝之吴语》的续论。隋代陆法言所著《切韵》,唐初被定为官韵。陆法言是《切韵》的执笔者,他在记录颜之推、卢思道等八个著名学者聚会讨论所商定的审音原则的基础上,编写完成《切韵》,反映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切韵》已佚,其系统在《广韵》等书中得以保存。陈寅恪此文试图根据有关史书记载,论证《切韵》所据之标准音,仍以东晋南渡洛阳京畿旧音系统为主,参考南北朝时金陵士族与洛阳朝野所操之语,及有关韵书、关东江左名流之著作而成。《切韵》与七世纪长安方言无关,也与陆法言出生地河北方言无关。

讲求对仗声律,是骈偶之文的最显著特点。论及六朝长篇骈俪之文,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推梁代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为第一。梁武帝时,侯景叛乱,庾信时任建康令。建康失陷,庾信投奔梁元帝萧绎,554年出使西魏。其间,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被留任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后人称庾信为庾开府即由此而来。《哀江南赋》是庾信用赋体写作的记载梁代兴亡与个人沉浮遭际的名作。陈寅恪1931年有《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1941年有《读哀江南赋》,两文讨论庾信这一名作。

前文中陈寅恪认为:庾信《哀江南赋》末一节凡八句:“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①] 注解者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0页。

常误,如结合杜甫《咏怀古迹》中“羯胡事主终无赖”句,以杜解庾,则《哀江南赋》最末一节凡八句,则应是总论萧梁一代之兴亡。有梁一代,实仅梁武帝、梁文帝二主。《哀江南赋》结末八句中的前四句,写梁武帝江东之王业,因为错用无赖子弟侯景而丧生失位。后四句写梁元帝天下一家之局,因河东王萧誉反于湘州,卒至江陵为西魏所陷。

后文认为,学界解释《哀江南赋》,对庾信作赋的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的要义,止限于诠说古典,却疏于今典。陈寅恪认为:庾信写作此赋,应在578年12月。庾信是在读到同羁北朝,后回南朝的沈炯所写作《归魂赋》后,从而引发庾信的情思。如果把《哀江南赋》的写作动机,仅仅解释为本于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则即只注意了古典,而忽略了今典。《哀江南赋》结语有“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①]的句子,不仅用李将军、楚王子等古典,还有陈宣帝以北朝元定军将士换庾信等人被拒等今典。如不知今典,会大大影响对文本的理解。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以为:庾信作品,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今古合流,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解读此类用典对偶的作品,需“古典”“今典”并举并重:

>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②]

今典与古典解释诗文的原则,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经验。这一方法在其诗史互证研究与著述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至晚年写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时,已渐臻于出神入化、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熟练程度。

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时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与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陈寅恪对元白时期韩愈及元、白的文学贡献,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陈寅恪写于1935年的《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原稿以中文写作,译成英文后发表于1936年4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程千帆从英文译中文后,在1947年7月的在《国文月刊》上刊载。陈文以为:《韩愈昌黎先生文集》中有张籍与韩愈书两通。张籍第一书有“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③]之语。张籍所言韩愈“尚驳杂无实之说”,当指唐代小说文体而言。宋人赵彦卫记唐人科考投卷,其投卷文字,“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④]的记载。韩愈“尚驳杂无实之说”在前,《毛颖传》之撰作在后,则说明韩愈对小说文体先有深嗜,而后有以古文为小说的尝试。裴度《与李翺书》又谓韩愈“不以文为制,而以文为戏”,这是以传统雅正之文体评论韩愈。陈寅恪认为:

> 顾就文学技巧观点论之,则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邻于小说家之无实,而肆讥弹也。贞元(七八五—八〇五)、元和(八〇六—八二〇)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贰壹。)及毛颖传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1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4—235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40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1页。

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①

1953年11月,汪篯来请陈寅恪北上,未允,带走陈的两篇论文。一篇为1952年写成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篇为1951年写成的《论韩愈》,两文分别发表于1954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第1期与第2期。陈寅恪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支持。《论韩愈》大气磅礴,开篇即言古今论韩愈者众,其毁誉均未得其肯綮要领。这种截断众流口气,与陈寅恪旧日属文的内敛风格大有不同。陈文从六个方面论述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贡献:一是建立道统。韩愈受新禅宗启发,溯源《孟子》卒章,在《原道》一文中重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的儒学道统,以明确道统所在,诸学臣伏。二是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明经之学在韩愈时代已全失地位。韩愈借鉴新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学风,在《小戴记》中发见《大学》一篇,阐明个人修齐之心性,如何与国家治平之大业无缝对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韩愈开辟了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三是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是呵诋佛迦,申明夷夏之大防。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五胡乱华的历史与现实,促成韩愈一代士大夫的觉醒。唐代古文运动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发,"尊王攘夷"便成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其他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前辈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同辈古文家,"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②。因此,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者。五是改进文体。六是奖掖后进。

关于韩愈的最后两大贡献,陈寅恪凭藉其研究佛经传播的心得和长年在大学执教的体会,而有特别精彩的论述。陈文复论韩愈以文为诗,以为韩当是从佛经偈颂中译的不成功中汲取教训,将诗之优美,文之流畅,合而为一,获得成功。

陈寅恪论韩愈之文,以为韩提倡秦汉奇句单行文体,扫除骈体,名虽复古,实则通今: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藉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③

陈文复论韩愈以文为诗,以为韩愈以文为诗的灵感,当是从佛经偈颂中译的不成功中汲取教训,从而将诗之优美,文之流畅,合而为一,最终获得成功:

盖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自东汉至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经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3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9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9—330页。

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①

扫除陈腐僵化的骈偶之风,恢复奇句单行的先秦两汉文体,以复古而求通今;从佛经偈颂以文为诗的不堪,创新以文为诗的成功,并又为后代苏东坡、辛弃疾的以文入词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韩愈在多层意义上都是中唐以降文体改进的旗手。

至于奖掖后进,新旧《唐书》都有论定。陈寅恪生发说:

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②

《论韩愈》一文最后的结论是:唐代三百年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中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其地位价值因此而特别重要,韩愈没有辜负他的时代。文中,陈寅恪用"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描述韩愈借力《大学》篇,将谈心说性之佛学与济世安民之儒学融会贯通的思想行为,这一描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的经验,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总是被格外重视的。它体现出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现实意识。因为这些经验不仅可以说明历史的中国,更可以借鉴于现实的中国。

《元白诗笺证稿》初成于 1944 年,约 7 万字。此年在成都燕大,陈寅恪开设"元白刘诗"课程。抗战结束重回清华后,王永兴、汪篯为助手,继续修改此稿,并在清华开设"唐诗研究"课程。初到岭南大学,程曦为助手,开设"白居易诗"课程。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在历史系开设"元白诗证史"课程。《元白诗笺证稿》1950 年 11 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印本,后又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上海古籍 1978 年版,等等。作者附记云:"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又初印本脱误颇多,承黄萱先生相助,得以补正重刊。"③《元白诗笺证稿》的修改,经历战乱,经历政权更迭,经历双目失明,经历北上南下,是陈寅恪修改增补时间最久、内容前后变化最大的著述。三联出版社 2001 年出版《陈寅恪集》时,《元白诗笺证稿》的字数为 26 万字。《元白诗笺证稿》研究的对象是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文人群体的历史与文学活动,是作者对变易时代、士人命运、文化播迁的诸种关注,由社会政治上层,渐移至社会中下层的学术过渡带的重大转折。《元白诗笺证稿》之前是隋唐政治、制度研究,《元白诗笺证稿》之后转向"颂红妆"之作。

《元白诗笺证稿》1944 年七万字初稿成时,陈寅恪在《致陈槃》中把它称为"言唐代社会风俗"的作品,学术界将它与唐代制度、唐代政治并称唐史三著。1950 年《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作者分寄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330—331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332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80 页。

友人,杨树达《与陈寅恪书》信中直以文学史著作视之:

> 昨承赐寄大著《元白诗笺证》,敬读一过,语详事核,钦服无已。盖自有诗注以来,未有美富卓绝如此书者也。前于《岭南学报》读大著而说唐诗诸篇,即叹其精绝,谓必深入如此而后有真正之文学史可言,向来编文学史者大都浮光掠影,去真象不知几千万里,真可嗤也。今读此册,益见其然,除欢喜赞叹外,不复能赞一辞矣。窃尝私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多唐突大家已甚矣。①

增补本《元白诗笺证稿》共六章,前三章分论《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第四章论元稹艳诗与悼亡诗及《莺莺传》,第五章论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第六章论古体乐府。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集的压卷之作。此诗既为当时人极为欣赏,流传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历千岁之后而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陈寅恪认为:对这首诗的诠释,文人学士,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陈著认为: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武夫横恣的纷乱依旧,但科举之盛,崇奖文词的风气,在悄然改变着社会与文学。诗与文革新之风吹起,其代表是韩柳古文运动和元白元和体诗派。韩柳古文运动主张革新腐化之骈文,改用奇句单行之古文,且以古文试作小说,遂有“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运动。元白诗歌群体倡导新乐府运动,写出许多批评时政,针砭现实的新乐府诗和首尾完整的叙事诗。受唐代科考“投卷”“荐举”方式的影响,古文革新与诗歌革新均有扩大诗文议论抒情的表现能力,向史才、诗笔、议论,文备众体方向发展的普遍趋势。古文、诗歌革新相互促进影响,使中唐文学的繁荣,不让于盛唐时期。

诗文文体向文备众体方向发展,文人关系则向相互合作各竭才智,竞造胜境方向靠近。陈寅恪据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和答诗十首序》中的话,描述元和体诗派之间的关系:

>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②
>
> 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③

元和诗派诗人之间的相戒、相勉、相慰、相娱,同者互和,异者作答的合作关系,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相互切磋,相互借鉴的情况。陈寅恪描述为“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④。

这种各竭才智,竞造胜境的气氛,使他们的作品之间有着多重的联系,并有着显然可见的因革演化的痕迹,研究者可以在参照对比中获得关联与真知。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于元和时,其中两点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是白、陈之《长恨歌》《长恨歌传》与元、李之《莺莺传》有因袭、有创新;二是《长恨歌》《莺莺传》两个作品中,“歌”

---

①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267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页。

与“传”形成互文。“歌”见诗笔,“传”见史才、议论。此即元和诗派追求的文备众体,不宜割裂开来。

贞元年间,元稹与李绅的合作,元稹作《莺莺传》是传奇小说体,李绅据《莺莺传》事而作《莺莺歌》,元稹又以《会真诗三十韵》记其事。元和年间,白居易与陈鸿的合作,白作《长恨歌》后,陈为《长恨歌传》。陈寅恪论析其同与不同及因革演化轨迹云:

> 此则长恨歌及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若其关于帝王平民……贵贱高下所写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论矣。……复次,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 ……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①

陈寅恪认为:后人不解“唐诗无讳避”及“诗传一体”的道理,论白诗常有失误。宋人魏泰、张戒诗话论诗,扬杜抑白,以为白《长恨歌》写燕昵之私,造语蠢拙。岂不知写燕昵之私,是言情小说文体的体中之意,也是元、白的擅长。清人汪立名不了解歌与传一体,而有白诗虑未详,陈鸿作传以补充“惩尤物,窒乱阶”之意的迂腐议论。陈寅恪赞成洪迈《容斋随笔》中“唐诗无讳避”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② 因为“无讳避”,故可以给文学以天上人间的创造空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③

陈寅恪在第一章结末为《长恨歌》总结:“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自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④

《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论《琵琶引》。《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年),《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时白居易已从尉盩厔至翰林院,又被贬为江州刺史。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以为《琵琶引》胜于《长恨歌》,而白居易本人仍首举《长恨歌》。白居易作《琵琶引》之前的元和五年,元稹已有《琵琶歌》行世。属同一题目,其因袭变革与词句意旨可资比较者甚多。陈寅恪以为:元稹诗盛赞管儿绝艺,复勉铁山精近,一题而二旨;白居易一题一意。元稹以诗偿诗债,旨显庸浅;白居易专为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加上个人迁谪失路之怀,作诗之人与诗咏之人合二为一。其工拙殊绝,复何足怪。

---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3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45页。

就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所持江州司马夜与妇人船中饮酒,极丝弹之乐,颇涉瓜田李下之嫌的说法,陈寅恪解释:男女礼法,唐宋不同。乐天之与故倡,茶商之于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加上文词科举进身之人,"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①]。因此,江州司马夜与妇人船中夜饮之事,才突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为诗宗旨。

据文献记载,白居易是极珍视自己作品的人。白居易被贬,缘于为宰相武元衡喊冤。但白居易最终获罪的上疏,却不见于白居易的文集之中。陈寅恪推论是白居易故意删去,不使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当时政府主要政策是用兵淮蔡,白居易贬官与之有关。《琵琶引》中的琵琶女嫁作商人妇的原因是由于"弟走从军阿姨死",陈寅恪认为:"此弟之从军应是与用兵淮蔡有关。据是而言,两人之流落天涯皆是用兵淮蔡之结果。"[②]在作者的这种推测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句,才可以得以落实。

第三章论元稹的《连昌宫词》。连昌宫为始建于隋,靠近洛阳一方的唐行宫。唐玄宗曾至连昌宫,次年而有安史之乱,连昌宫遂成为废墟。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的创作主旨是"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③],仍是与《长恨歌》相关题材的作品。陈寅恪论《连昌宫词》,开宗明义,指出:"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自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④]

作者接着详考元稹写作《连昌宫》是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还是闭门伏案之作,结论是后者。接着又考《连昌宫词》作于何时何地,结论是元和十三年写于通州。《连昌宫词》借宫边老翁之口,说出"努力庙谟休用兵"之类的话,是得到唐穆宗知赏的原因。《连昌宫词》既是依题悬拟之作,其中的虚构之处不尽合于史实。陈寅恪考订:杨贵妃不曾到过连昌宫,安禄山乱后未尝到过洛阳。《连昌宫词》中所写"太真同凭阑干立""御路犹存禄山过",如同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样,均为想象虚构。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在陈寅恪的诗文互证中,有合有分,时合时分,显示着真与幻各自不同的魅力。

第四章论元稹的艳诗、悼亡诗及《莺莺传》。陈寅恪认为:元稹善写男女情感,因此影响中国文学甚大:

>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即是其例。[⑤]

为便于评论元稹的男女情感作品,陈寅恪先发一大段社会风习与士大夫道德互为升降的议论,作为评价的依据:

>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54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63—364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74—75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63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4页。

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①

与上述类似的议论,曾出现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及 1927 年与吴宓的谈话中。它是陈寅恪对时代风气与士大夫选择之间关系长期思考的又一次表达。其中也包含着家族与个人,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生活经验。带着个人的经验与思考,解释元稹、白居易的行为,符合陈氏“了解之同情”的批评原则。

陈寅恪以为,南北朝之官有清浊之别,士大夫仕宦求清望官,婚姻结高门第,是社会风尚。元稹虽是隋兵部尚书的六世孙,但元稹一代,式微已甚。唐代风气重进士轻明经。元稹原是明经出身,后登进士科以致身通显,娶名门女韦氏,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元稹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在旧族礼法家风与词科浮薄进士之间,并存杂用。礼法家风表现于处理韦丛事宜,浮薄放佚体现在与莺莺的交往之中。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人品,仕宦操守,多有讥讽。对元稹的文学才华,创造能力,则多加称赞: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②

《读莺莺传》是陈寅恪 1941 年写于香港的论文,附在第四章后。就行文的关系来说,《读莺莺传》是陈寅恪研究元白最早的成果。陈寅恪认为:元稹《莺莺传》,又称《会真记》,由元稹《会真诗》而来。会真是当时习用语,真与仙同义,会真即遇仙之谓。唐时,仙多用妖艳妇人,或放诞女道士,或目倡伎者。陈寅恪认为:《莺莺传》为元稹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莺莺为其情人。元稹作《莺莺传》,直叙其始乱终弃之事迹,不为之少惭。舍弃寒女,别婚高门,是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行为。

《读莺莺传》论及元白在中唐的文坛地位,陈寅恪认为,《旧唐书》《元稹白居易合传》谓“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③。而非韩、柳。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至宋人欧阳修重修《唐书》时,元、白与韩、柳之评价,才迥不相同。这种改变不太为治文学史者所注意。就古文革新而言,《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的区别。而公文的新体,从提出主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85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103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117 页。

张到实施改良,与元、白有关。就古文作公式文字而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①]。而以古文试作小说,也是如此结果:

>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
>
> 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②]

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韩柳成功在古文,元白成功在诗、小说与公文写作。陈寅恪希望对元白诗文革新的贡献,做到还原真实,名至实归。这也可能是他用二十年之力,修改完善《元白诗笺证稿》的用心之一。

第五章讨论新乐府。中唐新乐府的形成,也是元白诗文革新的重要成果。陈寅恪指出:

> 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非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但以创造此体诗之理论言,则见于元氏长庆集者,似尚较乐天自言者为详。[③]

受杜甫《兵车行》《丽人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启发,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与白居易、李绅有“不复拟赋古题”的约定。元和四年,李绅有《新题乐府》20首送元稹,元稹和12首,白居易作50首。李绅的乐府诗已佚,可资比较的只有元白之作。白居易《新乐府》有总序,每篇有一序,每篇首句为题目。“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的句律,元稹以七字句为常,白居易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④] 陈寅恪据此概括白居易《新乐府》的构成特点云:

>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⑤]

重视敦煌文献,引以为唐代诗歌革新旁证;关注雅俗转换,以民间俗曲作唐代诗歌革新的结穴,都体现出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研究的视野与价值观。这也正是陈寅恪接下来研究《再生缘》的一条伏线。弹词的句律,与佛经的翻译传播有关,与唐代《新乐府》相似,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俗曲。

以元白《新乐府》诗比较,白居易一吟咏一事,意旨专一,词语明白,更符合备风谣采择的风人之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0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9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1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5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5页。

旨。而元稹之作,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不如白居易特点鲜明。一吟一事,也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的特点。《秦中吟十首》可以与《新乐府》视为同类。在与元稹诗作的比较中,陈寅恪还发现了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在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具:

惟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①

总论元白《新乐府》后,陈寅恪对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逐一释义,约十万字。这种释义,夹叙夹议,或简或繁,是一种特别适宜大学授业解惑的体例。这种叙例,留下作者在大学的教学活动的印痕。

第六章论古题乐府。陈寅恪再论元、白作为诗友诗敌,其相互仿效改创对诗歌写作的重要推进作用: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倘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②

元稹尝试过新乐府后,不能胜出白居易,则另辟蹊径。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羡其“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和十二年后,又作《古题乐府十九首》。陈寅恪评元稹古题之作为“形则袭古,实则创新”,“十九首中虽有全系五言或七言者,但其中颇多三言五言七言相间杂而成,且有以十字为句者”③,长短参差,颇极变错之致。“故读微之古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④

《元白诗笺证稿》六章正文之后为附论。作者将《元白诗笺证稿》没有成书前发表的论文收入其中,有《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五种。附录论文中有三个学术问题,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

第一,由白居易看中唐士大夫风习。陈寅恪认为:元稹出于鲜卑,白居易出自西域,都非妄说。但关键不在血统,还看其所接受的文化。中唐文人,“韩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131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09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11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12 页。

韩于排佛老之思想始终一致,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服丹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①]。白居易炼服丹药,应至晚年。其六十三岁有《思旧》诗,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②] 白居易所提及的元稹、杜元颖、崔群等旧友至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第一流人物,各因有怪癖,而生命不永。诗中提到的"退之",清人钱大昕为尊者讳,认为不应是韩愈。陈寅恪认为此退之非韩愈莫属。白居易诗中自诩洁身自好:"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③] 在炼服丹药与声伎之乐这一问题上,白居易与韩愈一样,言与行充满矛盾。陈寅恪解释这种矛盾在中唐士大夫中具有普遍性:"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④] 陈寅恪认为:白居易之思想行为,一言以蔽之曰"知足"。[⑤] 理解白居易思想行为,须向老学处求,而不可据佛家之说:"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⑥]

第二,元白诗的分类与元和体。元白诗的自我分类,体现着诗体创新者的自觉与由繁趋简的认知过程。陈寅恪在附录部分《论元白诗之分类》一文中,举元稹与白居易元和十年对各自诗作的分类,尚处在繁琐纷纭的状态。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将二十卷诗分为十体,分别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七言律诗、五言律诗、律讽、悼亡、五七言今体艳诗、五七言古体艳诗。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将自己所作新旧体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 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⑦]

元稹与白居易的诗体分类,持内容、形式的多元标准,体现出元和十年(815年)诗体分类的繁杂矛盾。这种繁杂矛盾在元、白的努力下逐渐趋于简约。陈寅恪援引清人汪立名整理《白香山诗》时的发现:一是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有《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其区分元少尹诗已简化为格诗与律诗两类。二是白居易《前集》编"既分古调、乐府、歌行,以类各次于讽喻、闲适、感伤之卷,后集不复分类别卷,遂统称之曰格诗耳"[⑧]。陈寅恪赞成汪立名《白香山诗后集》卷一中关于"格诗"的析义:"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⑨] 白居易此时"格诗"一词的使用,一是演变为律诗之外各类古体诗的总称,二是兼有倡导古体诗特有讽兴之旨与厚重骨格的意味。在近体诗优势明显,古体诗再擅胜场的中唐时期,元白的诗体辨析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特殊的存在意义。

元白对于诗体的辨析实践与诗体自觉,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认识有关,与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7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5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5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6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7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1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2页。
⑧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3页。
⑨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4页。

以复古求创新,创立元和诗体的诗歌革新愿望有关,也与他们一生多次为自己作品编集的习惯有关。陈寅恪认为:元和体诗依照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的表述,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两类诗,影响广大。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描述:"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①] 陈寅恪指出:元和体诗,在当时并非美词。《国史补》记载,"元和已后,诗章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②] 可以为证。"而近人乃以'同光体'比于'元和体',自相标榜,殊可笑也。"[③]

第三,白居易与刘禹锡之诗。陈寅恪认为:"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④] 白居易认为刘禹锡的长处在标举《春秋》文章委婉之旨,并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简练沉着之名句,正可以药救自己与元稹辞繁言激之病。

《元白诗笺证稿》体大精深,与陈寅恪的韩愈研究一起,共同成为中唐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研究

陈寅恪 1953 年起,转入"颂红妆"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论再生缘》开宗明义,讲述他对《再生缘》的研究,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⑤]

首先引发陈寅恪弹词研究学术兴趣的是文体演变。即弹词文体作为民间说唱形式,其与元白长庆体、唐五代俗讲有什么样的渊源流变关系?其次是陈端生的身世与写作之谜。具备绝代才华,有八十万字情节曲折跌宕起伏的弹词存留于世,而其身名湮没,事迹几不可考。依靠民间文献及日常生活关联,重建个人的生命史,对纵横捭阖隋唐制度史、政治史的一代史学大师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学术挑战。再次寄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在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重建陈端生个人生活史后,联想起与陈端生同时期文人汪中《吊马守真文》中"荣期二乐,幸而为男"的自伤,触发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48—349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49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49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 351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 页。

作者个人求医万里,乞食多门,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①]的困难遭遇,而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感慨。

先看《论再生缘》如何以缜密的文史考证,重建陈端生个人生命历史的。陈寅恪指出:《再生缘》之“再生”二字,来自于它是弹词作品《玉钏缘》的续作。《玉钏缘》故事场景为宋代,《再生缘》故事场景为元代。《再生缘》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所写,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陈作与梁续间隔40年左右。续书人与原作者有同里之亲,通家之谊,但仅以“某氏贤闺秀”称原作者。陈寅恪认为:陈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哀怨缠绵,有许多可供使用的材料。另外,陈端生祖父陈兆仑的族孙陈文述,曾获见陈端生妹长生,其《碧城仙馆诗钞》中《题从姊秋谷(长生)绘声阁集七律四首》及《西泠闺咏》中《绘影阁咏家□□》中留有关端生及其夫范某的重要的记述线索。如陈文述《绘影阁咏家□□》记陈端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②]作者决意根据这些线索,“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蘋南遗草、陆燿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固知所得结论,未能详确,然即就此以论再生缘之书,亦可不致漫无根据,武断妄言也”[③]。

根据上述史料,作者考证推论出与陈端生及《再生缘》有关的事件如下:陈端生祖父陈兆仑,字句山,得中博学鸿词科,曾任太仆寺卿。父陈玉敦,举人,官内阁中书,后任职山东、云南。有女端、庆、长三人,庆生早亡。母汪氏,端生、长生之文学与其母有关。陈端生生于1751年,1773年嫁范氏,生一女一男。作者疑范氏为范菼,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范氏因科场事谪戍,后获恩赦。范氏恩赦如在嘉庆元年,端生去世应在1796年。陈端生写作《再生缘》开始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1768),时年十八岁,地点为北京。十六卷完成于乾隆三十五年三月(1770),时年二十岁,地点为山东登州。因母亲去世,写作中断。乾隆四十九年(1784)续写第十七卷,地点杭州。杭州续写时,对前十六卷也有修改。梁氏续书,在四十年之后。张文述、梁德绳之所以对原作者信息讳莫如深,当与范某案有关。

陈寅恪的考证,在确认范某身份时遇到困难。其对最终以范菼作为端生夫婿的结果,并不甚满意,深感有许多推论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作者把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写在文中。以为“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

陈寅恪在论及陈端生的遭遇与情感时,主动把自己带入。《论再生缘》引第十六卷第六十回伤春之语,以为陈端生与曹雪芹是同时之人,陈写《再生缘》是不可能看到《石头记》的。但端生的伤春与林黛玉的感伤不期冥会,已是甚为殊异。而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与绘影阁体复有重复勾连,故抄录自作《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一诗,引以为同调。在论及陈端生二十岁才思敏捷,即写完《再生缘》十六卷,到杭州后,为人事俗事所牵,不得不中辍。十二年后,方始续写,最终卒非全璧,遗憾无穷时,遂联想自己,“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9页。

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①] 叙写个人未能早著述的遗憾。

考证完毕,《论再生缘》复论陈端生之作的思想、结构、文词。陈寅恪认为,陈端生生活在科举为男性专占的时代,其不平之感,非他人所能共喻。《再生缘》中的主角孟丽君,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再生缘》中孟丽君中文状元,任兵部尚书,体现出端生心中对君父夫三纲的摧破,及对自由、自尊即独立之思想的向往。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遇困厄,身名湮没,又何足异哉!

论及结构,陈寅恪认为,《再生缘》煌煌八十余万字,长篇巨制,结构精密,系统分明,与《玉钏缘》的冗长支蔓相比,有天渊之别。《再生缘》一书,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闼之间,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比其入博学鸿词科的祖父的作品流播更广。韩愈有“发潜德之幽光”的话,“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②]。

抱有“使《再生缘》再生信念”的陈寅恪再论《再生缘》之文,谓其“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弹词其句律与佛经翻译中的偈颂、近体诗中的排律一脉相承:

> 然观吾国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职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别作新乐府。秦中吟之体乃五言古诗,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且间以三言,蕲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其用心可以推见也。……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论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又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③]

弹词与佛经翻译中的偈颂、近体诗中的排律一脉相承,符合“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的结构特点。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就文体立论,可以和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相提并论。如此重要的发现,只有在作者研究过佛教翻译,研究过元白诗歌革新,研究过陈端生《再生缘》弹词之后,在融会贯通各文体精神气质之后,方才由“噤不敢发”一变而为大胆立言。读陈寅恪的《论韩愈》时,作者在文章开始有一句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者讥者“未中肯綮”[④];结尾处的“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⑤],是何等的傲视天下!而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的学术表达,同样具有截断众流的胆略气势。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 60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 69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 71—72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319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332 页。

弹词形式并不卑微,而弹词优美与否及传播广狭,则与作者的思想自由程度密切相关:

> 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之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①

以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为诗为文,是中国文学特异于其他国家文学之处。以古文之法作骈偶之文,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也是凤毛麟角。它要求作者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文学史上做得最好的是六朝与北宋:

>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壹叁)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②

弹词是以排律文体讲唱叙事的艺术形式。作者以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配合的载体,表达曲折故事与复杂事理,需要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为车,更需要自由活泼思想为驭:

> 今观陈端生再生缘中第壹柒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贰拾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③

陈之原著与梁之续作的差别,不在记诵广博与否,而在思想自由与否。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在民间弹词艺人的身上,陈寅恪依然可以发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可贵。在对《再生缘》弹词以排律形式形成上百万字叙事文体的研究中,陈寅恪得以将自己关于六朝排比声韵、属对律切之学兴起以来骈散文体变革的思考,如佛经偈颂、以文为诗,新乐府、七言排律、变文俗曲之间互通借鉴关系,在融会贯通后,进入一种豁然开朗的学术境地。这些都是《再生缘》研究的重要收获。

在依据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证陈端生之事迹及著作,实属艰难,且不圆满。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论证过程,触动文史大师的感慨:

>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2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2—73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3页。

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谶”一语。①

乾隆承平之世女子陈端生有《再生缘》传世，生平事迹湮没而今已难考。而与陈端生同时代的汪中，吊秦淮妓女马守真，以“幸而为男”慰藉“哀乐由人”的幕僚生涯。以承平时期的女子陈端生，男子汪中的遭遇与心情，对比战乱之世一介书生陈寅恪的遭遇与心情，陈寅恪借陈端生“岂是蚤为今日谶”的诗句，将自己的故事从清华园的“诗谶”讲起。

九一八事变起，陈寅恪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有“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句。卢沟桥事变后，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此数年间，亦颇作诗，以志一时之感触。其《蒙自南湖作》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② 此句中竟有“端生”二字。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在英伦医院，听读小说，有李提摩太上书故事，回想初去日本读书时，在上海遇李提摩太，李有“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之语，故时有“旧时王谢早无家”诗句。治目疾无效，回到南京，又有“去国欲枯双目泪”的感叹。时至今日，“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③。因此，原来诗中的“说与赵家庄里听”“北归端恐待来生”等皆成“诗谶”。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文竟后有律诗两首并加长序如下：

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壹伍卷绘影阁咏家□□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再生缘间叙事战争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④

诗者在“论诗我亦弹词体”一句下自注：“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论弹词排律体，寄天涯沦落情。在《论再生缘》中，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陈寅恪，彻底融为一体。

《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的力作是《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1954年3月以《钱柳因缘诗释证》为题开始写作，至1964年夏初稿完成，80余万字，用时十年，完成时恰值钱柳逝世三百年。双目失明的75岁老人在完稿后，合掌说偈曰：“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⑤ 其中，陈寅恪对《柳如是别传》有两个方面的自我判断：一是这是一部值得看重的著作。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3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4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86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50页。

它是在“失明膑足”的条件下,以十年“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的努力,借重“乃天所假”,足可“沾沾自喜”的成功之作;二是这是一部有思想内涵,有寄托讽喻的著作。它以“亦文亦史,忽庄忽谐”的传记文体,在“了解之同情”的立场下,“述事言情,悯生悲死”,为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政治作为、情感生活留下足以“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借鉴。

《柳如是别传》共分五章,分别是第一章缘起,第二章考订柳如是姓氏名字及附带问题,第三章柳如是与几社胜流特别是与陈子龙的交往,第四章柳如是结识并婚于钱谦益前后,第五章钱柳复明活动,附录交待钱氏家乱与柳如是自缢。

陈寅恪交待著书缘起,颇具浪漫色彩,类小说家言。著者自言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一重原因是抗战旅居昆明,不意在书商处购得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故园中红豆一粒,顿生笺注钱柳因缘的想法。二十余年过去,红豆尚存旧箧。作者有《咏红豆》诗,其“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①]句,感喟经过年岁淘洗,美人之笑何在?终剩万古之愁。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二重原因是少年时的南京,埋下的旧梦遐想。时在辛亥革命之前,钱谦益之书刚从清代乾隆期的禁令中解脱,而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志士疯狂追捧。少年陈寅恪在舅父俞明震的书房中看到钱遵王所注的《牧斋诗集》,心有所动。后钱氏遗著尽出,因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而与钱著未深有赏会。昆明得豆,广州忆往,再读钱氏之书,遂生“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②]的感慨。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三重原因,是以钱柳诗,自验所学之深浅:

> 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③]

从三百年前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残阙毁禁的诗文之作中,窥知其孤怀遗恨及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为被深诋被厚诬的倡门女子辨污洗地。这是《柳如是别传》写作的最重要的宗旨。

著述宗旨如此明确,如何实现,则困难重重。原因在于男主角钱谦益事迹见于两朝国史,固有阙误,尚多可考。女主角柳如是本末,散见名清间人著述及诸家诗文笔记中,因清乾隆以后的禁毁多亡佚不可得见。即使没有禁毁的史料,其中的简略错误、抄袭雷同、讳饰诋诬、虚妄揣测的地方比比皆是。梳理、辨证、发覆的工作,繁难重重。陈寅恪在第一章《缘起》中交待自己的书写策略:

> 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2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3—4页。

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①

陈寅恪在交待书写策略后,抄引了自己的九首诗,作为十年写作艰难的见证。前三首诗写于 1955 年,分别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尚托惠香成狡狯,至今疑滞未能消。"② 作者的歌哭无端,作者的冥想徘徊,无不与奇女才士的研究有关。中间四首写于 1956 到 1958 年,分别有:"然脂暝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③ 仍是然脂暝写、证史笺诗的爬梳,仍是以平生所学,诠写心史的努力。最后两诗写于 1963 年。此时,《钱柳因缘诗释证》粗告完成,作者忆清词人项鸿祚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之语,作为心中之言:"惜别渔舟迷去住,封侯闺梦负绸缪。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遗属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④ 三百年前文宗国士、女侠名姝已为尘土,但死恨未休。今日修史之人考证著书,将旧史翻新,为其洗刷烦冤,见其孤怀遗恨。陈寅恪十年间因《柳如是别传》写作所写成的诗,同样显示着著述的艰难和旧史新说的努力。"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⑤ 也是一句很重要的著述宗旨的交待:《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没有晚清小说《花月痕》以风花雪月的故事,寄托才子佳人穷达升沉的意图;仍依《再生缘》之例,"发潜德之幽光",演绎易代之际匹夫匹妇行为情感所折射出的民族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柳如是别传》中的男主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1610 年二十九岁时探花及第。钱谦益六十三岁以前,生活在明代;六十三岁以后,生活在清代。是一个身处易代之际,先经历过降清,复又从事过复明活动的文坛巨擘。他在明清两朝起起落落的宦海生涯,即充满着传奇色彩;加上六十岁时,在夫人陈氏安在的情况下,以合卺花烛迎娶秦淮明妓柳如是,更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柳如是二十四岁嫁入钱家,与钱谦益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风雨同行,危难共度,甚得钱氏欢心。生有一女。明末清初,支持并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1664 年(康熙三年)钱谦益八十三岁时去世后不久,家难发生。在族人的威逼下,柳如是用以死抗争的方式,结束钱柳因缘。

《柳如是别传》是一部讲述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沦落风尘,因结缡而走向各自的自我自赎的传奇,男女主角在越舞吴歌、更唱迭和之外,演绎君国兴亡、死生不渝之大义。据《柳如是别传》考述:柳如是幼姓杨,名爱,幼养于徐佛之家为婢,后至吴江故相周道登之家为妾,为群妾忌,卖与倡家,改名柳隐、柳是,字如是,取辛弃疾 "我看江山多妩媚,料江山看我应如此" 词意。柳如是流落人间后,与松江与云间胜流如宋辕文、李存我、陈子龙多有往来,思想情感、诗文写作受胜流名士影响甚多。宋辕文与柳如是同岁,初情甚好,后因宋的退缩,柳与之分手。对柳如是影响最大的是陈子龙。陈子龙大柳如是十岁,早年是复社、几社成员,又为云间诗派、词派名家,工婉约词。1647 年入清后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捕,投水自杀,年四十岁。《柳如是别传》第三章中,用相当的篇幅论述女主与陈子龙的交往。作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 4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 5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 5—6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 6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 4 页。

者考证陈柳情意甚密始于崇祯六年,同居的时期在崇祯八年初夏至秋深,分手的原因在陈夫人张氏的干涉。分手后陈、柳仍眷恋旧情,陈、柳此年前后的唱和较多。陈寅恪认为:柳如是最著名的《金明池·咏寒柳》词,是因陈龙子《上巳行》之语意而作,在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结识钱谦益之前。

柳如是的婚姻救赎是柳如是自己发动的。宋辕文、陈子龙不能成为依靠后,柳如是主动结识钱谦益。陈寅恪引顾苓《河东君传》记曰:

> 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留连半野堂,文宴浃月。越舞吴歌,族举递奏。香奁玉台,更唱迭和。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刻东山酬和集。集中称河东君云。①

柳如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的拜访促成了钱谦益的合卺花烛迎娶。柳如是以婚姻完成了对自己风尘生涯的救赎。但好景不长。半野堂、绛云楼的更唱迭和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是明清易代的血雨腥风。最终柳、钱以复明的奔走呼叫,完成对钱谦益降清行为的救赎。

庚辰结缡后一年(1641年),钱、柳至京口,凭吊韩世忠、梁红玉大战外敌的古战场。庚辰结缡后三年(1643年),绛云楼成。庚辰结缡后四年(1644年),崇祯死。百僚南京议推戴讨贼。钱谦益主张推潞王朱常涝,而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拥立下捷足先登。作为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无为,被人视为谀事马、阮。钱谦益任南明朝礼部尚书,携柳如是赴南京。庚辰结缡后五年(1645年),即顺治二年五月,清兵下江南,兵临城下。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殉国,钱谦益终未有走出殉国这一步的勇气。最后是钱谦益等三十一人出城迎降,遂成为钱谦益一生的愧疚与污点。七月,随例北行,柳如是未随行。庚辰结缡后六年(1646年),即顺治三年,清廷授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明史馆副总裁。五月,弘光朱由崧、潞藩朱常涝两人因叛乱罪被杀,六月,钱谦益引疾乞归。为洗刷城下降清与北上任职行为的耻辱,回籍后,与柳如是共同参与东南遗老志士的反清复明活动。庚辰结缡后七年(1647年),即顺治四年,钱谦益三月因黄毓祺起兵反清案牵连被逮,柳如是倾家营救,有人说贿金三十万。陈寅恪著述中考证钱氏已经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而另一史学家邓之诚认为钱家此年之后,贫富顿异,应与此次牢狱之灾有关。钱谦益此狱桎梏四十日,留南京颂系一年。灾事转化,与柳如是的拼死营救关系极大。

归里后,钱谦益与参与抗清的两位学生瞿式耜、郑成功联系密切,瞿式耜曾任流亡在肇庆的朱由榔南明永历政权的兵部尚书,1650年殉难桂林。此年,钱谦益藏有万卷古书的绛云楼毁于火灾。两事均为凶兆。另一学生郑成功最初效力于设在福州的南明隆武政权,后成为活动在沿海地区的抗清武装,有多次北伐之举。这些军事行为时胜时败,一直给钱谦益复明希望。钱谦益在接到永历政权李定国让其联络东南的指令后,甚至在1655年移居常熟白茆之芙蓉红豆山庄,因为这里离海上近,便于配合海上反清活动。此年钱谦益已七十五岁。稍后又与黄宗羲出资赎救抗清死难的张煌言的妻子。一切希望都在1661年后彻底破灭。此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后,移师台湾,次年死于台湾。永历被缅人所执,次年死于昆明。陈寅恪认为:"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而壮清廷及汉奸之气者,……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② 所以钱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349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208页。

谦益从红豆山庄迁回城中,柳如是因为绝望而落发入道。反清复明虽终无所成,但钱、柳之努力,可以看作是一种对降清行为的自我救赎。1664 年春夏之交,钱、柳先后辞世于半野堂。

陈寅恪论钱、柳因缘合于三生三死之说:

>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三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棋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①

又论与柳如是结缡对于钱谦益生命的重要意义:

> 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洩息矣。②

在政坛上,钱谦益常常是一个失败者。探花及第后横跨明末清初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处在党争不断、倾轧诬陷的旋涡之中,"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所谓'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③。其《明史》之编,毁于大火。《列朝诗集》,"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④,1649 年刊刻《笺注杜工部集》,"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⑤。至于学佛,"平生虽博涉内典,然实与真实信仰无关。初时不过用为文章之藻饰品,后来则借政治活动之烟幕弹耳"⑥。因此,与柳如是的结合,便凸显成为钱氏人生的最重要的成功。

钱谦益结缡柳如是的成功,使他成为明末清初的风流教主。陈寅恪文中比较明季江左三佳丽柳如是、王修微、杨宛叔嫁人后的命运,王与杨均终离所嫁之人,只有柳随钱而死。"牧斋于此,殊足自豪。"⑦陈园园、董小宛、柳如是皆一时名姝,钱谦益晚年《病榻消夏杂咏四十六首》对"陈、董被劫,柳则独免"甚为欣慰。陈寅恪论陈、董被劫及柳则独免的原因:一是因柳如是特具刚烈性格,大异当时遭际艰危之诸风尘弱质如陈、董者。二是名姝所附之人对待爱情的态度,高下勇怯有别,这是钱谦益高于冒辟疆、宋辕文之流的地方。《柳如是别传》中对柳如是的描述,除了性格刚烈,处事有男人之风长处外,还有"善记忆多诵读"⑧,才华出众的一面,同时又"合'倾国倾城'与'多愁多病'为一人。倘非得适牧斋,则终将不救矣"⑨的一面。柳如是留给女儿的《遗嘱》中有:"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⑩写出了对钱谦益生前,柳如是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尊重,也写出以死明志的刚烈与气节。对复明失败,柳如是的痛惜失望

---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 899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 439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 848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 1008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 1014 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 810 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 790 页。
⑧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 597 页。
⑨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 670 页。
⑩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 1232 页。

更甚于钱谦益。钱从白茆红豆山庄迁回城中后,柳如是继续在白茆红豆山庄居住,直到钱谦益病重才归。陈寅恪分析,柳如是总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国事家事的失望叠加,使柳如是断绝生念。柳如是的"不得不死",与王国维的"只欠一死",构成了一种遥远地呼应。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使两个处在不同的易代之际的历史人物,瞬间有了精神的相通。

在讨论钱、柳情感论题时,陈寅恪有了一次把元白《莺莺传》《长恨歌》及陈端生《再生缘》合而论之的机会:

> 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辙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郎陈端生范菼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①

这是第三次在《柳如是别传》中引用自己诗。朱叟为朱师辙,中山大学教师,退休后在杭州生活。陈诗因唱和朱叟在杭州观看《长生殿》绝句及《论再生缘》文成有感而作,因此有"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②之句。唱兴亡事,解不了情,是《长生殿》的主题,是《再生缘》的主题,也是钱柳因缘的主题。陈寅恪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所演绎的兴亡之事与男女之情,皆如卢梭、王国维所言,是"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的结果。执着于古今兴亡事,男女不了情的研究,是陈寅恪文学研究的主线。在围绕"兴亡事"与"不了情"的研究中,陈寅恪努力寻求论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普遍存在。它既在鸿儒士大夫去取进退中,也在孺子妇人琐细日常里。作者由衷地赞美兴亡事与不了情中的女性,便成为其"著书唯剩颂红妆"③自嘲的由来。

《柳如是别传》将"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与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解之同情"的重要。明末吴越佳丽的故事,如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与党社胜流交游,官家史书、坊间诗文中记述甚多,形成一时风雅。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末吴越间风气使然:

>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问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④

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联想。地域不同,吴越与齐鲁;时间有别,明末与清初。文士理想中的女性,由吴越佳丽遂成聊斋狐仙,好读小说之作者,用"了解之同情"式的阐释,把柳如是们与聊斋狐仙做了一次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中使用频度高,操作纯熟的研究方法。

钱谦益在乾隆年间因高宗以"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失据,文章那有光"⑤的评介而打入贰臣之列,去取进退颇受訾议。《柳如是别传》"颂红妆"的同时,也需给钱谦益以"了解之同情":

---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75—876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76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7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75页。
⑤ 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①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②

钱谦益降清,一是因为怯懦,二是迫于事势。清朝是女真八部在禹贡九州相承之土上建立的政权,按照文化优胜的原则,加上隆武、永历两个南明政权在福建、广东的苟延残喘,钱谦益反清复明的行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洗刷钱氏降清的污点。《四库全书提要》馆臣对钱谦益的评价多为媚主之言。至清代末年,官吏公文中"食毛践土"感戴之言满天飞,与钱谦益当年的仕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沧海已变桑田。后人念此,只余遐思无限。

诗文互证,以诗考史、释史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双重证据法之外,着意探究的文史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中已广泛使用,并发明甚多。写作《柳如是别传》时,因三百年间钱谦益、柳如是诗文曾遭禁毁;与钱、柳同时代人的记述多耳食或不实之言,需要甄别发覆之处甚众;加上钱谦益诗集的注者钱曾(遵王),作为钱谦益的族孙与学生,本是与事主晚年联系密切之人。但或避清讳,或刻意遮蔽,钱、柳因缘叙述需要的时、地、人多不明确。考虑《柳如是别传》写作的困难,陈寅恪在《缘起》中,辨析"今典"与"古典"概念,确立释证范围和义例: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③

此书释证钱柳之诗,止限于详考本事。至于通常故实,则不加注解,即或遵王之注有所未备,如无大关系,则亦不补充,以免繁赘。④

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⑤

第一条引文,诠释今典古典;第二条引文,确立释证钱柳诗,当以考证本事、释证今典为主;第三条引文,在释证钱柳时,钱、柳酬和诗的出处与脉络,当是重点中的重点。只有在酬和诗的思旨对应中,才能得其微妙。

虽然作者学术目标集中,围绕钱柳因缘,力求简洁,以免繁赘,但写作过程中,因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证实证伪,头绪繁杂,释证缠绕,《柳如是别传》的阅读,仍是一个艰难备至的过程。陈寅恪描述《柳如是别传》写作的艰难,常使用"然脂暝写"这个词语。陈寅恪以为"然脂暝写"此典来自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想到八十余万字浩繁精严的考释叙论,来自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十年然脂暝写的努力,读者对生命对学术的敬畏,便油然而生。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45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02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7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3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2页。

短毫濡泪记沧桑

“短毫濡泪记沧桑”[①]的诗句来自陈寅恪1950年所作《己丑除夕题吴辛旨诗》。吴辛旨名三立,为华南师大教授,曾任教于北京,与陈寅恪在1940年代即有联系,共住广州后,多有文字交往。短毫濡泪记沧桑,是他写也是自叙。陈寅恪诗,生前由夫人唐筼手写三册,1967年后因故遗失。上海古籍社1980年出版时收入《寒柳堂集》的《寅恪先生诗存》约150余题,是由弟子蒋天枢录存。蒋称其为“丛残旧稿”。1991年陈寅恪女儿陈美延、陈流苏应清华中文系之邀,联手编辑《陈寅恪诗集》,除她们姐妹的收集之外,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从《吴宓日记》及遗稿中,寻找到相当数量的陈寅恪诗稿。吴宓自1919年与陈寅恪在哈佛相识后,即注意在自己的《日记》中保存与陈有关的学术史料。直到垂暮之年,吴宓在自身困厄之中,还写信给中山大学,询问陈、唐夫妻的命运。吴宓对陈寅恪朋友间的真诚与关怀,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段佳话。收入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美延所编《陈寅恪集》中,陈寅恪诗约280余题。夫人唐筼,本来即是陈寅恪诗的主角及深度参与者。三联书店的《陈寅恪集·诗集》同时附录唐筼的诗作,在夫妻的唱和吟咏中,更见共命人的感情笃深。

《陈寅恪集·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庚戌柏林重九作》写于1910年的柏林,时年作者21岁。因在海外听到日本合并朝鲜的消息,而有“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②]的愤慨。中日甲午战争即因朝鲜主权而起,中国战败后,日割台湾,1910年再签《日韩合并条约》。日本一步步实行在亚洲扩张的野心,而中国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与挑战。1912年春,陈寅恪从瑞士短暂回国,辛亥革命后的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陈家遂避居上海。上海一时成为清王朝罢官废吏聚集之地,遗老与悲观情绪充斥其间。陈寅恪与在北京帝都的朋友胡梓方唱和:“千里书来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忧。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萤嘈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长秋。西山也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③]京洛当指北京南京两地,沦落江湖的胜流,萤嘈蛩心,幽忧万端。南昌西山峭庐是陈宝箴墓地。戊戌变政不成,当年的家难,而成今日的国忧。兴亡之恨,留待新篇续写。陈寅恪回到欧洲后,看到国内报纸有“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以法国巴黎选花魁的习俗讥讽国内的总统终身之议:“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④]陈寅恪留学时期的作品不多,但无不体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关心。

回清华教书后,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最好。王国维1927年6月2日投水,给陈寅恪极大的震动。其《挽王静安先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吾侪所学关天意”的惋惜,也有“赢得大清干净土,年年呜咽说灵均”[⑤]的殉清判断。七律挽诗让陈寅恪意犹未尽,又写长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仿王闿运、王国维《圆明园词》的笔意,叙写王国维的事功学术。诗中有“一死从容殉大伦”[⑥]句,结句为“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⑦],仍未脱殉清的痕迹。1953年蒋天枢访粤,陈寅恪与蒋面谈,蒋天枢依据老师的意思,为《挽词》长诗加注。蒋天枢所加注文,多为与诗句表达有关的本事。已流传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1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3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1—12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3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7页。

三十年的诗,再为其加注本事,可见作者对诗拒绝误读的决心。1927 年挽王国维诗序所持的“殉文化说”,至 1929 年陈寅恪所撰写的王国维的碑文中得到延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死者精神的升华,又是对生者精神的提振。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成为陈寅恪坚持一生的思想旗帜,也成为许多读书人所心驰神往的学术境界。

陈寅恪进入学术界,便自带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体的意识,希望中国学术,代有人出,自立自强。1926 年傅斯年归国,陈赠诗,直言学术界正新旧交接,“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而傅君学成归来,正好大显身手,对傅斯年寄寓“天下英雄独使君”[①]的厚望。1929 年在北大兼课,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抒写“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②]的感慨,把学术重建的希望寄予年轻学子。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夙愿在稍后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有更充分的表达。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战争后的流亡生活,陈寅恪比之于南渡乞食,比之于偷生岁月。在云南蒙自,陈寅恪有《戊寅蒙自七夕》诗云:“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唐筼和诗云:“独步台边惹客愁,国危家散恨悠悠。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③]旧时世家子弟、怀续命河汾之志的清华教授,因战争瞬间成为贫贱夫妻,陷入百事俱哀的苦难之中。右眼失明,图书丢失,三女美延尚在襁褓之中,唐筼与孩子暂居香港,五十岁的陈寅恪奔波香港昆明的途中。其 1939 年《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1942 年《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两诗如下:

>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狐狸埋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④]
>
>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⑤]

之后,又有双目的失明。在漂泊无依,书无可读,家不能养的种种压力下,诗人悲愤难抑:“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⑥]“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⑦]1945 年陈寅恪 56 岁生日之际,有绝句三首,其一其二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⑧]因双目失明、因生活困顿,陈寅恪陷入一生的低谷。

接下来是日本投降签约,“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⑨];接下来是英伦求医无果,“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⑩]。接下来是重返清华园,“五十八年流涕泪,可能留命到升平?”[⑪]接下

---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18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19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25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28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32—33 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39 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42 页。
⑧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43 页。
⑨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52 页。
⑩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58 页。
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61 页。

来是1948年12月15日从南苑机场匆匆飞离北京。陈寅恪有诗把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这次逃离北京称为“临老”亲历的“三次乱离”,哀叹:“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①

飞离北京后一个月,即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全家除大女儿因读书留下外,从上海乘船到广州,就职于岭南大学。这种“无端来作岭南人”②结果看似突兀,实际是陈寅恪求仁得仁的主动选择。这一选择在诗中被自嘲为“毁车杀马平生志”③“避秦心苦谁同喻”④。此时,国民党尚有半壁江山,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时。1949年的清明时节,诗人还是“余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⑤的人生忧患的叹息,至本年八月夏末,已换为“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⑥朝代更替的感慨。

岭南天暖,岭南多花。诗人赏梅之余,仍有“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⑦的浮想。只是时有空袭,给人“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⑧的违和。落地广州,诗人喜用“白头维摩”“岭表流民”自称,而居住心情也常用“寄寓”“羁泊”一类词语。陈寅恪1950年写给两位老友的诗,比较真实地写出当时的心境: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⑨

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惭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禅獦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⑩

前诗答叶恭绰。叶氏赠诗将陈比作目盲的左丘明、师旷,陈诗改龚自珍诗句“著书都为稻粱谋”作答,屈赋魂魄还在,续命河汾梦休。抗战时叶恭绰也曾避居香港,因此香江曾有共同回忆。后诗答吴宓。吴宓时在重庆。本年为陈寅恪祝寿,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语。陈寅恪以为在战事未休的当下,得多方关照,岭表寄身,已是避乱的生活节奏。粤地面山向海,曾是南宗六祖慧能的成长地。悟禅与望海,均有可为。

岭南居住,避得战乱,避得寒冷,有梅可赏,但日子还要从柴米油盐过起。作为家庭主妇,唐筼1951年元旦有诗云:“浮海相携岭外家,守贫何碍到天涯。”⑪诗里没有埋怨,只是一种真实描述。陈寅恪好言劝慰:“夫妻贫贱寻常事,乱世能全未可嗟。”⑫陈寅恪为高血压所困,述其痛苦:“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⑬唐筼教以参禅解痛之法:“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⑭面对如此相依为命的老年生活,解诗者自不可心机太深。

---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3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5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7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0页。
⑧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2页。
⑨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0页。
⑩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2页。
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页。
⑫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页。
⑬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页。
⑭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页。

至于学术,毕竟经历改朝换代,许多变化则如春江水暖,学人自知: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①

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县。②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③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④

第一首题为《文章》,应是讽刺文章写作恪守八股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首题为《旧史》,宋魏以降国史,南北互轻,魏沈相诮,对生民倒悬均漠不关心。第三首为《经史》,对学术界以经为虚、以史为腐甚为担忧。没有经史为根柢的学术,可能陷入秦儒说瓜、相难不决的窘境。第四首有感于北京琉璃厂书肆旧书改业新书,张之洞当年琉璃厂必有千秋的预言从此毁弃。

1950 年后,陈寅恪就可能遭遇北客催归之事,于是《陈寅恪集·诗集》有《改旧句寄北》诗。诗人把1947年所作《丁亥春日清华园作》一诗稍作修改寄上。中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⑤句。1952 年春,陈寅恪有《壬辰春日作》集中写出南渡与北归之间的考量:“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芳时已被冬郎误,何地能招自古魂。”⑥芳时已误,清华难回。清华是他和唐筼的结缡之地,那里有最好的学术时光。因此《陈寅恪集·诗集》中多处回忆燕郊旧园。1953 年,有《答北客》诗:“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⑦柳宗元有“欲采苹花不自由”诗,苏轼有“但忧无蟹有监州”诗,诗人改写,表明不再考虑北上的决心。

中山大学教授朱师辙,长陈寅恪十三岁,为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之孙,安徽籍人,退休后至杭州定居。陈寅恪有《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⑧。杭州牌坊山是父亲陈三立的埋葬地,在粤湿燕寒的比较中,杭州不失为定居的理想去处。

1953 年进入《论再生缘》的写作,随后又有十年《柳如是别传》的写作,诗人的论史笺诗工作充满着艰辛,并成为其生命重要组成部分。其 68 岁生日,感叹病中写书,不知何日可以刊布。诗云:

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格调更无俦。

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⑨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夷门醇酒知难贳,聊把清歌伴浊樽。⑩

陈寅恪把一生中抗战流亡与流民岭南看作两次南渡。第一次南渡是抗战流亡,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流亡中的读书人对晚明流亡政权集体产生联想,与晚明有关的研究论著、文学作品渐渐增多。第一次南渡中的陈寅恪在昆明得芙蓉山庄红豆,移至唐筼家乡后,在桂林居所与红豆树为伴,知红豆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78 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78 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86 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81 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85 页。
⑥ 陈延美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88 页。
⑦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100 页。
⑧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96 页。
⑨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128 页。
⑩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 128 页。

4到6年才结籽一次。其时,温旧梦,寄遐想的想法已悄悄萌生。第二次南渡,成为岭南流民,受《论再生缘》成功的鼓舞,便将平生所学,在生命衰颓的情况下,作一次“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的努力,以证史笺诗功夫,还原老牧、阿云的因缘;在钱柳因缘中,寄写独立精神之心事,刻画自由思想之遐想。因担心此书不能刊布,又做好仿效南宋郑所南《心史》封函井中思想准备。

《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也占据着唐筼的生命空间。原错以为陈寅恪1955年所写之诗,在三联书店版的《陈寅恪集·诗集》中被纠正为唐筼之诗。诗云:

今辰同醉此深杯,香椽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①

诗为陈寅恪66岁生日而作。夫人操持肴蔬,燃脂研墨,帮助高才之人,考评陈、范,笺释钱、杨。回忆燕都初见时,也是以这样的心情安排小酌。学术中的夫唱妇随与生活中的妇唱夫随,使他们从北京,走到岭南。

《柳如是别传》完成,陈寅恪也进入“以病为邻”的生命时期。其《寒夕》诗云:“寒夕无文燕,闲居有病身。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飘忽魂何往,迷离梦未真。酒茶今并禁,药物更相亲。”② 以病为邻的时期,虽然感慨“闻歌易触平生感,治史难逃后学嗤。”③ “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④ 陈寅恪还是坚持《寒柳堂记梦》的写作。这是他最后一部与义宁之学,与湖南新政、与陈、唐因缘有关的著述。一代史学大师以一部家传,为一生的学术著述划上句号。

在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陈寅恪是一个史学现代化中的标志性人物。他出身于晚清世家,其家庭曾处在维新变法的风口之上,祖父仕宦、父亲文学,皆有较高的知名度。出自名门的经历与苦难,使敏感好学的陈寅恪获得独特的阅读社会与历史的经验,打下中国学术的根底,并在辛亥革命的易代之际,领悟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真谛。之后辗转数国20余年的学习经历,使陈寅恪了解西方学术的发展,接受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深知处在西学东渐中的中国学术,当选择宋代儒家“采佛学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的策略,与世界学术会通。在儒、释、道、西学重压下的中国学人,读书治学,“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才得以发扬。这种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精神,被陈寅恪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一直为陈寅恪所坚持,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被表述为“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⑤。又被表述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一直为陈寅恪所据守。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红妆”中,作者所颂,均归结于独立自由二义。其《赠蒋秉南序》中所引以自儆的“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精神依据,也在于此。

陈寅恪进入学术选择从“殊族之史,异域之文”处入手,寻找中国西域学与世界东方学的连接融会。在后五四时代,中国大学快速发展,急需自成体系,充分利用新发现、新材料,与西学融合贯通,坚持民族本位立场的中国史课程与教材。根据大学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需要,陈寅恪遂转向中古史的

①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228页。
②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60页。
③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64页。
④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71页。
⑤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⑥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页。

研究。并在抗战流亡中,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述论稿》两部中古史研究专著。两部著述坚持文化高于血统的基本观点,认为李唐的成功在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有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两部史著在结构上带有旧史学繁琐求证的特点,但其史论是截断众流,新意迭起的。陈寅恪史学著述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对抗战中的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意义重大。

陈寅恪的学术兴趣,在 1944 年《元白诗笺证稿》初成及长达十几年的修改中,更多地转向文学。在文学研究中,佛教传播的中唱偈、元白的长庆体及《再生缘》的弹词,被联系起来,雅与俗的转换,构成文学史发展的契机。而民间女词人、吴门佳丽,也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并在“了解之同情”与“诗史互证”立场与方法的互动下,获得了经典的意义。

陈寅恪最值得尊敬的还在他顽强的生命意志。病目使他“续命河汾”的理想大受打击。他在一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为中古史奠基的两部著作;他在双目失明的困厄中,完成其他著作的修改、著述。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耿介、傲岸,与他接受的教育与文化有关,也是他生命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陈寅恪不是社会对立者,而是命运抗争者。把陈寅恪看作社会的对立者,可能是对陈寅恪最大的伤害。“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所创造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成为今天研究陈寅恪所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

责任编辑:冯济平

Chen Yinque'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Literary Research (Part II)

Guan Ai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Chen Yinque is a famous scholar of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His academic research went through three periods: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with external ethnic groups in his early years, mediaeval history up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Yuan-Bai poetry in middle age, and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and biography of Liu Rushi in his later years. Due to his interest in literature,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while exhausting all th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Orientalism and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particular, in the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epeated revision and supplement of *Manuscripts of Study on Bai Juyi and Yuan Zhen's Poems*, he created and perfected a new method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based on poems. With the new method of verifying history through poetry, he grasped the elements of man, space and time in Chinese poetry, and explained the changes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history. In his later years, beginning with poems and essays, Chen supplemented with local chronicles and books, and engag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Rushi and Qian Qianyi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based on poetic evidence. The nearly 300 old poems he composed are results of his vicissitudes of life.

Key words: Chen Yinque; literary studies; verify history through poetry; praise females

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贺立龙 刘雪晴 董子立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理论逻辑、历史演进、趋势特征三个层面考察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耦合演化关系,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提供一个技术分析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根源于资本逐利的天性,是资本不断发掘技术与金融手段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结果;科技革命构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技术动因;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演化的一个典型趋势,在不同的科技革命形态下有不同的演变特点。探究资本主义金融化新动向背后的逻辑、动因及经济社会效应,必须重视科技革命与技术形态演化的潜在影响,警惕"科技滥用"对市场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助推效应,探索构建信息、数字及智能技术形态下的过度金融化监测评估及风险管控体系。

关键词: 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资本;"技术-经济"范式;技术形态

中图分类号: F124.3;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46-12

一、引 言

1970年代以来,金融化逐渐被视作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科技革命催生产业变革,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生产力飞速发展,加之科技与金融日益融合,经济社会发展愈加显露出"金融化"趋向。但也应看到,技术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别是新技术涌现对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强力助推作用,也可能挤压实业投资[①],带来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经济活动重心转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反过来阻碍技术创新。那么,科技革命是否构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影响因素?这一影响的典型表现和理论逻辑是什么,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否相同?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亟需从历史、逻辑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及其形成。学界对金融化概念的界定,大致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宏观地位上升的视角[②],金融部门转型的视角,企业微观治理的视角[③],资本积累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ZDA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贺立龙,男,山东泰安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刘雪晴,女,河南开封人,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董子立,女,四川成都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① 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② 杨玲、胡连生:《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社会矛盾的加深与激化》,《理论探讨》2017年第4期。

③ Foster J. B.,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2007, 58(11),pp.1-12.

模式的视角[①],资本间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重构的视角[②]。关于金融化形成的解释,则有劳资关系变革的视角[③]以及基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视角[④],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金融拜物教方面寻求原因[⑤]。但是较少有学者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层面来探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技术动因或工具支撑。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包括金融化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分析,绝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方式背景。由此,我们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审视金融化形成与演化背后的技术动因。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技术与科学的萌发,到科技革命的产生及其驱动的工业革命或产业变革,再到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形成与不断完善,人们对生产力、科技、产业及经济结构、经济与金融的耦合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科技革命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带动产业变革和就业结构调整;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运用,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市场经济在更广阔领域与空间发展,为金融化及其全球蔓延准备了物质技术支撑。[⑥] 随着信息时代到来,信息科技革命影响到人类思维与行为模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市场经济运行技术形态。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对经济流通尤其是金融运转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金融交易网络化、服务一体化、对象精准化、操作简易化,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和价值评估的成本”[⑦],甚至重新塑造了金融业务、服务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使货币形态转向数字化、货币流通日趋网络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推动了虚拟货币的不断创新和转型[⑧]。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黏合,而是以类似化学反应的方式推动着金融的发展与深化。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便利,其运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被不断扩展至极限,甚至使一些承接西方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

二、科技革命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理论逻辑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并非一种短暂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由多重经济关系交织形成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存在着深刻的生产方式根基与经济结构演化机理。审视与剖析金融化发展演进的技术动因与科技形态,有助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虚拟外表下的结构症结与运行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命题,但其关于货币、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和

① 蔡万焕:《危机后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是否结束》,《当代经济研究》2011 年第 8 期;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

② Palley T. I ., "Financializ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26(9),pp.9-15.

③ 尹兴、董金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

④ 张敏:《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美国经济金融化问题分析》,《学术交流》2010 年第 1 期。

⑤ 李瑞德:《资本拜物教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当代经济研究》2015 年第 7 期。

⑥ 羌建新:《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⑦ 欧阳彬:《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⑧ 羌建新:《人类走向数字货币时代》,《世界知识》2020 年第 15 期。

信用制度等的论述为我们探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提供了基本原理乃至分析框架。在金融形式变迁层面,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货币及金融工具虚拟化趋势构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资本运行与演进层面,马克思阐释了资本的形成本质及循环周期规律,通过分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说明了资本的运动规律,描绘与阐释了借贷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与演化中的各种技术形态。

1. 货币及金融工具变迁中的技术因素

货币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过程本身蕴藏着货币职能转变的可能性,故"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因而"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伴随经济社会与商品交换的规模化、便捷化发展,货币职能及其形式不断深化,这一发展过程背后有着"商品、劳务与设备等的技术支撑"。[①] 此外,货币形式的转变又会导致市场交易方式的变革,表现为交易链条缩短、交易成本降低、金融分工更加发达,从而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和商品化的有形、无形产品日益丰富,扩大了货币的交易对象和作用范围,促进了货币化的发展。[②] 因而,"历史地看,每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而货币形态的沿革也同样折射出技术变迁的印迹。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功能效应存在着技术条件的约束"[③]。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因而,科技进步在提高社会生产力、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催生出信用制度和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信用货币,"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④] 作为一种替代货币的金融工具,信用货币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进一步带动股份资本的形成以及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流通,从而体现出货币职能的深化和职能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加密技术与区块链技术发展,加密货币应运而生。在大幅缩减交易成本的同时,加密货币呈现"高效私密"交易特征,推动经济金融化与虚拟化的发展。"据Coin Gecko数据显示,全球加密货币市值估测达到9710万亿美元,其中比特币市值占比为22.4%,以太坊市值占比为12%。"[⑤]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加密货币"从复杂且低效的基础技术开始,以规避与中间商即传统银行的利益冲突为目的",实质是"一种骗局,并迅速成为许多诈骗者的首选支付方式"。[⑥]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8、152页。

② 陈享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下的金融化现象解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

③ 曾康霖:《金融经济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5、164页。

⑤ Coin Gecko:《按市值计算的加密货币价格》,2022年6月16日,https://www.coingecko.com/.

⑥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the Big Short to the Big Scam", 2022-06-07,https://www.akilligundem.com/from-the-big-short-to-the-big-scam/.

2. 信贷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与演化的技术动因

科技进步是推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技术动因与支撑。伴随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一方面，社会资本在单个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通过积聚和集中两种途径汇集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①。因而资本积累可以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模扩大，又会引起技术构成的进一步变革，最终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利润率下降并产生相对过剩资本。在伴有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过剩。为满足价值增殖的目的，这些过剩资本必然会从利润率降低的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领域，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并形成财富垄断，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只拥有极少数的财富总量，由此导致工人日益贫困化，其消费能力逐渐衰减。膨胀式的产品生产与狭小的市场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导致实体经济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资本在竞争或者危机中被挤出生产领域，开始在金融业继续寻求增殖机会②，“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③。

在信用杠杆作用下，资本集中规模逐渐扩大，过剩资本从职能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形成生息资本。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对货币资本家而言，生息资本增殖就是“钱生钱”的游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似乎不通过任何生产活动就能产出利润，“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④。实际上，金融利润是金融资本家向产业资本家让渡货币资本支配权而分享的产业利润，金融部门不创造利润但参与价值的实现过程。⑤ 货币资本积累即金融利润的形成过程包括以下三步：首先货币资本家或金融资本家将手中的金融资本借贷给产业资本家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次，产业资本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三种形式的变化，再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扩大的货币资本形式复归；最后，产业资本家将部分利润以利息的形式偿还给金融资本家，即金融资本以利息形式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完成金融资本的积累。⑥ 在这一过程中，信用的作用体现在“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⑦。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具有了高利贷资本的性质。这种脱离产业资本形式而独立完成的资本循环过程，意味着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开启独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724 页。
② 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77—57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8 页。
⑤ 文书洋、牟爽、刘锡良：《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基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分析与实证证据》，《经济学家》2020 年第 6 期。
⑥ 朱东波、任力：《“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2017 年第 12 期。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440、497—498 页。

运行模式。此时,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工具与交易机制更加复杂,金融虚拟化趋势出现。现代金融业正是以虚拟性的资本为基础,进行“钱生钱”的金融活动,迎合了剥削者的“暴发户”本质。[①] 信用货币是生息资本的高级形式,这种货币是以虚拟化的票据和数字符号化的货币流通为基础。从本质上来看,虚拟资本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与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的货币资本积累相比,虚拟资本积累是以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它推动了资本的虚拟化发展,尤其各种金融创新衍生工具使虚拟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二)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解析

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研究欧派克石油危机原因和后果时,意识到技术创新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这一观点集中于其《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佩蕾丝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的解释框架,并将金融化融入到技术创新的经济长波理论中,为揭示科技革命与金融化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佩蕾丝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就是一次发展的巨潮,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性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形成具有普及性的“常识”并渗透到社会实践中,通过形成“包容排斥机制”使整体经济生产率提高。一般而言,每次发展巨潮大约要持续45—60年。佩蕾丝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导入期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导入期是新旧范式斗争的时期,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技术会遭遇旧范式的抵抗,并在金融资本地推动下,与科技革命相关的核心产业和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于是,金融资本扩张并趋于膨胀,导致以衰退为标志的转折点出现。泡沫破灭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而此时“高歌凯旋的新范式以其现代化的力量重新组织和塑造了整个经济结构,这种力量已经变成了标准的最佳惯性方式,充分发挥了它的财富生产潜力”[②]。

正如佩蕾丝所说,“技术革命中要求最严苛的试验基地正是金融世界本身,……在每一种范式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组织的创新当中,有一些加速了货物的运输和信息的传输。这些创新通常又可以接着作为变革之源服务于货币、银行和金融部门”。因而,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传播都倾向于刺激金融领域创新,推动金融资本获取超越生产资本的支配权,加速金融化进程。“大爆炸宣告着技术革命的到来,具有革命性的新兴企业家们很快超越了所有现有部门的利润创造潜力,金融资本向他们蜂拥而来,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开发出适当的新金融工具。”因此,市场中存在着大量寻找盈利机会的“闲置货币”,它们具有与生俱来的流动性但无法被技术革命全部吸收。但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以钱生钱”的目的,于是,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断裂从此开始。狂热阶段是金融资本从自身起飞的喧嚣阶段,也是一个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阶段。依靠技术革命的支持和运用,金融资本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以钱生钱”的任务:一是通过建立贷款“倒金字塔”来控制正在运转的企业,

① 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21、44页。

二是对房地产、黄金和贵金属、期货市场、艺术、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操作工具进行投机。“随着可用资金数量的增长,名义价值的增值是自我强化的,其结果被概括为资产膨胀。”特别是狂热阶段末期,金融资本家们沉迷于赌场经济的狂热迷乱气氛中,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严重。“一方是金融体系内竞逐高额回报的大量金钱,另一方是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中财富创造的总体速度。作为其结果的资产价格膨胀产生了没有保证的资本收益,这种收益完全脱离了它们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利润和股息。”于是,任何事物的实际价值概念都被抛弃,资产膨胀不可控制,在账面财富与真实财富之间、技术革命核心产品的现有需求规模和潜在供给规模之间、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和那些收获了泡沫果实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因而“金融化”局面形成。但这种金融泡沫的幻觉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在浪潮转折点的十字路口,经济崩溃为狂热阶段画上了句号,它使金融资本不情愿地回到了现实,并开启重新确立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恰当联系的清算与接受时期。一旦适当的条件被创造出来,协同阶段就开始了。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本被重新明确为财富的创造者,而金融资本则是其促进者,“金融资本充分发挥了它的中介作用,其作风的浮华和冒险程度当然小于在赌场经济中,但却以更稳定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润”。①

到了成熟阶段,许多主流范式中的核心产业都呈现出枯竭的迹象,但高度模式化的旧产业仍有条件尝试未经验证的技术和拓展市场,这种尝试越是成功越使其积累更多,从而闲置资金增多,金融资本又开始泛滥并寻找其他出路。“金融资本开始支持在边缘部门的投资,向远方的新客户销售,并将生产转移到更廉价的地方。”② 同时,拥有好项目的借款者越来越少,金融资本贷款的标准逐渐降低,贷款被拨付给越来越弱的债务人,伴随的风险贴水也就越来越高。因此,这时金融资本所表现的行动将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和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播下种子。

佩蕾丝指出,自 18 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伴随出现了五次技术革命,相应形成了五次发展巨潮:1771 年英国产业革命,1829 年蒸汽和铁路革命,1875 年钢铁、电力、重工业革命,1908 年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革命,1972 年信息和远程通讯革命。每次发展的巨潮,“都出现了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对新型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狂潮,大量的货币倾泻到这种过程中,最后在泡沫破灭后,大量堆积的纸面财富被消灭了”③。

三、历次科技革命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历史演进

回顾资本主义经济史,可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货币化阶段、经济证券化阶段、经济虚拟化阶段和经济数字化阶段,由此构成了经济金融化的萌芽、初级、中级和高级形式,“货币化和证券化是金融化的先导和基础,当货币化和证券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虚拟化趋势才随

① 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第 104—105、82、112、120 页。

② 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第 146、91 页。

③ 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年第 2 期。

非货币类金融工具的迅速扩张而趋于强劲”[①],成为金融全面渗透于现代经济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革命一般划分为四次,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互联网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新兴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基于此,我们梳理与审视历次科技革命影响或驱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货币化

1760年代,英国率先通过蒸汽动力实现机械化生产,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人类的生产水平进入到蒸汽动力时代。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变革推动了英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并利用高生产年率控制以自然条件为优势的农业市场,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垂直型”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垄断了国际贸易。[②]随后,蒸汽机技术很快越过了国界,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广泛生产和应用,蒸汽机的发明为国际交通运输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787年,美国发明家菲奇制造了第一艘轮船,但由于其航行速度较慢而没有实用价值。1807年,富尔顿在美国建造了“克莱蒙号”用于在哈德逊河上连接纽约和奥尔巴,其航速远快于一般帆船,它标志着蒸汽动力船取代帆船的新时代到来。1829年,英国工程师史蒂芬森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起来,并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试验成功,随后这一技术广泛传播,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的机车。由此,轮船的出现使人类征服了海洋,火车的诞生使人类征服了陆地,国内和国际间贸易日渐繁荣。工业革命前农业仍是美国的主导产业和财富来源,但到1770年代,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在英国控制下商业繁荣的港口。贸易尤其是国际间贸易的快速发展对货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社会经济生活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货币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商品交换领域,还涉及非商品交换领域,因而呈现出经济货币化趋势。这种货币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易货币化,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量比重上升,而物物交换比重减少;二是收入货币化,即居民收入分配中货币收入比重上升,而实物分配比重下降;三是资产货币化,即居民持有的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实物性资产比重下降。

货币是金融的原始形态,也是金融的基础核心元素,因而建立在货币基础性地位之上的经济货币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催生出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而引发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变革,使国际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贸易往来增加了货币需求,使货币的使用范围扩大,交易、收入和资产方面均呈现出货币化趋势,因而,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态即经济货币化趋势形成。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证券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自然科学为先导,以电力为主要标志,包括无线电、内燃技术、冶金和化学等方面的技术革新。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明了电磁感应,整个电磁学的发展过程既是电磁理论的完善过程,也是电技术开发及应用过程。“1886年美国的斯坦德莱建立了美国最早的交流发电厂,把交流电首次用于商业照明”[③],这意味着以电作为新形式的能源被逐渐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电气技术的兴起既引起了动力革命,也激起了通讯革命。随后,莫尔斯发明出电报机和电码,贝尔发明

① 韩璟:《经济金融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第10页。
② 田云华、周燕萍、邹浩、王凌峰:《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2020年第2期。
③ 郑积源编:《科学技术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出电话，康拉德建立了第一家商业无线电广播台，电报、电话和无线电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工业化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革新是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1886 年奥托发明出内燃机，并在同年应用于汽车生产，随后又成为了飞机的理想能源。内燃机的应用促进了冶炼工业的发展，1875 年，安德鲁·卡内基成立了第一家使用酸性转炉炼钢的美国钢铁厂，钢铁时代由此开启。“在 1860 年，美国所需的钢铁还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短短几十年后，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过超过了全欧洲钢铁产量的总和。仅卡内基钢铁公司一家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全国的产量。”钢铁产量的快速提升带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美国的铁路总里程也从南北战争结束时 3.5 万英里增长到 1890 年时的 16.4 万英里”，进而为许多重工业产品如钢轨、铜线、机车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①] 这一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催生出垄断制，即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依靠先进技术设备的优势进而控制市场，使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并产生巨额的资金需求。1817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在此之后工业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逐渐从银行间接融资的制约条件中解脱出来，转向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领域。1878 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尚未有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公司，但到了 1900 年，工业股票已经成为华尔街股票的主力。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金融机构日益丰富，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证券市场交易成为主导性的金融交易方式，因而经济证券化是一个走向成熟的金融发展形态，是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式。以自然科学为先导，电力、内燃机和化工技术的应用与革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实现，而且带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垄断引起的巨额资金需求与银行间接融资的制约条件产生矛盾，从而滋生出新的融资方式即证券市场交易，使更多的个人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国民经过经济中的证券化资产比重提高，经济呈现出证券化趋势。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

信息技术是在十九世纪末物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无线电报、三极管、雷达和电视等的发明到半导体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再到电子计算机、微波技术、自动化技术的出现，电子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946 年 2 月，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宣告制成，其计算速度比当时最快的机电式计算机要快一千倍，标志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随后，计算机技术经历了五代的衍化发展。1972 年，英特尔微处理器作为最早和最简单的芯片上的计算机宣告问世，这种微处理器大大降低了计算机的生产成本，它标志着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诞生。硅谷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使科技创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这反过来也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造富运动。“1980 年，随苹果电脑公司成功上市并公开募集资金 13 亿美元，风险投资机构蜂拥而至，竞相在硅谷设立办公室。”“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业这样迅速而密集地应用计算机了。在微处理器问世 10 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就彻底改头换面了。”[②] 进入 1980 年代的华尔街，计算机和通信卫星技术使人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美国获得不受限制印刷美元纸币的特权，从而金融衍生工具兴起把金融推向了

① 约翰·S. 戈登：《伟大的博弈》，祁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251、252 页。

② 约翰·S. 戈登：《伟大的博弈》，祁斌译，第 499、496 页。

高度虚拟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金融市场面临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和高通货膨胀的新环境,为了规避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等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方式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虚拟性更强的金融工具,并通过网络技术提供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结算等金融相关业务,金融创新不断深化①,现代金融理论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获得转变,推动了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业发展。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核心的经济虚拟化是经济金融化的中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依托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虚拟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经济金融化步入稳定阶段。

(四)第四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数字化

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重视并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从而引领世界进入到经济数字化时代。1998年1月,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首次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同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揭开了美国经济数字化的大幕。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反映美国信息技术革命引致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提法。"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②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生产和消费逐渐由工业化转向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效率实现再次飞跃,网络、信息、数据和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其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从而经济形态呈现出知识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明确指出数字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了全球的生产和生活。③ 据统计,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增速高达6.8%;占GDP比重为59.2%,增速达1.6%。④ 新兴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不仅为工业部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资本市场带来了变革。正如《商业周刊》所说,数字经济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金融革命,它使当今世界的经济变化超出多数人的意识。对传统银行而言,"银行业不得不置身于市场机制中,在这种机制下一家银行只有致力于利用与客户的关系创在价值。银行通过获得与用户相关的信息,深入分析,集成化,并从每位客户的利益出发最终实现信息的价值"⑤。银行业逐渐向数字化、虚拟化发展,为家庭资产向资本市场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参与全球性金融资产的家庭比率高达43%。⑥1990年代以来,虚拟货币、衍生性金融产品、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在美国相继出现,通过金融交易杠杆化使企业融资更加便利,进而资本市场规模扩大,资本流动

① 安强身:《民间资本异化与后疫情时代的本质回归》,《东方论坛》2022年第2期。

② 中国网信网:《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9月29日,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

③ 俞裕兰、杨靛青:《数字经济背景下离岸软件外包双边匹配推荐模型——基于考虑心理因素的多时点目标决策》,《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④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⑤ [美]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等:《数字经济蓝图电子商务的勃兴》,陈劲、何丹译,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⑥ 徐文娣、李聪、邵雯玉:《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性大大增强；而资本市场扩大又刺激了投资，导致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增强。从纳斯达克指数来看，1990 年 10 月该指数处于低位，在 320 点左右；而 2000 年 3 月 10 日，已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达 5132 点。资本市场的繁荣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其中，正如克里普纳所说："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们已生活在金融世界。"[①] 为应对 2007—2008 年间的经济大衰退，美国政府为大银行提供了补贴，但最终的财政赤字压力承担者是工薪阶层，而金融业采取降低利率等措施，但仍能通过抵押房贷、信用卡贷款、助学贷款等为自身谋利。因而，投资理财观念成为人们日常思维的重要内容，家庭愈发成为一个金融决策单位，从而导致人们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四、当前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演化的趋势特征

伴随技术更新迭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总体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逐渐渗透至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层面，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传统银行业逐渐向数字化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流动性增强，金融因素甚至是金融资本日益渗透到每个家庭内部，经济金融化已成为一种全域性常态化现象。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凭借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与核心力量，像毛细血管一样向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面扩张和深度渗透，迫使每一个人不断地接受、遵循和采纳金融化的活动方式、行为规则、思维理念，并将其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熟视无睹的存在方式。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与日常观念都深深地打上了金融的烙印，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感叹：我们已完全生活在金融世界。一方面，从基本生活资料到其他社会物质条件，其在被实际消费前，很大程度上都已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掌控，甚至转化为全球期货交易市场中的标的物，被牢牢地吸附在金融垄断资本价值增殖的链条上。[②] 另一方面，基于技术特性，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强的客户 "触达" 能力[③]，家庭作为日常交往活动的基本单位，愈发成为一个从事跨行业、跨时期、跨区域投资理财的金融决策单元。"也就是说，家庭通常持有了全部金融市场的一个截断面，它们的财富与整个市场紧密联系而不是仅仅和某一个特定公司相联系。"[④] 此外，"信息技术发展为组织结构扁平化提供了技术支持，组织的内在秩序、规则与结构开始重构"[⑤]。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与技术更新加持下，企业逐渐重视市值与股利的相关决策，股东价值在企业目标中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不仅改变了公司的价值导向、员工阶层的福利，也塑造着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基于美国现实经验的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使得创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出现失衡，政府并没有直接从技术创新成功中获得相应的税收或知识产权收益，而金融行动者却利用自身的有利位置，通过金融市场攫取了与其贡献不相称的超额回报。[⑥]

---

① 格·R. 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常盛、李春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 年第 6 期。

② 鲁春义：《经济金融化的理论机制及其实践——基于资本积累理论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8 期。

③ 张正平、黄帆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东方论坛》2022 年第 3 期。

④ 欧阳彬：《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⑤ 许清清、路兰、刘鹏程：《复杂网络视角下劳动自组织的演化路径与政府机制设计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0 期。

⑥ 李国武：《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金融与社会》2020 年第 1 期。

科技革命催生产变革。科技与金融日益融合促使金融业地位显著提升,也导致实体经济衰退并呈现产业空心化趋势。一方面,“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改造最显著和最深刻的领域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特别是金融模式”①、云计算及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空前发展,孕育出加密货币,实现了数字金融交易的时空延展,更加紧密地将各个时期、空间以多种嵌套形式链接起来,不仅能实现当前剩余价值与未来各期剩余价值之间的配置,同时也便利了各种风险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转移。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及运行框架下,基于资本的趋利性,西方跨国公司将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廉的亚非拉国家转移,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产能下降趋势、产业体系日渐单一、工业及制造业规模日益萎缩、工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百分比逐年下降等结构性矛盾。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而疫情下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医疗物资短缺,凸显了制造业和实体产业空心化的矛盾和不良影响,推动人们反思过度金融化的利弊得失。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新的经济运行形态应运而生,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的“资本脱域性”因信息技术赋能变得更强但更隐蔽,更具统治力的数字资本产生并形成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运行的巨大操纵力。借助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态,新兴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资本,融合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形态,将资本扩张与增殖的力量渗透到涵盖生产与生活、金融与实体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信息技术革命,“隐蔽性地”强化了资本输出和对新兴国家的掠夺。② 当前,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金融体系下更加猖獗,通过让全世界为其金融危机买单的模式,美国率先复苏并开启“美国制造”回归之路,加大对其他国家甚至盟国的经济掠夺。③

五、结 语

本文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技术视角。长期以来,学界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分析,往往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制度根基出发,探讨金融化的制度本质及经济效应,却较少涉及生产力和技术层面的因素分析,从而忽略了金融化的技术动因及科技架构,这可能阻碍对资本主义金融化历史演变规律及趋势特征的认识,也不利于找到金融化应对的技术支撑及“工具箱”。

为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演进和时代特征三个层面,探究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与演化的影响,有如下几点发现。第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根源于资本逐利的天性,是资本不断发掘新的技术与金融手段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当资本与实业部门形成良性互动时,资本逐利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而当资本脱离实体产业甚至形成虚拟经济空转时,资本逐利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甚至带来金融危机。第二,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提供了技术动因和支撑。科技创新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与演进的重要催化因素。第三,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不同的科技革命形态下具有不同

① 栾文莲:《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的原因分析》,《党政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刘鹏程:《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7、48页。

③ 姬旭辉、叶青:《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展阶段、危机演变与疫情冲击》,《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3期。

的特征。特别是1970年代末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呈现“过度金融化”的特征。第四,过度放松金融监管会加剧金融化的不良经济后果。1970年代末以来的泡沫经济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代到2000年代之初的互联网狂热与技术泡沫破灭,第二个阶段是2003—2007年的信用泡沫破灭。[①] 其中,第二阶段正是由于在第一阶段泡沫破灭后未及时加强金融监管、放任自由市场所导致的。

经济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进的典型特征,根本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矛盾,但审视其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与运行形态,决不能忽视生产力结构及其科技形态的支撑性作用。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背后的技术动因,剖析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乃至虚拟化的具体影响,既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防范资本主义过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入”,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能的过度金融化风险应对,提供科学的技术分析范式与有效的对策工具箱。当前我国亟需警惕“科技金融技术滥用”和“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过度”对国民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助推效应,积极探索构建基于信息、数字及智能技术形态的金融化监测评估及风险管控体系。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He Lilong Liu Xueqing Dong Zil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upling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rend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provide a techn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is rooted in capital's nature of chasing profits,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capital's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means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surplus valu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onstitutes the technological motivation f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As a typic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commodity currency relations, financialization has differen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form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logic, motivation and social effects behind the new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financializat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form evolution, keep alert to the boost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buse" on the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of market economy,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fully embedd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finacial capital; technology-economy paradign; technological form

① 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企业金融化的收入效应

——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孙维峰[1] 姚泽辉[2] 孙华平[3]

1. 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山西 运城 044000; 2. 青海民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3.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基于201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具有正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正效应。当企业处于适度金融化时,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正效应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企业处于过度金融化时,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正效应源于就业的减少。金融监管机构要引导和规范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实体企业要认识到金融化的不利后果,把重心放在主业发展上,避免过度金融化。

关键词: 实体企业金融化;员工收入;全要素生产率;就业

中图分类号: F272.3;F83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58-12

一、引 言

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但是,与美国和日本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比较,居民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①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一方面能够提升居民消费率,推动内循环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能推动经济实现更快的增长。②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集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19BJL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转型视角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低碳经济治理机制研究"(21AZD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维峰,男,山东临沂人,经济学博士,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和公司金融研究;姚泽辉,男,山西运城人,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孙华平,男,山东济宁人,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① 姜雪:《"十四五"时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

② 刘盾:《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再测功能性收入分配对我国需求增长与结构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的现状、跨国比较、影响因素、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 然而，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需要从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提高员工的收入。影响员工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出口、融资约束、人民币汇率、对外直接投资、进口等因素，都会影响员工收入。[②]

本文拟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是指实体企业的利润来源中金融投资收益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一现象。[③] 近年来，在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一冷一热”，实体企业日益加剧的金融化现象是资金“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形式。金融化会给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对企业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④]Ignacio 和 Alvarez 以法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总体上提高了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降低了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⑤] 安磊、赵德志等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总体上研究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化降低了劳动者的报酬。目前鲜有文献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选择实体企业金融化作为分析对象，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员工收入的平均影响；二是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两个方面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员工收入的机制。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现有关于企业金融化的文献主要从金融化的动机和经济后果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企业参与金融化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实业投资利润率不断下降导致实体企业以金融资产

---

① Berisha E., Meszaros J., Olson E., "Income inequality, equities, household debt, and interest rates: evidence from a century of da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8, 80(1):pp.1-14；乔晗、王杰、卢涛：《收入分配研究述评与研究前沿分析——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管理评论》2020 年第 11 期；易行健、李家山、张凌霜：《财富不平等问题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12 期。

② 包群、邵敏、侯维忠：《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经济研究》2011 年第 9 期；文磊、蔡宏波、李宏兵：《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员工收入增长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5 年第 10 期；许家云：《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金融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③ Stockhammer E.,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28(5):pp.719-741；蔡明荣、任世驰：《企业金融化：一项研究综述》，《财经科学》2014 年第 7 期。

④ 戴赜、彭俞超、马思超：《从微观视角理解经济“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 年第 11 期。

⑤ Ignacio, Alvarez, "Financializati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ase of France", *Socio Economic Review*, 2015.

⑥ 安磊、沈悦、徐妍：《金融化、产权与企业内收入分配》，《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赵德志、安素霞：《金融化方式与企业职工收入份额——基于配置方式的考察》，《经济经纬》2020 年第 6 期。

投资代替物质资本投资[①]；二是股东价值论的兴起，这导致实体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以最大化股东价值。[②]但宏观环境也会影响企业对金融化行为的选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审慎政策会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③]理论上讲，金融化能够对企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实体企业金融化能够增强融资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的创新投资。[④]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金融化对企业发展具有负面作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⑤]，同时也会挤出劳动力就业[⑥]；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损害实体资产利润率，最终降低总资产回报率[⑦]；企业金融化对主业发展具有抑制作用[⑧]，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⑩]；企业金融化通过诱发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掏空”动机增强了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倾向[⑪]；企业金融化通过杠杆率影响宏观经济波动[⑫]。

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份额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导致了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组，重塑了各行为者的相对权力，股东价值取向的增加可能会削弱工会谈判能力[⑬]。实体企业不是通过投资实物资本来扩大生产和就业，而是将其大部分资源分配给金融市场，这对企业的投资、内部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追求股东价值战略的公司可能会减少就业，从而降低员工的议价能力。其次，公司过度依赖来自资本市场的收入意味着这些收入将从生产单位和工人转移到公司的财务部门。这导致劳动谈判能力下降，因为越

---

① Orhangazi O., "Financialis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32:pp.863-886；许罡、伍文中：《公司金融化投资之谜：盈余管理抑或金融套利？》，《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8期。

② Natascha V. D. Z., "Making sense of financialization",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4(1): pp.99-129；邓超，张梅，唐莹：《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2期。

③ 彭俞超、韩珣、李建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期；马勇、陈点点：《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国际金融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吴军、陈丽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与杠杆率变动的关系——来自A股上市公司和发债非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论坛》2018年第1期。

⑤ Davis L. E., "Financialization and Investment: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7,31(5):pp.1332-1358；宋建波、高翔：《经济金融化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田梓青、李胜楠、杜洋洋：《制造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基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产权性质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季小立、金洁：《长三角制造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会计之友》2021年第4期；安强身：《民间资本异化与后疫情时代的本质回归》，《东方论坛》2022年第2期。

⑥ 孙平、侯风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⑦ 雷新途、朱容成、黄盈莹：《企业金融化程度、诱发因素与经济后果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20年第1期。

⑧ 倪志良、宗亚辉、张开志 等：《金融化是否制约了实体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3期。

⑨ 杜勇、谢瑾、陈建英：《CEO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5期；臧秀清、张赛君、陈思：《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实证检验》，《会计之友》2020年第21期。

⑩ 黄淼、张旭：《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⑪ 朱杰：《企业金融化的阴暗面——来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证据》，《金融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⑫ 肖崎、廖鸿燕：《企业金融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20年第8期。

⑬ 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crisis",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2013,71(279):pp.39-70.

来越多的收入份额超出了工人和集体谈判的能力范围，因此几乎无法谈判。最后，企业的收入更多地来自资本市场，从而将利润和生产分离开来，同时也加强了股东和管理者在集体谈判中的谈判能力。因此，随着金融化在特定公司和行业的推进，劳动者的相对权利下降，这强化了股东和管理者的权利主张，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①]。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Ignacio 和 Alvarez 利用法国非金融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化增加了企业对金融渠道获得收入的依赖，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②]；王博和毛毅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向作用，原因在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使得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以及利润分成下降[③]；安磊等发现，企业金融化提高了资本要素收入，降低了劳动要素收入，原因在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普通员工的就业[④]，这一结论得到了赵德志和安素霞研究[⑤]的支持。但罗明津和铁瑛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他们认为通过企业金融化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不可持续的。[⑥]

研究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内收入分配固然重要，但探讨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综合现有文献，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可能影响机制主要有“生产率效应”和“就业效应”两种。

企业金融化的“生产率效应”是指，生产效率是影响员工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金融化通过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员工收入。杨筝、陈赤平等都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⑦]然而，胡海峰等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适度的金融化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过高的金融化水平则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阻碍作用。[⑧]由此可以推测，当企业处于适度的金融化水平时，其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够促进员工收入的增加；随着企业进一步提高金融化水平，过度的金融化通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而降低了员工收入。因此，由于“生产率效应”，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呈“倒 U 型”关系。

企业金融化的“就业效应”是指，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员工收入与就业规模反方向变动，企业金融化通过影响就业规模进而影响员工收入。宏观经济学表明，物质资本投资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更多地把资金投向资本市场，就有可能会对实物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制约

---

① Fligstein N., Shin T., "Shareholder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Economy, 1984 - 2001", *Sociological Forum*, 2007,22(4):pp.399-424; Ken-Hou L., Tomaskovic-Devey D., “Financialization and U.S. Income Inequality, 1970-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118:pp.1284-1329.

② Ignacio, Alvarez, "Financializati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ase of France", *Socio Economic Review*, 2015,13(3):pp.449-475.

③ 王博、毛毅：《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④ 安磊、沈悦、徐妍：《金融化、产权与企业内收入分配》，《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⑤ 赵德志、安素霞：《金融化方式与企业职工收入份额——基于配置方式的考察》，《经济经纬》2020 年第 6 期。

⑥ 罗明津、铁瑛：《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金融研究》2021 年第 8 期。

⑦ 杨筝：《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资源优化还是资源错配？》，《贵州社会科学》2019 年第 8 期；陈赤平、孔莉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经纬》2020 年第 4 期。

⑧ 胡海峰、窦斌、王爱萍：《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世界经济》2020 年第 1 期。

主业发展。[①] 这就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②] 王怀明、孙平等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减少了企业的就业人数,金融化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挤出是其影响机制之一。[③] 那么,企业金融化是否一定会挤出实物资本投资? Davis在对金融化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化的"挤出"证据在不同的背景和范式下并不稳健。[④] 从理论上来看,企业金融化甚至有可能促进实物资本投资。来自资本市场的收益增加了公司的内部资金池,然后公司就可以按一定比例将其分配给固定资产或金融资产。重要的是,没有先验的理由预期这些资金将再次全部用于金融资产,这就更不会导致物质资本投资的进一步减少。例如,Demir发现,金融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积极影响,尽管这种积极影响的幅度远远小于营业利润产生的现金流的积极影响。[⑤] 这一结果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金融利润作为一种动态的"对冲机制",在随后的时期,特别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时期,能够为实体企业提供额外的现金流。换言之,金融投资产生的现金流有可能对物质资本投资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因此,企业金融化对物质资本投资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推测,企业金融化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而导致企业金融化与就业规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的金融化水平能够对物质资本投资产生互补作用,从而拉动就业;过度的金融化水平则会挤出物质资本投资,从而减少就业。此外,由于"就业效应",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呈"U型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就业规模都呈"倒U型"关系。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截然相反。当企业处于适度金融化水平时,金融化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员工收入,但就业规模的增加则会降低员工收入;当企业处于过度金融化水平时,金融化通过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而降低员工收入,但就业规模的降低则会使得员工收入增加。因此,虽然企业金融化能够影响到员工收入,但从理论上难以预测这种影响的正负,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基准回归模型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

$$\mathrm{WAGE}_{it}=\beta_0+\beta_1 FN_{it}+\beta_2 FN_{it}^2+\beta_3 \mathrm{CV}_{it}+\mu_{it}+\phi_{it}+\delta_{it}+\varepsilon_{it} \quad (1)$$

在上述基准回归模型中,因变量WAGE为企业员工收入,FN为企业金融化水平,FN^2为二次项,

① 翟光宇、姜美君、段秋爽:《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实物资本投资——基于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期;倪志良、宗亚辉、张开志:《金融化是否制约了实体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3期。

② González I., Sala H., "Investment crowding-out and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U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61(5):pp.589-613.

③ 王怀明、王成琛:《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孙平、侯风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④ Davis L. E., "Financialization and investment: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7,31(5):pp.1332-1358.

⑤ Demir 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choic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88(2):pp.314-324.

CV 代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μ_{it}、ϕ_{it}、δ_{it} 分别为年份固定对应、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ε_{it} 是随机扰动项。在后文中，我们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就业规模（EMP）作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员工收入的机制变量。

（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员工收入（WAGE）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采用员工平均收入的对数值来进行测度。

2. 解释变量。企业金融化（FN）是本文的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企业金融化的测度方法。参照杜勇、胡海峰等的做法[①]，企业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债权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FN 数值越大，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就业规模（EMP）是本文的中介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主要有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法、OP 法和 LP 法四种。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法存在内生性问题，OP 法能够较好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存在较多数据丢失的问题；LP 法采用逐渐投入品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解决数据丢失问题。[②] 因此，本文采用 LP 法来估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估算过程可参考胡本伟的做法[③]。另外，就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

4.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引入控制变量。微观层面包括资本结构、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等反映企业基本特征的变量，宏观层面包括所在地区 GDP 和 CPI。

本文所用各变量的定义与测度方法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测度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WAGE*	员工收入	现金流量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员工人数后取对数值
解释变量	*FN*	企业金融化	企业金融资产 / 总资产
中介变量	*TFP*	全要素生产率	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EMP	就业规模	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CP*	资本结构	总负债 / 总资产
	SIZE	企业规模	期末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FIX	固定资产比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ROA	资产回报率	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
	GROWTH	企业增长率	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OWNER	所有权性质	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GDP	地区 GDP	GDP 的自然对数
	CPI	地区 CPI	---

① 杜勇、张欢、陈建英：《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工业经济》2017 年第 12 期；胡海峰、窦斌、王爱萍：《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世界经济》2020 年第 1 期。

② 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经济学（季刊）》2012 年第 2 期。

③ 胡本伟：《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 年。

(三)样本说明

本文选择2014—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所在地区层面的数据(GDP、CPI)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按照文献的惯例做法,本文剔除了样本期内ST、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092家上市公司7644个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WAGE	7644	11.513	0.401	10.622	12.732
FN	7644	0.055	0.079	0	0.418
TFP	7644	8.182	0.931	5.033	11.235
EMP	7644	7.931	1.113	5.45	10.962
CP	7644	0403	0.186	0.061	0.849
SIZE	7644	22.301	1.126	20.195	25.734
FIX	7644	0.235	0.133	0.025	0.618
FIRST	7644	0.326	0.131	0.098	0.691
ROA	7644	0.044	0.062	–0.213	0.225
GROWTH	7644	0.137	0.378	–0.413	2.416
OWNER	7644	0.335	0.471	0	1
GDP	210	6.589	2.373	–5.400	11
CPI	210	2.004	0.591	0.600	3.700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3的第(1)列首先单独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FN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就意味着企业金融化提高了员工收入。表3的第(2)列考察了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表3的第(3)至(5)列依次加入企业基本特征、宏观因素、行业、年份、区域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并没有改变企业金融化和员工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就表3的第(5)列来说,该“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为FN=0.331,虽然落在本文的研究样本的数值区间[0,0.419]内,但FN的均值仅为0.055,该值远远超过了均值。实际上,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仅有不到3%的上市公司的FN值超过了0.337。[①] 因此,可以认为,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金融化对员工收入主要表现为正向影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提高了员工收入。

① 员工收入与企业金融化存在“倒U型”关系,表明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员工收入先增加后下降,转折点就是使员工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的企业金融化水平。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WAGE	(2) WAGE	(3) WAGE	(4) WAGE	(5) WAGE
FN	0.524***	0.915***	0.542***	0.224***	0.432***
	(0.066)	(0.092)	(0.084)	(0.053)	(0.071)
FN^2		−0.984***	−0.921***	−0.409***	−0.653***
		(0.182)	(0.176)	(0.127)	(0.125)
CP			−0.241***	−0.212***	−0.122***
			(0.012)	(0.034)	(0.035)
SIZE			0.092***	0.087***	0.058***
			(0.004)	(0.004)	(0.005)
FIX			−0.622***	−0.472***	−0.363***
			(0.043)	(0.052)	(0.035)
FIRST			0.07*	0.054	0.192***
			(0.042)	(0.045)	(0.057)
ROA			−0.202**	−0.123	0.183**
			(0.086)	(0.082)	(0.077)
GROWTH			−0.102***	−0.104***	−0.072***
			(0.012)	(0.012)	(0.011)
OWNER			0.128***	0.153***	0.103***
			(0.014)	(0.016)	(0.019)
GDP				0.092***	0.079***
				(0.015)	(0.016)
CPI				10.183***	3.417***
				(0.703)	(0.852)
Constant	8.461***	10.649***	7.684***	−18.153***	−4.682
	(0.012)	(0.004)	(0.153)	(2.105)	(3.904)
年份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R^2	0.010	0.014	0.143	0.224	0.431
N	7644	7644	7644	7644	764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方程（1）的计量检验中已经对与企业基本特征相关的变量、影响收入水平的宏观变量、年度和行业效应进行了控制，控制变量绝大多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能够减轻实证估计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些因素会影响员工收入，当这些因素与企业金融化显著相关时，内生性问题就会出现。

本文采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首先寻找企业金融化的工具变量，然后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检验。借鉴彭俞超等的研究[①]，我们采用上市公司所处省份金融化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原因有二：第一，某公司所处省份金融化水平会影响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定；第二，公司所处省份的金融化水平对员工收入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回归结果见表 4 的第（1）（2）列。第（1）列是一阶段回归结果，IV 对 FN 显著，IV 平方对 FN 平方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第（2）列是二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解释变量与因变量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① 彭俞超、韩珣、李建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1 期。

2. 非线性关系检验

参考胡海峰等的研究方法①,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企业金融化的三次项,考察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之间是否存在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见表4的第(3)列。从中可以看到,FN的三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二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样本分布特征,设定企业金融化和员工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合适的。

3. 变量缩尾处理

考虑到样本可能会存在极值影响导致结果估计有偏,采用winsorize对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做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以使得样本数据尽可能平滑,估计结果为表4的第(4)列。从中可以看到,缩尾处理后得出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表4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2SLS一阶段		(2)2SLS二阶段	(3)	(4)
	FN	FN^2	WAGE	三次项考察	缩尾处理
FN			2.760**	0.277***	0.545***
			(1.2)	(0.107)	(0.137)
FN^2	2.746***		−4.7*	−3.57**	−1.194***
	(0.015)		(2.594)	(0.000)	(0.412)
FN^3				−1.529	
				(0.951)	
IV	0.732***	−0.141			
	(0.252)	(0.119)			
IV^2	1.240	3.864***			
	(1.755)	(0.829)			
CP	−0.068***	−0.030***	−0.152***	−0.11***	−0.111***
	(0.007)	(0.003)	(0.041)	(0.032)	(0.03)
size	0.008***	0.003***	0.075***	0.057***	0.055***
	(0.001)	(0.001)	(0.007)	(0.005)	(0.005)
fix	−0.132***	−0.048***	−0.394***	−0.383***	−0.359***
	(0.008)	(0.004)	(0.064)	(0.041)	(0.037)
first	−0.025***	−0.006*	0.097**	0.221***	0.195***
	(0.008)	(0.004)	(0.041)	(0.038)	(0.034)
ROA	−0.076***	−0.033***	−0.108	0.124*	0.185**
	(0.015)	(0.007)	(0.078)	(0.067)	(0.076)
growth	−0.001**	0.000	−0.007***	−0.008***	−0.071***
	(0.000)	(0.000)	(0.003)	(0.002)	(0.011)
owner	0.001	−0.001	0.153***	0.11***	0.105***
	(0.002)	(0.001)	(0.011)	(0.011)	(0.01)
GDP	−0.001	−0.002***	0.087***	0.081***	0.083***
	(0.001)	(0.001)	(0.008)	(0.006)	(0.006)
CPI	0.005	−0.002	−0.1*	−0.021	3.466***
	(0.010)	(0.005)	(0.052)	(0.046)	(0.952)
Constant	−0.122**	−0.006	9.494***	9.42***	−6.647
	(0.054)	(0.025)	(0.286)	(0.258)	(4.397)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02	0.075	0.129	0.386	0.429
N	7644	7644	7644	7644	7644

① 胡海峰、窦斌、王爱萍:《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世界经济》2020年第1期。

（三）传导机制检验

通过上面的检验可以发现，整体上看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员工收入的增加，但还不能由此认为这是企业金融化的积极作用。前述理论分析证明，企业金融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这两个传导机制来影响员工收入。如果企业金融化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员工收入，这无疑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企业金融化是通过降低就业规模来提高员工收入，这显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本部分就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就业规模（EMP）两个角度来分析企业金融化影响员工收入的传导机制，即在方程（1）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mathrm{TFP}_{it}=\alpha_0+\alpha_1 FN_{it}+\alpha_2\mathrm{FN}_{\mathrm{it}}^2+\sum\gamma_{\mathrm{j}}CV_{it}+\mu_{it}+\varepsilon_{it} \quad (2)$$

$$\mathrm{WAGE}_{it}=\beta_0+\beta_1 FN_{it}+\beta_2\mathrm{FN}_{\mathrm{it}}^2+\beta_3\mathrm{TFP}_{\mathrm{it}}+\sum\gamma_{\mathrm{j}}CV_{it}+\mu_{it}+\varepsilon_{it} \quad (3)$$

$$\mathrm{EMP}_{it}=\alpha_0+\alpha_1 FN_{it}+\alpha_2\mathrm{FN}_{\mathrm{it}}^2+\sum\gamma_{\mathrm{j}}CV_{it}+\mu_{it}+\varepsilon_{it} \quad (4)$$

$$\mathrm{WAGE}_{it}=\beta_0+\beta_1 FN_{it}+\beta_2\mathrm{FN}_{\mathrm{it}}^2+\beta_3\mathrm{EMP}_{\mathrm{it}}+\sum\gamma_{\mathrm{j}}CV_{it}+\mu_{it}+\varepsilon_{it} \quad (5)$$

$$\mathrm{WAGE}_{it}=\beta_0+\beta_1 FN_{it}+\beta_2\mathrm{FN}_{\mathrm{it}}^2+\beta_3\mathrm{TFP}_{\mathrm{it}}++\beta_4\mathrm{EMP}_{\mathrm{it}}+\sum\gamma_{\mathrm{j}}CV_{it}+\mu_{it}+\varepsilon_{it} \quad (6)$$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传导机制检验

Variables	（1）	（2）	（3）	（4）	（5）	（6）
	WAGE	TFP	WAGE	EMP	WAGE	WAGE
FN	0.432***	0.185*	0.418***	0.432**	0.652***	0.573***
	(0.071)	(0.104)	(0.081)	(0.23)	(0.129)	(0.018)
FN^2	−0.653***	−2.088***	−0.525***	−3.837***	−2.041***	−1.387***
	(0.125)	(0.213)	(0.156)	(0.693)	(0.366)	(0.224)
TFP			0.062***			0.187***
			(0.013)			(0.009)
EMP					−0.238***	−0.31***
					(0.007)	(0.011)
CP	−0.122***	0.718***	−0.161***	0.406***	−0.012	−0.136***
	(0.035)	(0.049)	(0.035)	(0.057)	(0.031)	(0.025)
SIZE	0.058***	0.61***	0.018**	0.772***	0.245***	0.192***
	(0.005)	(0.006)	(0.007)	(0.008)	(0.007)	(0.008)
FIX	−0.363***	−0.948***	−0.324***	1.017***	−0.119***	0.093**
	(0.035)	(0.043)	(0.041)	(0.065)	(0.034)	(0.037)
FIRST	0.192***	0.182***	0.181***	0.074	0.214***	0.214***
	(0.057)	(0.041)	(0.032)	(0.053)	(0.03)	(0.035)
ROA	0.183**	2.613***	0.015	1.421***	0.523***	0.083
	(0.077)	(0.092)	(0.076)	(0.125)	(0.072)	(0.068)
GROWTH	−0.072***	−0.154***	−0.063***	−0.093***	−0.091***	−0.011***
	(0.011)	(0.016)	(0.014)	(0.016)	(0.018)	(0.003)
OWNER	0.103***	0.091***	0.094***	0.163***	0.142***	0.143***
	(0.019)	(0.013)	(0.011)	(0.019)	(0.006)	(0.021)
GDP	0.079***	0.001	0.083***	−0.016*	0.076***	0.081***
	(0.016)	(0.007)	(0.007)	(0.012)	(0.015)	(0.005)

表5(续)

Variables	(1) WAGE	(2) TFP	(3) WAGE	(4) EMP	(5) WAGE	(6) WAGE
CPI	3.417***	3.581***	3.183***	−2.987*	2.785***	−0.034
	(0.852)	(1.234)	(0.941)	(1.624)	(0.871)	(0.045)
Constant	−4.682	−11.557***	−4.209	4.728	−5.639	7.548***
	(3.904)	(2.381)	(3.658)	(6.741)	(4.953)	(1.351)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431	0.821	0.438	0.785	0.536	0.549
N	7644	7644	7644	7644	7644	7644

表5第(1)列是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重新列在此处作为比较。第(2)(3)列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员工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金融化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员工收入。第(4)(5)列考察了就业规模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与就业规模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就业规模对员工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就业规模也是企业金融化影响员工收入的机制之一。表5第(6)列将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同时放入计量模型中,结果进一步确证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员工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就业规模对员工收入的负向影响。

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都与企业金融化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二者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截然相反,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解释企业金融化为何整体上能够促进员工收入的增加。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为FN=0.045,在企业金融化水平达到4.5%之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了员工收入。企业金融化与就业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为FN=0.056,在企业金融化水平达到5.6%之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对就业规模具有促进作用,进而降低了员工收入。由此推测,在企业处于较低金融化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员工收入的促进作用超过了就业规模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为正;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企业金融化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会降低员工收入,但就业规模的下降会提高员工收入,就业规模的影响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使得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正的。因此,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员工收入呈“倒U型”关系。然而,由于在“倒U型”的转折点处金融化水平非常高,仅有不到3%的公司的金融化水平高于这一数值。因此,可以认为,从整体上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具有正的影响。稳健性检验并不改变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和就业规模都是企业金融化影响员工收入的机制,而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解释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正效应。在企

业处于适度的金融化水平时，金融化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对员工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超过了就业规模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为正。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企业金融化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带来更多的就业，员工收入也增加了。当企业处于过度金融化水平时，企业金融化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员工收入，但金融化也会导致就业规模的下降，这会提高员工收入，就业规模的影响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使得企业金融化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正的。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企业金融化之所以提高了员工收入，仅仅是因为减少了就业。

本文的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采取金融化行为，有利有弊，关键是“度”的把握，适度的金融化是能够给企业带来正面影响的。对金融监管机构来说，要引导和规范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使之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对企业来说，则要认识到金融化的不利后果，避免过度金融化，把重心放在主业发展上，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潘文竹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ity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on Employee Income Based 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n Weifeng[1] Yao Zehui[2] Sun Huaping[3]

1.Depart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ing 810007,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14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 incom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on the whole,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ity enterpris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 income. The robustness test does not change this conclusion. The mechanism test finds that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scale can explai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on employee income. When enterprises are in moderate financializati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employee income comes from the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hen enterprises are in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employees' income comes from the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Financial regulators should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entity enterprises should recognize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ization,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ain business and avoid excessive financial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ization of entity enterprise; employee incom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

——来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证据

吕勇斌 文 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014—2019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文书,基于地市级层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面板数据,从成本—收益和金融公平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作用效果更强,并对不同案件受理费用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作用效果不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缩减地区收入差距、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减缓流动人口变化来降低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土地纠纷;乡村治理;裁判文书

中图分类号: F832.29; F32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70-15

一、引 言

乡村治则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何为治理有效?即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如何才能达到治理有效?这需要政府、社会、公众、法治、科技等各要素形成合力,其中金融发展提供了服务乡村治理的新方法、新路径。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加大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既契合国家战略,又赋能乡村治理。因此,立足金融视角,诠释金融发展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数字技术推动金融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正在出现,而数字金融所展示的最大优势是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共享和公平特性是其对金融发展价值评判的核心准则。中国特色的数字金融发展体现出包容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殊性,能够抑制数字鸿沟负面效应的扩大,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同时,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社会良性发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基金项目: 本文受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B21038)资助;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风险事件与股市流动性及波动性的关系研究”(17BTJ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勇斌,男,湖北鄂州人,管理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研究;文琳,女,湖南永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金融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普惠金融研究。

二、文献综述

在现有文献中，Midgley 针对普惠金融与社区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①]，Mahendra 等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改善贫困农民、农村企业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②]。还有学者认为，普惠金融能够满足农村群体需求、提高农村家庭福利、促进正规渠道贷款[③]。部分学者则从城乡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等多个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④] 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带动农村居民“自治”积极性，形成“乡村合作共同体”，提升乡村治理效能。[⑤] 第二类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滞后性和地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偏差导致的。[⑥]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而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者，民之本也”，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也证明，农民与土地关系处理得好坏，关系到农村社会繁荣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因此，满足农民合理土地权益诉求，对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有着积极意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作为一种记录承包双方土地利益关系的合同，对于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有着法律约束效应，有助于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本文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1. 立足金融视角，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角度来剖析乡村治理，识别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治理的手段和路径，梳理乡村治理中的金融逻辑和金融特征。

---

① Midgley J, "Financial Inclusion, Universal Banking and Post Offices in Britain", *Area*,2005,37(3):pp.277−285.

② Mahendra D. S., "Financial Inclus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6, 41(41): pp.4310−4313.

③ Ram A., M. Cnaan., S. Moodithaya., F. Handy., "Financial Inclusion: Lessons from Rural South Ind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1,41(1): pp.183−205; Saifullahi S., H. Ibrahim., B. Ozdeser, "Financial Inclusion as a Pathway to Welfare Enhancement and Income Equality: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Nigeria",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9,36(3): pp.390−407; Svitlana N., S. Mishchenko., D. Dorofeiev.,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Ukra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 Financial Innovations,* 2019,16(3): pp.194−205.

④ 张勋、万广华、吴海涛：《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8 期；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 年第 11 期；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金融研究》2018 年第 11 期；何婧、李庆海：《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 期；何宗樾、张勋、万广华：《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统计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⑤ Ozili P. K. ,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 *Borsa Istanbul Review*,2018, 18(4): pp.329−340; 陈熹、张立刚：《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江西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0 期。

⑥ 田霖、张园园、张仕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 GMM 及门槛效应的检验》，《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0 期；Malady, "Consumer Protection Issues for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6, 31(2): pp.389−401; Tolbert, M. Charles., F. Mencken., F Carson, T. Riggs., "Restructuring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Disappearance of Locally Owned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Rural America", *Rural Sociology,*2014,79(3): pp.355−379.

这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社会治理价值,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2.从法与金融的交叉角度,运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014—2019年超7万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文书,通过文本分析和数据匹配,构建地市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纠纷的成本与收益

从法金融理论角度看,纠纷案件当事人在选择解决纠纷时,会对纠纷带来的成本收益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当事人会比较纠纷发生过程中投入的时间金钱成本与纠纷结束后所获得的收益,来决定是否上诉解决纠纷。

1.机会成本。土地纠纷的发生会产生诉讼成本,它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最主要的成本。在不考虑其他成本的情况下,假设某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只涉及一个原告和一个被告。参照William和Posner提出的诉讼乐观原则[①],假设原告和被告对于最终审判结果都较为自信,认为自己会胜诉,并且原告认为的胜诉率为 P_Y,被告认为的胜诉率为 P_B;原告机会成本为 C_Y,被告机会成本为 C_B;原告胜诉获得的收益(赔偿)为 E_Y,原告胜诉被告所需支付的费用(赔偿)为 E_B。当原告上诉的机会成本大于收益时,原告才会选择上诉,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诉讼成立的条件可以表示为:

$$E_Y P_Y - C_Y \geq E_B P_B + C_B \quad (1)$$

当即原被告双方认为原告胜诉所获得(支付)的赔偿相同时,式(1)可表示为:

$$EP_Y - C_Y \geq EP_B + C_B \quad (2)$$

$$P_Y - P_B \geq (C_Y + C_B)/E \quad (3)$$

从上式可以看出,纠纷导致上诉的可能性是由当事人双方的预期、双方机会成本以及双方获得(支付)的赔偿决定的。由于不等式右边恒大于零,只有当 $P_Y < P_B$ 时,即原告悲观被告乐观的情况下,纠纷才能达到私下和解或者不会出现。反之,P_Y 与 P_B 的差距越大,纠纷上诉的可能性越大,双方所需要花费的机会成本也越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释放了就业市场潜力,由此增加了自主创业和劳动就业的可能性,提升了纠纷上诉的机会成本。

2.投资收益。农民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土地价值的收益,一种是利用自身承包权益来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另一种是在规定范围内转让承包权来获取权益补偿。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会给农民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

① William M. L.,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our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1,14(1): pp.61-107; Posner R. A., "What Do Judges and Justices Maximize? (The Same Thing Everybody Else Does)",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1973,3 (3): pp.1-41.

来规避风险[①]。下面将通过一个投资回收模型来分析农民投资行为决策。

（1）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先考虑第一种土地价值收益方式。在农民承包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时，投入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假定劳动固定，产出仅是资本的函数，此时农民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式（4）：

$$Q = AK^{\theta}(0 < \theta < 1) \tag{4}$$

其中，Q 表示农民对土地进行投资获得的产量，A 表示技术系数，K 表示农民的资本投入量。若投资期限为 T 年，农民预期收益率为 r，单位产量价格为 P，农民总成本等于农民的总资本投入量 K，利用现金流贴现模型，农民总收益可以表示为式（5）：

$$I = QP = APK^{\theta}\sum_{T}^{N}\frac{1}{1+r} \tag{5}$$

如果该农户选择投资土地，那么至少需要在 T 年内收回投资，则有式（6）：

$$K = I = APK^{\theta}\sum_{T}^{N}\frac{1}{1+r} \tag{6}$$

利用等比公式可以算出 $\sum_{T}^{N}\frac{1}{1+r} = \frac{1-\frac{1}{(1+r)^{T}}}{r}$，$K^{1-\theta} = AP\left[\frac{1-\frac{1}{(1+r)^{T}}}{r}\right]$，两边同时取对数后化简为式（7）：

$$K = \left[AP\frac{(1+r)^{T}-1}{r(1+r)^{T}}\right]^{\frac{1}{1-\theta}} \tag{7}$$

将式（7）代入式（5），可得每年实现的收益如式（8）：

$$Y = APK^{\theta} = AP^{\frac{1}{1-\theta}}\left[\frac{(1+r)^{T}-1}{r(1+r)^{T}}\right]^{\frac{\theta}{1-\theta}} \tag{8}$$

考虑时间 T_1 和 T_2，假设 $1 < T_1 < T_2$，那么 $\left(\frac{1}{1+r}\right)^{T_1} > \left(\frac{1}{1+r}\right)^{T_2}$，则 $Y_1 < Y_2$，说明时间越长，农民每年实际获得的收益也越多，T 与 Y 成正比。

（2）转让承包权的补偿收益。第二种土地价值收益方式主要考虑农民让渡土地权所获得的资金补偿。考虑土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种植平均补贴额，转让承包权的年限依然为 T 年，那么，农民获得的补偿收益可以表示为式（9）：

$$M = T(E_1 + E_2)S - C \tag{9}$$

其中 E_1 为土地流转费用，E_2 为农产品种植平均补贴额，S为农民转让承包权土地面积，C 为土地流转代理人自行改变土地用户而对农户造成损失的成本。同样考虑时间 T_1 和 T_2，假设 $1 < T_1 < T_2$，显然有 $M_1 < M_2$，说明时间越长，农户转让土地获得的补偿收益越高，T 与 M 成正比。

（3）最优投资水平决策。在固定期限年，当 $Y > M$ 时，农民更倾向于将土地资源用于长期投资；当 $Y < M$ 时，农民更倾向于转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来获取收益；当 $Y = M$ 时，这两种投资方式对农民来说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土地承包法》是针对农民集体成本权益而言的，农民在进行个人利益最大化决策时，未考虑家庭承包集体组织的利益，因此在公平与效率上是存在冲突的，加上农民由于婚嫁、迁移等因素，土地承包的关系更加复杂。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享受支付便利和平等金融服务的机会，提升了国民金融素

① 黄少安、刘明宇：《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承包制的困境与出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经济学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 年第 2 期。

养,农民争取个人公平感和个人权益意识也越强,从而能够更加规范土地承包关系,维护乡村治安。

3. 金融公平。有学者提出,普惠金融应该被界定为金融公平(Financial Fair),共享和公平是普惠金融发展价值评判的核心准则。[①] 传统经济学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效率体现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平体现在收入的平等分配。其实,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这两个目标可以共存而且彼此调和。[②] 追求金融公平有利于市场主体利益的兼顾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金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金融效率。金融公平与金融效率并非总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对抗状态,在合适的限度内有效配合,能够实现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我们可以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来简单分析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当市场主体追求金融公平,可视为合作;当市场主体追求金融效率,可视为对抗。金融活动中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收益如表1所示。

表1 金融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博弈模型

	甲合作(追求公平)	甲对抗(追求效率)
乙合作(追求公平)	3,3	5,0
乙对抗(追求效率)	0,5	1,1

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的稳定结果是双方同时选择公平、在合作中实现利益分享。可见,当金融活动的主体遵循公平原则时,单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虽然不能实现最大化(5单位),但其利益也能得到较好的实现(3单位),也是有效率的。同时,金融活动的总体利益实现了最大化(6单位),从整体来看是最有效率的。

(二)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纠纷的作用可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大量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是影响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③] 合理的收入和就业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减少纠纷和犯罪。近年来,国内研究学者也证实,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④]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保障农村底层的弱势群体收入、缩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上起着重要作用,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农村的纠纷和犯罪得以减少,从而有助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

2.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互联网平台提升金融交易效率,克服时间、空间障碍,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满足农户合理利益诉求。[⑤] 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下,农民通过互联网获得公平知晓信息的权利,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必要纠纷,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3. 流动人口是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村民事纠纷之间存在显著

① 袁康:《重新审思金融:金融公平理念的勃兴》,《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William B., A Griffith., "Review of Efficiency Instead of Justice? Searching for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Science & Law*, 2009,9(4): pp.1-4.

③ 陈春良、易君健:《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④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财经科学》2017年第6期。

⑤ 樊文翔:《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正向关系。[①] 农民在农村关系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的进程中，经济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农民能够获得更多公平的金融服务机会。同时，快递、外卖、直播、零工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在农村地区扎根落地，为更多农村人口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减少了农村地区人口流失现象，对减少土地纠纷，构建和谐乡村有着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4 个待验证的研究假设：

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减地区收入差距，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

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

假设 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缓流动人口变化，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文书中的信息来构建乡村治理的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案件数据库。该网站涵盖了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多类案件。截止至 2021 年 10 月 25 日，该网站公开上传的文书达到了 1.24 亿篇，其中刑事文书达到了 966 万篇，执行文书达到了 3356 万篇。

为了获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相关文书，本文做了如下处理。1. 文书检索。在高级检索中输入“农村土地承包”字样进行全文搜索，关键词选择“合同”字样，一共搜索到文书 82062 篇。2. 文书设置。本文的时间跨度选取为 2014—2019 年[②]，文书类型和案件案由暂不设置。3. 文书获取。本文利用 Python 软件来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文书进行爬取，获取数据的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一共获取文书 76811 篇。4. 文书处理。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类型复杂，文书格式不统一，对于被告人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识别困难较大。为了统一文书的不同模块，本文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特征对每篇文书的裁判日期、审理地区、案件类型、文书类型、案件案号、审判程序、审判结果进行分块。为了避免分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识别位置偏差的错误，利用 Python 软件将全部文书以文档文本的形式进行存储，方面后期数据清理和核对。5. 文本分析。本文以文书中案件“审理地区”作为被告人管辖地区[③]，由于获取的“审理地区”存在重复和表达不规范的现象，因此根据获取的“案件案号”保留唯一案号，随后利用 Stata 软件中的正则表达式对“审理地区”进行文本分析，得到对应的地市级。然后将处理过的地市级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2014—2019）相匹配，最终构建了 2014—2019 年涵盖中国 320 个地市级及 4 个直辖市的面板数据，

① 刘彬彬、林滨、冯博、史清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2017 年第 9 期。

② 2013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依据该办法，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最高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一般均应在互联网公布。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案件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指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15—2020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各地市区的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利用CNKI“中国经济大数据平台”中的资料、条目和指标数据来进行补齐。

(二)变量说明

1.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发生率指标的度量。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文书结构多样复杂,涉及合同案件案由种类繁多,并且在对案件被告人数测量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误差。民事案件纠纷发生率可用民事纠纷每万人发生率来进行衡量,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文书案件数量显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在民事案件中占比约0.1%。考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频率较低,本文利用每百万人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次数来衡量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为了方便观察和保证数据的正向性,对该变量采用对数加1处理。

2.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的度量。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时,不仅需要考虑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要考虑数字普惠金融的横纵向可比性。为了体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标的多元性和层次化,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4—2019年的数据。为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又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对数处理。

3. 控制变量的度量。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法支出规模、人口密集程度、地区受教育程度、农村收入水平、农业发展情况、其他案件发生情况、地区交通发展情况、地区自然环境状况。

具体变量表示与度量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表示与度量情况

变量名称	表示符号	度量内容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率	Rural_dispute	每百万人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次数,对数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化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对数
产业结构规模	Primary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人口密集程度	Popdensity	人口密度
政法支出规模	Fisexpend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农村收入水平	Income	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数
地区农业发展情况	Agricultural	第一产业农渔牧业从业人数(万人)
其他民事案件	Otherdispute	每百万人口其他民事案件发生次数,对数化
地区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万人)
空气质量	Air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数
水质量	Water	工业废水排放量对数
公路客运量	Ptraffic	公路客运量对数
公路货运量	Ftraffic	公路货运量对数

4. 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本文所用的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数据来看,数据整体波动性较小,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我国乡村治理的空间区域差距。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经济水平以及就业状况是冲突纠纷发生的原因,但其他民事案件发生情况也会影响我国地区治理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程度,通过影响地区收入、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也会间接的影响地区治理水平。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Err.	Min	Max
Rural_dispute	1640	1.8586	0.8328	0.1178	5.6280
DIF	1938	5.2770	0.2109	4.5998	5.7735
PGDP	1924	10.7474	0.5462	9.1042	12.2807
Primary	1688	11.7898	7.6844	0.0300	48.3200
Popdensity	1716	434.7516	350.1622	1.2522	2648.1100
Fisexpend	1691	9.1401	0.5152	7.9003	11.7035
Income	1944	9.4726	0.3506	8.3000	11.0000
Agricultural	1710	0.6949	2.0530	0.0100	36.1200
Otherdispute	1712	7.7599	0.9780	3.1166	12.4188
Education	1710	9.6531	17.0667	0.0811	115.2994
Air	1705	2.9121	3.5020	0.0002	47.4805
Water	1704	7.9220	1.3333	1.0000	11.4773
Ptraffic	1704	8.1261	1.0241	2.1972	11.9637
Ftraffic	1705	9.0403	0.9092	4.9558	12.5860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进一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具体如式（10）：

$$Rural_dispute_{it} = \beta_0 + \beta_1 DIF_{it} + \gamma X_{it} + \mu_i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其中，i 表示地市级城市及直辖市，t 表示年份；$Rural_dispute_{it}$ 为每百万人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DIF_{it}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_{it} 中包括人均 GDP、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数、第一产业农渔牧业从业人数、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等一系列控制变量。此外，μ_i 代表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但由于地区差异因素影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因素，比如宗教、文化、历史等；φ_t 代表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那些随时间变化影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因素，比如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经济周期因素等；ε_{it} 表示稳健标准误。

（二）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式 10 的回归结果见表 4。其中，第（1）列中仅加入经济层面相关的控制变量，第（2）（3）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其他民事合同发生情况和教育程度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影响，第（4）列考虑了所有控制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第（4）列的结果来看，平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 个单位，每百万人口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减少 1.0163 个单位。由此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有利于提升地区乡村治理水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

表4 基础回归模型结果

Rural_dispute	(1)	(2)	(3)	(4)
DIF	−1.0206***	−1.0345***	−1.0473***	−1.0163***
	(0.0989)	(0.0932)	(0.0919)	(0.0953)
PGDP	0.8281***	0.7221***	0.6963***	0.6691***
	(0.0867)	(0.0860)	(0.0856)	(0.0866)
Primary	0.0356***	0.0400***	0.0407***	0.0404***
	(0.0048)	(0.0048)	(0.0049)	(0.0050)
Popdensity	−0.0004***	−0.0004***	−0.0005***	−0.0005***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Fisexpend	0.2679***	0.0906	0.0575	0.0623
	(0.0588)	(0.0644)	(0.0662)	(0.0679)
	−1.2507***	−1.3012***	−1.2764***	−1.2737***
	(0.1003)	(0.0951)	(0.0940)	(0.1026)
Agricultural	0.0167*	0.0127	0.0080	0.0044
	(0.0086)	(0.0079)	(0.0080)	(0.0093)
Otherdispute		0.2482***	0.2303***	0.2283***
		(0.0370)	(0.0373)	(0.0383)
Education			0.0051***	0.0059***
			(0.0011)	(0.0013)
Air				0.0068
				(0.0064)
Water				0.0302
				(0.0277)
Ptraffic				−0.0117
				(0.0243)
Ftraffic				−0.0570*
				(0.0325)
截距项	7.3166***	8.8208***	9.3548***	9.7818***
	(0.9590)	(0.9017)	(0.9038)	(0.9714)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21	1621	1620	1618
R^2	0.2891	0.3171	0.3249	0.3286
F	62.6200	79.2200	73.0400	52.7300

注：括号中代表的是稳健标准误，下同(*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三)内生性检验

表5利用两种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模型的可靠性。从理论上来说，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较低的地区可能存在纠纷私下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为减少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使用二阶段工具变量法(IV-2SLS)进行回归，引入以下两种工具变量，来进一步识别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关系。

近年来，“Bartik instrument”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和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能同时受到家庭关系、人口迁移、个人预期、心理因素等难以观测变量的影响，这将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估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存在偏差。本文参考易行健和周利的移动差分法构造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阶相关的工具变量[①]。表5显示，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CF_DIFit回归系数结果显著为正，说明该工具变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回归结果显著为负，回归系数为-0.7262，略低于基准回归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

“社会空间”中的距离常常与城市乡村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由于其独立性和随机性特点，常常被用作于实证研究的空间工具变量。本文借鉴郭峰、张勋等人的做法[②]，使用各地市级及直辖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乘以每年全国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表5显示，Distance_sphere回归系数结果显著为负，说明该工具变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并且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回归结果显著为负，回归系数为-3.2275，高于基准回归结果，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低估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效应。

表5 两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CF_DIFit	第二阶段 DIF	第一阶段 Distance_sphere	第二阶段 DIF
被解释变量	0.0063***		-0.0309***	
DIF	(0.0003)		(0.0063)	
被解释变量		-0.7262***		-3.2275***
Rural_dispute		(0.2028)		(0.97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18	1618	1612	1612
R^2	0.2893	0.2893	0.1370	0.1370

（四）稳定性检验

1.样本稳定性检验。考虑样本总体的稳定性，本文对基准回归的稳健性进一步验证，具体如表6所示。

第（1）列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相关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估计回归系数为-0.9367，并且满足显著性水平要求，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率的效果依然稳健。

在获得的全部文书中，民事案件占总文书的92.12%，这主要归根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基本性质。基于此，第（2）列只保留了民事案件相关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回归系数为-1.0576，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与表4第（4）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近，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对降低民事案件类型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效果更强。

在2014—2019年的公开文书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文书类型主要包括判决书和裁

①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

②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定书,其中判决书一共65454,占总样本数量的91.11%。这是因为判决书相对于裁定书形式更加正式,并且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判决书,而对应的裁定书数量却是不定的。因此,本文对文书类型为判决书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回归,从表6第(3)列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回归系数为-0.9540,并且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上述结论基本稳健可靠。

从获得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公开文书案件中,包含土地案件案由的文书占总文书的63.18%。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案件案由类别较多,但大部分是与土地流转和经营权相关的案件案由。表6第(4)列对案件案由明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文书进行回归,减少由于案件案由不清晰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负。

表6 样本稳定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1) 剔除四个直辖市	(2) 案件类型为民事案件	(3) 文书类型为判决书	(4) 案件案由明晰
DIF	-0.9367***	-1.0576***	-0.9540***	-0.9848***
	(0.1135)	(0.0972)	(0.0967)	(0.1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55	1617	1615	1557
R^2	0.1112	0.2275	0.2203	0.1817
F	18.3500	53.4000	50.1100	44.7500

2. 核心变量替换检验。通过分别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来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首先,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数据,以各地区民事案件类型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次数与各地区民事案件总次数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地区治理的促进效果,具体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其中Percentage为被解释变量。Percentage对应的回归系数结果为-0.3495,并且满足显著性水平要求,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减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次数的发生,从而有利于各地区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其次,金融科技将各类前沿科学技术与金融相结合,在提高效率、创新产品和监测风险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高效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类,因此具有较强的数字性和普惠性的特征。本文基于李春涛等构建的金融科技指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替代变量①,分析金融科技指数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其中Fintech为解释变量。Fintech对应的回归系数结果为-0.1219,并且满足显著性水平要求,这说明了金融科技的发展会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金融科技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作用方向一致,都能提升地区乡村治理水平。

因此,无论是替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还是替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都说明数字化、科技化、公平化的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地区土地纠纷发生,对于提升地区乡村治理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① 李春涛、闫续文、宋敏、杨威:《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

表 7 核心变量替换回归结果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 Percentage	（2） 替换解释变量为 Fintech
DIF	−0.3495*** (0.1189)	
Rural_dispute		−0.1219*** (0.0261)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1630	1266
R^2	0.1998	0.3234
F	20.9600	38.2800

3. 核心变量分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还包括三个分指标，即覆盖广度（Coverage_breadth）、使用深度（Usage_depth）、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_level），本文分别用这个子指标来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Coverage_breadth、Usage_depth 和 Digitization_level 对应的回归结果分别为 −1.1903、−0.5905 和 −0.8661，并且满足显著性水平要求。说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与覆盖，运用数字信息化技术，提升各类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度是发挥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表 8 DIF 分指标回归结果

Rural_dispute	（1）	（2）	（3）
Coverage_breadth	−1.1903*** (0.1105)		
Usage_depth		−0.5905*** (0.0639)	
Digitization_level			−0.8661*** (0.09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18	1618	1618
R^2	0.3284	0.3179	0.3214

（五）异质性分析

1. 案件受理费用异质性分析。考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大多涉及土地财产，并且因为土地价值或财产的不同，其收费标准有所不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上诉费用存在差异性。这里的上诉费用主要为案件受理费用。根据 Stata 正则表达式获取到的案件受理费明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共有 62726 份。本文基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涉及案件受理费存在的差异性这一特征，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受理费用划分为 4 个标准，分别是 0—100 元、100—1000 元、1000—10000 元、10000 元以上。对这四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分别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案件受理费用异质性回归结果

案件受理费用	0—100 元	100—1000 元	1000—10000 元	10000 以上元
DIF	-0.9596***	-1.0795***	-0.3409***	-0.0338
	(0.1165)	(0.0922)	(0.0755)	(0.05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317	1476	1364	747
R^2	0.2129	0.3272	0.3239	0.3865
F	21.8100	34.5900	35.1700	22.8100

表 9 中,案件受理费用 0—100 元、100—1000 元、1000—10000 元对应的 DIF 系数回归估计结果分别是 -0.9596、-1.0795 和 -0.3409,并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案件受理费用 10000 元以上的 DIF 对应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是样本量较少导致的。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的案件受理费用下,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起不同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案件受理费用在 0—100 元和 100—1000 元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抑制效果相对较强。

2. 地区经济与收入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可能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将各地区研究期间内的人均 GDP 取均值,并以中位数分为高经济地区和低经济地区;将各地区研究期间内的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取均值,并以中位数分为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对这四类地区分别进行异质性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地区经济与收入异质性回归结果

	(1) 高经济地区	(2) 低经济地区	(3) 高收入地区	(4) 低收入地区
DIF	-0.9317***	-1.1150***	-0.9867***	-1.0067***
	(0.1469)	(0.1360)	(0.1448)	(0.14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29	789	846	772
R^2	0.3049	0.3726	0.2809	0.3472
F	22.7600	33.4000	22.7100	37.7400

从表 10 第(1)(2)列中可以看出,高经济地区和低经济地区对应的 DIF 回归系数结果分别是 -0.9317 和 -1.1150,并且两者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 GDP 相对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效果越好。同样,从表 10 第(3)(4)列中可以看出,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对应的 DIF 回归系数结果分别是 -0.9867 和 -1.0067,并且两者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对于抑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效果越强。

(六)机制检验

前文的一系列实证回归结果都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直接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产生影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更多对地区收入、信息透明度、产业结构以及人口流动等产生直接影响,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直接影响有限。本文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相关经济变量的交乘项,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作用机制,

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的作用机制

Rural_dispute	(1)	(2)	(3)
DIF × Theil	4.7254***		
	(0.9991)		
DIF × Mobile		–0.0646***	
		(0.0155)	
DIF × Fpopulation			0.0006***
			(0.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892	1414	1181
R^2	0.0149	0.1386	0.2130
F	9.3600	38.8800	34.4900

表 11 第(1)列中,引入地区收入差异变量,以各城市的泰尔指数(Theil)来衡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①。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反之,亦然。从地区收入差距的检验结果来看, DIF 与 Theil 的交乘项系数为 4.7254,并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来降低地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2。具体而言,随着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减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效果越好。

在信息化程度上,互联网以及新兴科技技术的发展让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在表 11 第(2)列中引入了与信息传播覆盖广度相关的变量,用地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占年末人口的总数的比重(Mobile)来衡量。从回归结果来看,DIF 与 Mobile 对应的交乘项系数为 –0.0646,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这与本文的假设 3 相符合。这一结果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让更多农村地区的人民更快更方便的知晓信息,利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在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是指人口是户籍人口数量与居住地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数量之和,流动人口在统计数据中统计有限,本文利用年度常住人口变化作(Fpopulation) 为衡量流动人口变化的代理变量,具体使用该年常住人口数量变动额与上一年常住人口总量之比来衡量流动人口变动情况。② 表 11 第(3)列中加入了流动人口因素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乘项。从回归结果来看, DIF × Fpopulation 对应的回归系数结果显著为正,说明流动人口变动越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影响越强,抑制效果越好,这也与本文的假设 4 相符合。具体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包容性、数字化的特征为地区留住人才,减少流动人口因素引起的利益纠纷,从而降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① 梁双陆、刘培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财经科学》2017 年第 6 期。

② 金诚、李树礼、郑滋:《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犯罪问题研究——以流动人口聚集区与犯罪热点的相关性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减少土地纠纷有利于维护乡村治安、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步伐稳步推进。在高度数字化发展的今天,急需转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将数字普惠金融融入乡村治理,促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文书案件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考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受理费用和地区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案件费用相对较低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抑制性效果更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地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抑制性效果更强。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缩减地区收入差距、提高信息透明度、减缓流动人口变化等渠道,抑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发生。

(二)政策建议

结合本文相关研究结论,基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发展现状,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 畅通信息反馈机制,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信息采集与处理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前沿技术精准记录识别信息,增强信息的有效性和透明性,减少乡村治理中无序和低效率的信息使用,避免不必要的民事纠纷。2. 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帮助农户创新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力量,还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获得性,助力农户自主创新、增收增益。3. 创新新型就业岗位,让更多农村群体获得与自身技术水平相关的就业机会。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能够较好的适应农村生活环境,学习农业相关技术的动力更强,有利于减少农村人口流失,稳定农民生产生活。4. 完善金融监管目标,寻找适应农村整体利益的政策逻辑,满足农村群体现实利益需求。数字普惠金融在具体实践中,还应该注意需要加强农户参与度、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加强主体监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助力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潘文竹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Governance: Evidence of Disputes over Rural Land Contracts

Lyu Yongbin Wen Lin
School of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 case documents published online from 2014 to 2019, panel data of the incidence rate of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at the prefecture-level i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benefit and financial equit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incidence of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Further heterogeneity tests also prove that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stronger in areas with relatively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d low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with different case acceptance fees is differen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land contract disputes by reducing regional income gap, improv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mitigating the chang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nd dispute; rural governance; judgment document

质疑、反思与深耕：案例研究的价值维护与类型划分

王　刚　张　玲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案例研究作为实证研究中重要的质性方法，在实际研究中备受关注和使用。但是鉴于案例研究概推问题及其哲学基础受到冲击，案例研究也广受质疑。要切实推进案例研究，需要对这些质疑展开回应，寻找其价值所在。案例研究的提升，需要在对案例研究的类型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增加研究的严谨性，提高研究质量。基于二维的分析框架，可以将案例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佐证深描型、佐证俯瞰型、提炼俯瞰型和提炼深描型。四种案例研究的类型对应不同的逻辑进路，从而有着不同的研究策略和改进路径。

关键词：案例研究；概推；价值维护；类型划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4-0085-11

一、问题的提出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对研究方法极为重视，研究方法而非研究领域，越来越成为区分学科的最为重要的维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已经跨越了家庭、企业，延伸至政府乃至个人行为、法律解释（例如知名的法经济学）；社会学也当仁不让地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但是在宽广的研究范畴之下，人们却很容易定位经济学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独特的研究方法。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也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①]。的确，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②]。经济学、社会学等对研究方法的成功，使得一些以往依靠单纯宏大叙事方式的学科（例如公共行政学）开始反思，从而对案例研究越来越青睐。案例研究法最早起源于美国，1870年由哈佛大学的兰德尔（Landell）首创。案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③]，可以有效弥补单纯宏大叙事方式的不足，也可以有效回避定量研究的质疑和缺陷，从而获得了学界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和使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沿海特大城市风险的韧性治理研究”（21AZZ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刚，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风险治理、地方政府治理研究；张玲，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安全与风险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页。

② 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李春成：《略论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9期。

但是随着案例研究的风靡,对案例研究的质疑也与日俱增[①],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完全的否定。例如针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国乡村的实证案例分析,莫里斯·弗里德曼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表达了对费孝通这一研究进路的质疑。他认为费孝通最大的缺陷在于研究方法上,因为太过狭隘的局限在村庄中,从而难以描述出一幅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系统画面[②]。弗里德曼的批评不无道理,甚至切中要害。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不刻意限制自己研究的适用范围,都有"走出个案"的学术抱负[③],概推性[④]难题"就像一团乌云永久地盘旋于每一项个案研究之上"[⑤],"难以进行科学的类推"也成为案例研究的典型缺点[⑥]。

既然案例研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案例研究的价值或者优于单纯宏大叙事方式之处,又在哪里呢?本文的研究,希望对此有所回答。首先,对案例研究的质疑甚至不足进行系统、尽可能全面的回归与整理,对案例研究的真正问题以及学界在此方面修复的努力进行回顾;其次,在此基础上对案例研究的价值进行维护,从而洞悉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最后,在案例研究价值维护的基础上,对案例研究的类型进行划分,提炼出完善案例研究的方法和策略,为案例研究的科学使用提供参考和帮助。换言之,本文希望在回答案例研究的价值基础上,提炼出一套有助于提高案例研究使用策略的方法。

二、案例研究的价值质疑

目前,针对案例研究的价值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特性的,即从单一案例得出的结论具有多大的适用范围?二是外部基础的,即案例研究赖以存在的实证主义哲学面临冲击,使得人们质疑案例研究并不适合社会科学[⑦]。

(一)从单一或某几个案例得出的结论,可否概推,获得普世性的结论

如上所述,进行案例研究的研究者们,显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停留在案例本身,都具有走出个案的学术抱负,从而都希望能够将自己从案例中提炼的结论加之概推。这种研究诉求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研究者价值所在。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训练,就是提炼出可以不断复制不断概推的科学规律,它甚至成为科学研究者区别于一般普通大众最为核心的特性之一。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有一个研究的强假设:只要我们理解了典型想象,我们就可以将其概括并推广到个体和具体问题[⑧]。对于自然科学而言,这一强假设屡试不爽,但是在异质性特强的社会科学中,这一强假设并不成立。从单一案

① 侯志阳、张翔:《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何以促进知识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期。

② Maurice Free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382.

③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 "概推"一词在不同的学科或者研究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表述,"类推""外推""代表性"以及"外部效度"等都可以视为相同的涵义。

⑤ Feagin J. R.,Orum A. M. & Sjoberg G.,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p.148-173.

⑥ 陈振明:《社会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⑦ 王刚:《案例研究的价值冲击与维护》,《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⑧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例（或者多个案例）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和规律，在其他的环境和状况中，可能完全无效甚至相反。

当然，案例研究的维护者为了抵消这种质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回应。概括而言，这种回应可以概括为两种方法，或者两种策略：

一种方法可以概括为“走出个案”，其代表当属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和布洛维 (Burawoy) 的“扩展案例法”。中国最为知名和成功的案例研究学者非费孝通先生莫属。费先生认为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不同类型的村庄调查，“用比较的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就可以“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①]。布洛维 (Burawoy) 则认为要进行案例的概推，需要改变传统的案例研究的逻辑思路。布洛维以卡兹（Katz）的实证科学研究为参照，概括了他所界定的“反思科学”（Reflexive Science）的截然不同的概推原则：介入（intervention）、过程（process）、结构化（structuration）和重构（reconstruction）。对应四项原则，扩展案例的方法具体化为四个操作维：即从观察者到参与者，时空扩展，从过程到结构，理论扩展[②]。

另一种方法可以概括为“超越案例”，其代表当属格尔兹（Geertz）的“案例深描法”。格尔兹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进行案例概推的弊端，所以他特别反对两种研究取向：“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和“复活节岛即试验案例”式的“自然实验模式”[③]。格尔兹认为从案例的支撑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无论其经验效度如何，充其量也都是一种解释性假说，并不会像物理实验所获得的知识那样经过“验证”。案例研究的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概推出结论，而在于它可以为一些宏大概念的产生及反思提供给养，比如“国家”“公平”“公正”。人们通过案例，对一些抽象和宏大的概念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

但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完全回答案例研究的概推问题，也缺乏有效应对这种质疑。费先生的类型比较法是典型的归纳逻辑思路，追随穆勒的逻辑进路，试图进一步完善案例概推的逻辑归纳。布洛维针对质疑者，开始反思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指出案例研究的重点并非在于推演出理论，而是对现有理论的修正或者反思。而格尔兹本身则接受了质疑者的批判，对案例研究的概推表现出明显地不自信，更推崇从案例本身提炼其相关的理论。三者的维护指向了三种不同的案例研究进路，但是其实质并没有很好地阐释案例研究概推问题，也没有给予质疑者以很好的回应。实际上，两种方法的无解，顺理成章。如果拘囿案例研究概推的逻辑本身，我们永远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有着满意的回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跳出概推之外去寻找。

（二）语言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对实证主义的否定，冲击了案例研究赖以生存的哲学基础

实证主义自孔德创立之后，很长时间以来都成为社会科学的圭臬，也是案例研究最为重要的哲学基础。但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首先对其发难的是维特根斯坦，维氏对语言符号价值的挖掘，使得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具有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在其影响和启发下，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语言哲学兴起，尤其是建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哲学流派，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使得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社会科学难以获得一些普遍性的规律，社会科学只能具有有限的普遍性。与之

①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 34—35 页。

② Michael Burawoy, "The Exten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1998, 4, pp.4-33.

③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25 页。

相对的,来自案例的材料提炼,不管是单一案例,抑或多个案例,都难以获得普世性的理论提炼。伴随着当代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代社会科学的认知模式更强调知识的语境化。概括而言,现代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出现了四大转向:逻辑转向、语言转向、历史—文化转向、知识转向。这种转向形成了目前的三个主流观点:反实证主义、知识的语境化、知识的不确定性[①]。目前的研究发现,甚至连社会科学最具普世性的逻辑学(逻辑推理)也受到人们的心理因素、情感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的理性[②]。科学真理相对化的引入,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观和科学线性进步的天真认识。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因素,才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运行和传播的基本语境。

现代哲学转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案例研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动摇了案例研究的哲学基础,更是放大了案例研究概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得案例研究的价值摇摇欲坠。试想,如果我们的知识获得难以通过经验的观察,资料的分析,一切来自案例的分析,都无法提升到理论的层次,那么,案例研究的价值又何在呢?

三、案例研究的价值维护

既然案例研究自身以及哲学基础都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缺陷,那案例研究何以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呢?笔者在2015年曾经从读者而非研究者的角度对案例研究的价值进行了维护[③],但是案例研究的价值显然并非局限于此。实际上,对案例研究的价值维护,需要跳出以往单纯拘囿案例本身的视阈,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角度去寻找。即使案例研究的概推问题无法解决,以及实证主义面临冲击,案例研究依然具有其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将重拾案例研究者的信心,也指向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其价值的挖掘也将为案例研究的优化提出方向。

(一)案例研究可以将隐喻的知识具身化,从而便于理论的传播和接受

如果我们对案例研究持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我们会发现任何的研究可能都是基于案例的。正如Bernard所言:"诸如寓言、讽寓、远见、揭露的事物、神话、故事、悲剧、小说等从古代就开始运用社会个案"[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研究也是一种案例研究。研究者通过历史事件的梳理,试图从中发现规律,从而为今所用。当然,随着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案例研究的推进,他们力图给予案例研究以界定,从而使得案例研究获得独立的研究方法地位。但实际上理论几乎都是基于对于现实案例的一种反思和提炼,只是很多研究者在论文的写作中没有将这种提炼的过程向读者完整的展现,因而没有被纳入案例研究的范畴之内。

实际上,相对于单纯的宏大叙事方式,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所构建的理论就一定更为普世或科学,而在于它可以更为便捷地"俘获观众"。案例不仅仅是理论提炼的基础和来源,它更

① 殷杰:《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② 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③ 王刚:《案例研究的价值冲击与维护》,《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 L.L. Bernar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Research Method and Procedure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28,2,pp.301-304.

是进行理论传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个深奥、晦涩的理论可能让读者（案例研究的“观众”）扑朔迷离，一头雾水，但是辅之以相关案例的阐释，常常让读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从案例提炼出来的理论和知识，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和深信不疑。实际上，一个能够通晓社会并被广而传播的理论，其重点并非在于这一理论论述的如何完善，而在于这一理论是否与周围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相契合，从而赢得读者的认同。换言之，案例可以将隐喻的知识和认识具体化。莱考夫（Lakoff）等人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①] 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概念和理论在直接认知上存在困难。而通过案例的诠释，则可以让隐喻的知识和理论更为具体和通俗易懂。因此，案例研究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研究者可以构建一个微型的叙事氛围，从而将读者吸引并逐渐融入自己所构建这一个叙事氛围中，从而让读者追随自己的心路历程。当读者与案例研究者所营造的案例氛围相契合的时候，研究者推论出的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为读者所接受，甚至深信不疑。尽管案例的研究可能出于自己理论提炼的目的，扩大对理论支撑有力的一些案例资料，或屏蔽一些对理论结论不利的一些案例资料。

（二）案例研究可以洞悉相关事务的因果关系，化解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价值

案例研究的这一价值是相对定量研究而言。毋庸讳言，发现事务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探究两者的因果关系是科学研究的精髓所在。但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定量研究在洞悉事务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广受诟病，并显得无能为力。量化模型对于解释因果关系非常不充分，因为统计模型本身并没有展示正向或反向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因此，绝大多数大样本量化的分析无法验证因果关系本身，验证的只是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之后有可能呈现的结果。以统计学为核心的定量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很好地发现 A 与 B 两个事务之间是否具有正相关、负相关以及非相关关系。但是单纯的数字难以有效回答如下两个问题：首先，A 与 B 的相关是否是真正的相关，而非伪相关？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伪相关，例如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在夏天，冰激凌的销售量与溺水人数呈现正相关。但是这一相关是典型的伪相关，因为它们中间的关键因素是夏天天气闷热而导致的两者上升；其次，是 A 导致了 B，抑或是 B 导致了 A？换言之，A 是原因，还是 B 是原因？如果没有准确把握，将导致因果倒置的逻辑谬误。这种问题，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生性”问题[②]。内生性问题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包括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遗漏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③]。

这种状况，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使得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的对立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统计应用过程中，定量社会科学家们对于因果分析的态度是胆怯和怀疑的。但是如今的情势正好恰恰相反。定量研究中经常滥用因果分析——把大量的禁不起推敲的数据都冠以因果关系的名号。这种状况使得定量研究广受诟病。但实际上，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以一定的背景 (contingent) 为基础的[④]。换言之，要发现和深入分析 A、B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单纯依靠冰冷的数字，它需要在一个宽广的背景分析、情景介绍和发展脉络之中进行挖掘。很多研究指出，定量研究对于发现因果机制是无

①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 *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1999,p.3.

② [美] 加里·金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年。

③ 随着量化研究的推进，统计学上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应对这一问题，其采用控制变量的方式，尽量消除内生性问题。但是控制变量的选择本身，并非是量化本身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案例以及质化的辨析思维。

④ 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能无力的[①]。质言之,要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单纯的统计无法胜任,需要辅之以案例。这种认识已经为学界的学者所洞见,并尝试改进。例如Glynn A N等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在纯粹的定量框架内通过定性的信息来加强因果解释[②]。不管是统计分析,抑或单纯的理论推演,都不具备案例研究对因果关系把握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的这种优势。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如果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特定案例中的因果机制,那就需要以定性研究为主[③]。通过对案例情境的全面认知,前因后果的情节描述和推演,人们更容易把握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把握不仅仅涉及双因素事务的因果关系,也可以洞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甚至多因多果的关系。

(三)案例研究可以实现社会科学理论的叠加式增长,从而使得社会科学更接近"科学"而非"哲学"

人类的认知体系可以分为科学、哲学和神学。对于社会科学家,力图将社会科学纳入科学的范畴,是其一直不遗余力的努力方向,这从社会科学冠以"科学"的后缀可窥一斑。但是非常遗憾地是,社会科学的很多理论——依靠宏大叙事方式或者单纯理论推演所收获的理论——往往更具有哲学的特性,而非科学的特性。即一个新理论的诞生往往证明以前一个旧理论的完全错误,从而毫无价值。哲学上的这种否定式发展,使得哲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当前的哲学理论并非一定比两千年前的理论更正确。

显然,如果社会科学还是单纯采用哲学的这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将无法完全摆脱哲学的这种知识或者理论增长模式,从而也使得社会科学更像"哲学"而非"科学"。但是案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改进研究方法的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它可以让我们的知识得以积累,使得社会科学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知识和理论呈现螺旋式或者叠加式的增长,而非以往哲学的完全推翻式的增长,从而使得我们对以往的知识完全丧失信心。通过案例研究,社会科学家至少在两个方面保证了知识的不断增长:首先,案例本身所包含与分析的资料,将成为后来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它保障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材料增长;其次,案例研究会不断规范与细化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科学或创新性的案例研究思路,会启发后来者遵循这一案例研究的新进路,从而使得案例研究更为科学。近年来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案例研究的深入,人们不断改进案例的资料归纳方法和理论提炼技巧,从而使得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及结论不断接近"科学",而具有了科学的特质。

(四)案例研究可以更好地展示理论的情境原理和适用前提,让读者更好的把握理论的内在张力和适用前提

理论具有形式化的天然倾向,不管是自然科学,抑或是社会科学,都有删繁就简的内在需求,奥卡姆剃刀[④]是这一倾向的最好注脚。诚然,理论删繁就简的形式化,的确有利于理论的快速传播和讲

① 黄晨:《政治学的"行动——过程"视角——重思林德布洛姆及其方法论意义》,《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② Glynn A N and Ichino N, "Us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o Improve Causal In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4,59(4),pp.1055-1071.

③ 盛智明:《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之争——KKV对定性研究设计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④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是由14世纪出生在奥卡姆的威廉提出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tied unnecessarily)。对于科学家,这一原理最常见的形式是:当你有两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简单的那个更好。

解，但是它抽取了理论成立的情境概述、前提假设以及解读视角。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上述三者对于深入理解理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谢宇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原理，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 principle）[①]。即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很多规律和模式也会变化。毫无疑问，鉴于社会科学的异质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以及理论，具有很强的社会情境性。如果无视理论提取的社会情境，对社会科学的理论适用，将冲破理论提取时的现实藩篱，将理论的适用范畴无限扩大，从而造成理论适用的盲目无向，或者狂妄自大。此外，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隐含着成立的前提假设，一旦这一前提假设不存在，或者发生了改变，其理论也就无法在现实状况中运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发现理论成立的前提假设，比单纯发现理论或者修正理论更为重要和关键，它也成为推动社会科学不断进步的动力。再者，理论的构建者，都具有切入的不同视角。不同的视角切入和解读，对于得出何种结论和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和事实，不同的切入视角，得出的结论和性质界定可能截然相反。中国古代存在大量意义相反的“谚语”，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显然，我们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理论的情境概述、前提假设以及解读视角，案例研究是最合适不过的工具。案例研究对于挖掘案例研究的社会情境以及前提假设，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案例的情境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情境。读者在追溯研究者进行案例提炼的过程中，本身就是在重温理论提取的社会情境，从而对理论的如何提炼有一个内在的认知。案例研究也便于研究者以及读者，共同把握理论成立的前提假设，能够洞悉从案例中提炼的理论具有怎样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同样的逻辑，案例研究者无法掩饰自己提取理论的切入视角，将把自己的研究切入视角呈现在读者及后续的研究者面前，从而有利于全面评估和把握理论。

四、基于优化案例研究方法的类型划分

当然，对案例研究的价值寻找和维护，远不是优化案例研究的结束，它只是开始。案例研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并不是说明案例研究不必寻找章法，任何的案例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在这方面，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尝试。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悉尼·维巴三位教授所著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设计》是其代表性成果。因此，对案例研究的研究进路，以及优化路径展开研究，才是推进案例研究的关键，也更能体现其研究价值。下面，笔者将从案例研究类型划分的角度，对案例研究的优化路径和策略展开探讨。

目前，对案例研究的类型划分，既有的研究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比较知名的当属斯特克（Stake）的分类，他将案例研究分成三种类型，即内在的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工具性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和多个案研究（multiple case study or collective case study）[②]。在内在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研究某个案例，并非因为该案例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而是出于对该个案本身的兴趣；在工具性个案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案例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

①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② Robert E. Stake,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2005,p.444.

工具,对于个案本身的兴趣退居次要地位;多案例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工具性案例研究,研究者旨在研究某个总体或一般情况,对于特定的个案本身则没有什么兴趣。斯特克的分类,仅仅指明了不同类型案例研究的特点,但是未对其研究方法和策略进行系统的分析。

在斯特克的分类基础上,殷(Yin)也构建了一个案例分类框架,他根据案例的数量维度(单案例与多案例)以及分析单位维度(嵌入性与整体性),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整体性单案例研究(single-case holistic design)、嵌入性单案例研究(single-case embedded design)、整体性多案例研究(multiple-case holistic design)、嵌入性多案例研究(multiple-case embedded design)[①]。殷对案例研究的类型划分,也同样没有涉及案例分类的本质属性[②],但殷的论述从一个层面说明现在的案例研究类型划分具有缺陷。例如他提出四种检验案例研究的策略:建构效度、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和信度。在论述内在效度时,他明确指出,内在效度仅与解释性案例有关,而并不适用描述性案例研究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至于为何存在这种差异,殷的分类就没有涉及,也难以深入探究,因为他的分类维度是形式的。但是殷的双维度分类标准较之斯特克的单一维度标准,显然推进了一大步。借鉴于殷的双维度划分方法,我们对案例研究的类型也采用这一策略[③]。

众所周知,社会研究方法按照研究目的不同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④],这种研究目的的差异,也造成了案例研究动机的不同,有的研究者就根据研究动机的差异将案例研究区分为问题驱动式和理论驱动式。这一分类是有益的,甚至洞悉了案例研究的本质特性。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更希望提炼出某种理论;而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则更倾向于对既有理论的证成或证伪,即持有一种佐证的心态。因此,我们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将第一个分类维度,确定为"佐证——提炼"维度。其中,佐证既包括正向的(即建构理论),也包括负向的(即批判理论)。这一划分在学界已经获得认可,只是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苏敬勤将其划分为"验证性运用模式"与"探索性运用模式"[⑤]。

其次,在案例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案例的使用策略是不同的。有的秉承宏观视角,以一种纵横捭阖的手法,对所使用的案例进行比较和概括;有的则秉承微观视角,以一种深耕细描的精神,去深描所使用的案例。这种案例使用策略的不同,构成了案例研究类型划分的第二个维度,即"俯瞰——深描"维度。我们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和案例的使用方法,构建了案例研究类型划分的双重维度"佐证——提炼"维度与"俯瞰——深描"维度。两个维度纵横交叉,从而可以将案例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佐证深描型、佐证俯瞰型、提炼俯瞰型和提炼深描型(图1)。

1. 佐证深描型。在这一类型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对既成理论的证成或证伪,它通过对某一个或多个案例的深耕细描,使得读者深化对某一个理论或概念的认知,或者引起读者对既

① [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② 依据案例的数量来进行分类,显然不是案例研究划分的最为核心的特性。斯特克和殷的局限性正在于此。

③ 对于案例研究的分类还有很多,例如Scapem(1990)和Hussey(1997)将其分为探索型、描述型、例证型、实验型和解释型的案例研究;以及将案例研究方法区分为探索型、描述型、解释型和评价型四种类型。但是这些分类标准大多是一维的,或者存在外延交叉,相对于殷的二维分类,其科学性值得商榷。因此,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④ 张杨波:《重构案例研究方法的逻辑——基于受控比较视角下的方法论探索》,《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 苏敬勤、李召敏:《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模式及其关键指标》,《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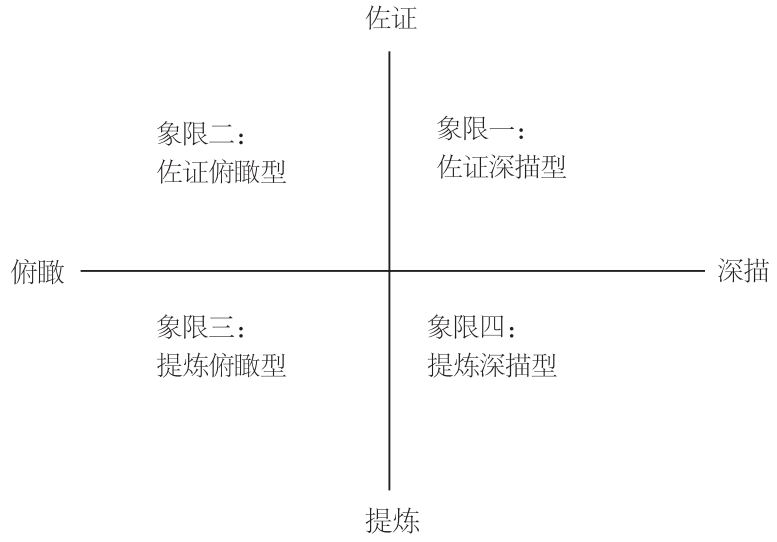


图 1

成理论或概念的质疑。佐证型的代表者和支持者当属 Bernard，他认为案例研究是用来阐明和支持命题和规则的方法，而不是归纳出新的假说。换言之，案例研究一定要是理论驱动的，而非问题驱动的。佐证深描型案例研究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个便捷之处在于，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提取案例资料的很好的标准和方向，从而避免研究者将案例的所有情节和资料面面俱到地展示给读者。诚然，这一便捷之处，也提出了保证这一类型案例研究成功的关键：一定要避免对案例面面俱细、不分轻重的全面描述，而要在描述的案例情节和资料中，让读者感受到所需佐证理论的若隐若现，通过案例情节的阅读，从而升华到对佐证理论的全新认识。佐证深描型案例研究的研究思路，是在系统论述一个宏观理论的基础上，再加以一个详实的案例加以佐证，从而打动读者，让理论具有实证属性。周雪光（2005）的《“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黄晓春、周黎安（2017）的《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等，都是这种案例研究方法的典范。

2. 佐证俯瞰型。这一类型的案例研究，在本质上与佐证深描型并无二致，其差异之处在于案例的使用策略和方法。较之佐证深描型案例研究，佐证俯瞰型案例研究要取得成功，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或者改进：首先，佐证俯瞰型尽可能地采用多案例研究，而非单案例研究。尽管佐证深描型也可以采用多案例研究，但是拘于深描的特性，不可能实现更多案例的比较。而佐证俯瞰型则可以实现多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案例的比较，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其次，可以适度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不同案例的数据统计，从而获得一些深描无法获得资料和数据；最后，要注意案例的匹配性和合适性，不能为研究提供良好佐证的案例，可能对于研究恰得其反。练宏（2016）的《注意力竞争——基于参与观察与多案例的组织学分析》等，是这种案例研究方法的代表。

3. 提炼俯瞰型。这一类型的案例研究，研究者在于通过不同案例的比较或大跨度的俯瞰，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理论；或者将问题和资料展现后，让读者自己去回味和提炼理论。科学成熟的提炼俯瞰型案例研究，其惯常的手法是先案例探索而得出理论框架，后用统计调查法进行验证：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的理论探索，构建出创新性概念模型和提出理论假设，再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新量表，通过问卷发放、数据处理和分析，以验证模型和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提炼俯瞰型具有“提炼——佐证”的多重循环特性，也是与定量研究结合性最大的一类案例研究。提炼俯瞰性

型案例与近几年来的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具有相同之处,是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笔者通过这种思路撰写的《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2018)、《理论验证与适用场域: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分析——基于14个案例的检验分析》(2019)是这一案例研究方法的代表。

4. 提炼深描型。与提炼俯瞰型案例研究相比,这一类型的案例研究更注重深入案例的情景描述和细节观察,从具体案例的情节描述中发现问题,从而提炼理论。提炼深描型案例研究的代表当属发轫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于1967年创立[①],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与佐证类的案例研究不同,扎根理论反对带有既成理论或者成见地去分析案例和资料,它强调研究者完全自下而上的去发现理论。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例如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②],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③],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④],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注重"问题——理论"导向,而非"理论——问题"导向。扎根理论的成功和广泛使用,证明提炼深描型案例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扎根理论是提炼深描案例研究方法最为典型的代表,但并非是其唯一的研究进路。有的案例研究在使用提炼深描型案例方法时,更侧重案例的深描,对理论及其提炼更为隐含。换言之,其论述的思路是将案例逐渐呈现给读者,但是并非简单地在文末展现案例描述收获的"理论",而是交给读者去深入思考,引导读者去提炼理论。何艳玲(2009)的《"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邱鸿峰(2013)的《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等文章,可以看作这种案例研究套路的代表。

按照研究目的和证明方法的双维度,对案例研究进行类型划分,是一种深化案例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可以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把握案例研究优化的路径。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现有的案例材料,选择可行的案例研究类型。诚然,每一种类型的案例研究,都具有自己的研究特点、研究进路,以及存在的不足。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案例研究,从而更好地凸显案例研究的价值与边界所在,从而将案例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恰当和合适的位置。

五、结束语

不管是案例研究的批判者,抑或案例研究的维护者,他们对案例研究前期卓有成效的思辨,促进了我们对案例研究的深入思考。但是通过对案例研究本身的回顾,我们发现学界对其价值的维护,没有很好地回应批判者的质疑,也没有触及案例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们对案例研究的价值寻找,需要跳出案例研究本身,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去探究。从本质上而言,案例研究并非一定比单纯的

① B.G.Glaser and A.C. Strauss,*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7.

② B.G.Glaser,*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92.

③ J.M.Corbin and A.C. Strauss,*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Inc,2008.

④ K. Charmaz,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6.

理论推演或者宏大叙事方式更为科学和完美，研究者不应期待每个案例都能展开完美描述。理想类型就是这样一种众所周知的“建构物”，其中每个具体的案例都只是局部接近于理想类型[①]。约翰·格宁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如果我们认为相邻的单元完全是不可比的，那么案例研究方法就是不可行的，“案例研究”就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特定类型的所有案例都是完全可比的，案例研究同样是荒谬的。既然所有的案例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集中于其中的某一个单元呢？案例研究学者就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②]。

实际上，案例研究本身的不足，也是人们认知本身的不足，是“研究”本身的不足。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如果要论证确凿无疑，它们就一定与现实无关。只要论证涉及现实，就必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③] 我们对案例研究本身的缺陷及价值，认识得越全面和深入，我们对其运用就会越合理，越可能从中发现更多科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案例研究价值认知的基础上，更应该对案例研究的优化路径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其类型的划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本文对其研究类型的划分，是为了区分不同案例研究的优化路径，从而使得对案例研究的把握更为细致和系统，也为不同的案例研究优劣提供一个比较框架。笔者相信，为案例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归纳和提炼其不同种类的案例研究策略，是推进案例研究的唯一正确途径，它将不断积累案例研究的成果和心得，从而使得案例研究不断成长和成熟。诚然，笔者对案例研究每一种类型的特性把握，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也期待着本文的研究，启发后来的研究者对其更为深入的思考，从而推进案例研究。

责任编辑：董德英

Question, Reflection and Delving: Value Maintena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ase Studies

Wang Gang　Zhang L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qualitative method in empirical research, case study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nd used in practical research. However, in view of the impact of case study generalization and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case study is also widely questioned. To truly advance case study, we need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ing and find its value. To improve case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it on the basis of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rigor of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Based on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case stud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supporting deep description, supporting overlook, refined overlook and refined deep description. The four types of case study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logical approaches and thus have different research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paths.

Key words: case study;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value maintenance; type classification

①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4,pp.845−855.

② John Gerring,"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2,pp.341−354.

③ Schumpeter. Joesph A, "Can Capitalism Survive?" in Richard Swedberg (ed.), *The Economics of Sociology and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298−299.

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型学考察及其治理策略

李慧玲 陈洪连

青岛大学 反腐倡廉研究中心,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类型学考察,有助于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的独特表征,进一步反思其共性特征,为辨证施治奠定基础。聚焦于类型学的分析视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可以划分为价值迷茫型、诚信缺失型、权利失控型、道德绑架型等不同类别。基于分类治理的要求,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治理应该各有侧重。但是,单一措施往往难以奏效,应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从价值引领、弘扬“善治”、重塑诚信、唤醒责任、自我规制、社区营造等方面探寻应对策略。

关键词: 高校网络舆情; 伦理失范; 类型学; 网络道德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096-10

类型学研究旨在分门别类地研究特定问题,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划分为若干类型。“类型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常用的基本方法,主要在于建构框架、确定场域。”① 从类型学角度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需要在明确划分依据的基础上,构建更加清晰的、立体化、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别界定、表征分析及其治理策略等方面。

一、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内涵及其类型学考察的意义

当今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复合性、丰富性、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大学生网民作为网络信息的第一接触者,求知欲和好奇心强烈,敏锐度和可塑性较高,其观点和态度往往决定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由于受到互联网技术的隐匿性和虚拟性,现实伦理道德在网络空间的“失语”、大学生网络伦理观念的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所谓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指在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与演变的过程及其应对,大学生违背网络伦理原则和规范,在价值、认知、语言、心理、行为等方面发生的混乱失序状态。“哲学上把社会既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高校突发网络公共事件应对策略研究”(YB15087)和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时代干部容错的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QDSKL1901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慧玲,女,山东菏泽人,青岛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讲师,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网络治理研究; 陈洪连,男,山东临沂人,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① 喻中:《法家的类型学考察》,《东方法学》2016年第4期。

有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破坏，对社会成员缺乏约束，社会呈现某种紊乱无序状态称之为伦理失范。”[①] 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失范，又是网络心理行为的失范，实质上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失范，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失范”[②]，它反映了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基本伦理规则的缺位及其调控作用的弱化或失灵。

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具体的、特殊的、情境性的现象。从学理上讲，往往难以穷尽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所有样态，并逐一列出对应的解决办法。但在实践中，可以运用类型学分析的方法，搭建具体与抽象、特殊性与普遍性、情境性和概括性沟通的桥梁，在明确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什么”的基础上，归纳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具体类型“有哪些”，进而探讨分类治理或辨证施治应该“如何做”。简而言之，运用类型学方法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同时也有助于全景式呈现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描绘其特定的诱发因素或触发机理，进而基于分类施治和综合治理的要求，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同时也有助于在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独特表征的基础上，更好地反思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共性特征。

其一，高校网络舆情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是现实社会人性危机的折射和反映。“网络信息技术的负面效应实质上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③] 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加剧，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日益多元。高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抬头，违背诚信、放弃道义、极端利己主义现象屡见不鲜，言行不一、见利忘义、破坏公物、情感放纵等现象时有发生。高校道德滑坡、人性危机蔓延扩散，投射到网络空间中，会引发诸多伦理问题。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指出，“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赛伯空间的创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们以诚相待的实验性世界，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④] 高校大学生群体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人性危机的影响，高校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炒作盛行，致使高校网络舆情道德危机和伦理失范的萌发。

其二，高校网络舆情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是网络伦理秩序紊乱的印证和体现。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隐藏诸多道德风险，对高校网络伦理秩序形成严峻挑战。大量事实证明，高校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网络上常常形成肯定或否定、支持或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网络舆情的内在生成发展机理本质上是技术高度发达的风险社会公众集体情感的释放。心理学称，人类天生具有使得自己认知结构保持相对不被破坏的倾向性。而一旦这种倾向性受到干扰破坏，就会产生关于某类事件否定性的评价和态度”[⑤]，这是维持情感平衡，寻求心理慰藉的手段。一方为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往往将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搁置一旁，对另一方横加指责、露骨讥讽或无耻谩骂，双方争吵恶斗导致网络上充斥着污言秽语，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严重污染网络生态。诚如美国政治家斯蒂文森所讲：“魔鬼

① 程晓宇：《纠正媒体伦理失范刻不容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② 彭小兰、李萍：《网络道德失范的类型、特质及其应对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③ 靳凤林、邵艳：《网络伦理学的依据、内容和职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
④ [美] 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1 页。
⑤ 孙越：《网络舆情的伦理秩序建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不在原子中,而在人的心灵中”。高校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助推网民的非理性化、情绪化、极端化、负面化的网络表达,进一步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进而导致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

其三,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蕴含网络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高校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发生网络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网民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网民以网络自由为理由,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网络舆情管理主体则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网络舆情管理”①,网络自由及其规制是网络舆情治理的核心议题,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大学生作为网络舆情管理的客体,宣扬“我的地盘我做主”,过度强调个体的网络自由,认为维护“公共善”的网络舆情管理活动侵犯了个人自由,忽视了自己应尽的网络责任和义务,进而容易出现网络自由和“公共善”的失衡。

二、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分类依据及其具体类型

目前学者主要聚焦于网络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并基于特定标准做出类型划分。例如,王娜、孙伟认为,网络伦理失范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网络价值异化、网络语言失范、网络诚信缺失、网络侵权盛行。② 刘丽萍对大学生网络行为伦理失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其常见类型为网络言语失范、学术腐败、涉及网络色情和欺诈。③ 徐文婷认为,大学生网络行为伦理失范的常见类别主要是学术论文抄袭现象普遍、大学生“黑客”层出不穷、微博言论伦理失范。④ 学者较为关注网络行为伦理失范问题,而对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基于对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型划分,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是亟需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需要首先明确依据和标准。评价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依据和标准多种多样,按主体维度可分为管理者伦理失范和大学生伦理失范;按表现维度可分为显性伦理失范和隐性伦理失范;按内容维度可分为价值迷茫型伦理失范、诚信缺失型伦理失范、权利失控型伦理失范、道德绑架型伦理失范等等。应予说明的是,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纷繁复杂,并非简单的类型划分就能囊括全部现象。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类型学考察,相关的分类依据和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类型的伦理失范现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征。本文侧重于从内容维度出发,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和分析。

(一)价值迷茫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大学生是网络用户的原住民和主力军,习惯于通过网络空间表达倾向性意见、态度和观点。大学生在虚拟空间进行即时交流,可以很方便地隐匿真实身份。在缺乏互联网主流价值导向的情况下,个别大学生我行我素,很容易产生价值迷茫现象,主要表现为:

---

① 徐铁光:《网络舆情管理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② 王娜、孙伟:《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实质及其防治》,《高教学刊》2015年第3期。

③ 刘丽萍:《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高教学刊》2016年第2期。

④ 徐文婷:《大学生网络行为道德失范》,《重庆高教研究》2022年第3期。

一是主流价值观念荒芜。由于网络崇尚多元价值，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部分大学生根据个人价值偏好解读网络文化，只关注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网络信息，推崇网络文化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极少考虑国家命运、民族情怀、奉献精神等主流价值观念。

二是价值固化或冲突现象突出。部分大学生不善于理性思考，奉行“娱乐至死，加冕为王”的反智化消遣文化，娱乐狂欢现象甚嚣尘上，网络文化产品越来越模式化和套路化，加剧了网络信息的同质化。个体的自我封闭与自娱自乐，导致“信息茧房”产生。有的大学生本能地拒斥反思和挑战，价值固化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如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个别大学生往往放纵自我，过分看重个性化表达，不能有效化解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个体和集体等方面的价值冲突。

三是价值虚无主义显现。当今时代，网络文化迭代更新加快，内容变动不居，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受此影响，网络文化擅长解构而非建构，习惯于挑战规范而非确立规范，旧的价值准则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网络价值真空难以避免。由于缺乏互联网主流价值的引导，价值虚无主义现象浮出水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也导致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异化，它在去中心化的同时造成了人类过度的自我沉醉，沉醉到头脑完全虚无到一切。而这让现实的伦理准则在网络世界中彻底崩塌。”[①] 围绕特定事件产生的网络舆情，大学生展示出浓厚的兴趣，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解读。由于对网络舆情事件没有事先的制度规范和行为约束，没有总体性价值目标的指引，很多人仅是从自身利益和个人见解出发，坚持“怎么都行”的态度，不断切换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价值虚无主义日渐彰显。

（二）诚信缺失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大学生喜欢在网络空间畅所欲言，表达见解。他们是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年龄大体相近、知识结构相仿、社会阅历较少，对网络虚假信息缺乏甄别和判断能力，容易以讹传讹，不断放大信息的虚假性。虚假网络舆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

在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个别大学生罔顾事实，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任意传播虚假信息或政治谣言，制造思想混乱，甚至攻击和诋毁政府，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有的大学生在网络上注册虚假的个人信息，为传播不实信息提供掩护，肆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大学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事实一知半解，捕风捉影夸大宣传，未经考证，任意发布不实信息；有的大学生罔顾社会责任，竞相转发网络谣言，导致网络谣言呈几何级数增长；还有的大学生为在评优评奖过程中“脱颖而出”，大搞网络虚假投票，开展更为隐秘的舞弊和不公正行为，等等。凡此种种，导致虚假网络舆情野蛮生长，引发网络混乱与无序。

（三）权利失控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在网络空间表达观点和意见是大学生正当的网络信息权利。但是，如果网络信息权利被滥用，则很容易发生网络信息权利失控的风险，网络偏激或低俗言论、网络语言暴力、网络黑客行为等即是例证。

其一，网络偏激或低俗言论的出现。面对恋爱挫折、学业坎坷、事业不顺、生活困顿等问题，有的大学生将网络作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平台，为吸引眼球和寻求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言论偏激，行为乖张，肆无忌惮地发表违背事实和常理的言论。有的大学生在网络交流或发帖留言时，将粗鄙低

① 杜仪方：《风险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以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为例证》，《行政法论丛》2012 年第 1 期。

俗用语甚至污言秽语散布于网络空间,甚至出现痞子化、黄色化和黑话化的网络语言风格。

其二,网络语言暴力的放纵。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是指个别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发布具有攻击性、伤害性、侮辱性的视频资料和语言文字的现象。有的大学生崇尚“暴力美学”,在高校网站网页、电子公告栏、网络聊天室、博客论坛等媒介上,无端攻击谩骂、人身污蔑、恶意诽谤屡见不鲜,遗忘理性、不讲法治、逾越伦理的现象频频发生,在行使自身网络信息权利的同时侵犯他人正当的网络信息权利。

其三,网络黑客行为的发生。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自媒体缺乏“把关人”等因素,有的高校网络黑客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及时的矫正。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个别大学生滥用网络信息权利,实施网络黑客行为。他们凭借网络技术优势,未经他人允许进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信息,或是攻击对方电脑程序导致电脑瘫痪,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财产权。

(四)道德绑架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与现实社会舆情传播的整体性特质不同,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带有“去整体性”“碎片化”的色彩。“网络的碎片式流行语有着极强大的传染性,往往容易产生跳跃性的节奏和瞬间变动的情绪。”[①] 在此情形下,高校网络“意见领袖”就以博主、版主的身份整合和引导网络舆论,将其意见和态度凌驾于众多网民之上,主宰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进而产生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膜拜和英雄主义,助推网络道德绑架现象的发生。

网络道德绑架是指该行为实施者以个人道德准则为标准,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他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人迎合和遵守其道德立场和态度的行为。“道德绑架本身之所以也是一种道德失范,事实上就是因为道德绑架本身要么只是简单地符合道德绑架者本人一时的道德判断,要么道德绑架者本人并非出于道德的目的,而只是单纯地为了通过道德评判的方式来获得读者的响应,进而迫使被绑架者屈服于道德压力。”[②] 该行为打着“道德正义”幌子,行舆论绑架之实,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取代复杂维度的相互宽容。它对个体道德义务提出过高要求,剥夺他人的道德权利和自由,弱化道德和法律约束力。

网络道德绑架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个别大学生网民挥舞“道德大棒”,对他人进行无底线的抨击和讨伐;或是利用博主、版主的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凌驾于其他网民之上;或是利用网民的个人崇拜情结,煽动网民情绪,主宰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或是以“英雄”自居,对异见严加斥责,用煽动性和情绪化语言刺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令其在众声喧哗或群情激愤下丧失判断力,进而沿着错误方向发表不当言论,产生“群氓狂欢”的景象。这种“道德绑架式”的做法,打上“个人意志”的深刻烙印,存在违背网络道德和主流价值的风险,容易导致网络舆情偏离正常轨道,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

三、辨证施治: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治理策略

在谋划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治理策略时,应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做到分类施治与综合治理的结合。“当我们认定事物属于一种类型而非另外一种类型时,意味着我们要运用适用

① John Paul II, *Message for the 33 rd World Communications Day*. *n .4* , January 24,1999.

② 韩旭:《网络道德绑架的失范与治理》,《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

于这一类型的方式去把握和对待它，如果疏于认定或造成混淆，则很容易使我们的行为走向行为目的的反面。”[①] 为应对价值迷茫型、诚信缺失型、权利失控型、道德绑架型等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需要在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独特性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地采取应对举措。譬如，对于第一类伦理失范，重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对于第二类伦理失范，重在加强社会信任和道德诚信建设；对于第三类伦理失范，重在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对于第四类伦理失范，重在提高“网络意见领袖”的责任伦理水平。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单纯依靠某一种治理策略，往往难以奏效。治理不同类型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需要在把握其共性的前提下，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多措并举、辩证施治。

（一）价值引领：对网络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应用

高校网络舆情变动不居，大学生思想鱼龙混杂，价值选择日益多元，部分学生是非颠倒、荣辱不分、善恶混淆，网络舆情乱象纷至沓来，亟需在网络空间构建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引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

在价值观转化层面，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移植，创造性地应用到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凝练高校网络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直接依据。为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价值引领，有必要将“和谐”“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应用，以有效抵制低俗、媚俗、庸俗的网络信息，坚决取缔暴力、色情、反动的网络内容。

其一，网络和谐价值观。在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要实现网络舆情主体、网络舆情客体、网络舆情内容的和谐。党和政府、高校、媒体等利用伦理规范进行网络舆情管控，引导大学生网民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尊重他人正当权益，传播充满积极信息和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促进网络和谐目标的实现。

其二，网络自由价值观。网络自由不是无法无天，不是奉行无政府主义，而是要有自己的伦理限度，即行使个人的自由，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网络自由更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否则会引起网络混乱与无序。

其三，网络平等价值观。在网络空间，每个主体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尊卑有序之别。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在网络社区每个人都是“道德异乡人”，都可以平等地对话交流，平等地享有网络权利。

其四，网络公正价值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各种德性中，“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光辉。”[②] “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的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③] 网络公正价值观倡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数字鸿沟”的消极影响，防范对他人正当网络权利的侵害。

其五，网络诚信价值观。“人无信不立”，网络社会如果缺乏诚信，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炒作

① 王爱菊：《教学冲突的类型学考察》，《现代教育管理》2011 年第 8 期。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03 页。

③ [美]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 页。

会屡见不鲜,人们在网络社区将无法进行高效沟通。因此,无论是网络舆情主体,抑或是网络舆情客体,都要恪守网络诚信价值观。上述五个方面的价值观,分别构成了网络核心价值观的目标、限度、底蕴、精髓和基础,五者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在高校网络舆情伦理秩序建构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党和政府、高校、媒体等要善于运用微信、微博等渠道,传播充满积极信息和正能量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网民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尊重他人正当权益;要培养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敢发声的优秀学生干部担任网络"意见领袖",让他们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导航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围绕高校热点问题发表权威意见,引领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谨言慎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弘扬"善治":推动多元主体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架构,无法适用自上而下层层控制的科层体制,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弥散的、民主的、多元的治理体系。"网络的出现打破了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赖以存在的地域,使政治权力在流动的信息与发达的信息技术面前显得无能为力。"① 这就需要弘扬"善治"的伦理精神,在网络空间落实平等对话、民主协商的精神,动员网络舆情利益相关者在网络空间合作共治,进而达成网络道德共识并自觉遵守相关伦理规范。

网络舆情"善治",推崇平等交流和民主协商的伦理精神。要承认和尊重高校管理者、教师、大学生社团、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网络地位和权利,实现各方的沟通与合意,创制诸如《大学生文明上网公约》等广泛认可和普遍遵守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规则。要实现高校网络舆情信息共享,共同致力于解决高校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网络攻击等问题,保证高校网络舆情得到有效治理。

网络舆情"善治",提出广泛参与和合作共治的道德呼吁。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需要全体网络参与者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不能搞"关门主义"和单方主导,而应当通过政府、社会、家庭、学生等多方参与、共享共治构建互联网伦理秩序。各参与主体都有权提出意见和主张,将自身的利益关切体现在网络道德约定之中;都有权全程参与网络道德规则的讨论、制定、签署、公布、实施等所有环节,使多元主体的意志和利益得到公平合理地协调。高校要落实相互信任机制,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通过网络空间的开放合作寻求利益联结点,做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这种合作的内在机理基于如下的愿景:这一治理网络愈大,参与范围愈广,合作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当然这有赖于加入网络的利益相关者对已制定规则的共同遵守以及由此给其他参与主体所带来的示范意义。"②

(三)重塑诚信:增强"制度+技术+教育"治理效果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逐渐成为践行诚信的新空间。针对高校网络舆情诚信缺失的问题,需要遵从"制度+技术+教育"的思路,引导大学生开展诚信之行,塑造诚信品格,闪耀诚信之光,为建设网络诚信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健全高校网络诚信管理制度。高校应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科学评估大学生诚信表现,并

① 周汉华:《互联网对传统法治的挑战》,《法学》2001年第3期。

② Morth. U,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4, 141.

辅之以必要的褒奖和惩罚机制。要贯彻网络实名制管理，要求学生上网时输入校园卡号码或身份证号码。要成立高校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统筹辟谣渠道，实现全平台同步推送，及时消除各类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

其次，运用技术手段防范大学生网络失信行为。要大力开发大学生网络监控软件，在软件中植入上网诚信提示，对大学生浏览网页的行为进行痕迹识别和信息监测，过滤不良网站，拦截不实信息，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可靠。高校要善于运用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宣传诚信榜样和典型事例，开辟网络诚信建设新阵地。

第三，实现高校网络诚信教育生活化和常态化。要发掘和整理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诚信故事，引导大学生见贤思齐，在潜移默化中涵养诚信品格。要将诚信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中，同时围绕网络诚信主题开展征文比赛、微电影制作、文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此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品格，增强网络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唤醒责任：提高网络管理者责任伦理水平

“唤醒主体的责任自觉意识既是责任伦理内在的道德诉求，也是化解现实伦理责任危机的旨归所在。”[①] 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提升责任伦理水平，有效应对各种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

首先，防患于未然，履行好网络舆情“把关人”的职责。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及时收集高校网络舆情动态，定期向学生干部、辅导员、学院（或系）团委通报；整合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构职能，构建运转顺畅的网络舆情工作联动机制，对煽动性、暴力性网络言论进行实时监控；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激励大学生追求真善美，自觉抵制假恶丑，提高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预防化解能力。

其次，构建工作机制，规避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风险。要完善公开公正透明的网络舆情沟通机制，确保网络舆情可管可控，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要建立高效运转的网络舆情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发布舆情信息动态，通过主动设置正面议题，把握网络舆情引导主动权；要建立常态化的网络舆情评估分析机制，评估网络舆情风险，消除网络不实信息和不当言论。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大学生正当权益。高校管理层应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消除其愤恨不满、牢骚满腹的根源，防止他们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转移到网络空间；要全面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需求，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干预工作，解决大学生情绪偏激、消极厌世、自我封闭、自私冷漠等问题，引导大学生培养积极情绪和正向思维，减少刻薄的中伤和恶意的谩骂，积极净化网络生态，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利失控型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几率。

第四，贯彻依法治校，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和引导大学生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和安全上网。健全网络法律法规，加强高校网络管理制度建设，及时删除人身攻击、道德绑架之类的网络信息，必要时采取网络禁言或注销注册账号的措施，并严肃处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道德绑架者。

（五）自我规制：增强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意识

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②] 面对网络技术的冲击和挑战，道德自律是破解

① 潘建红、杨利利：《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9 页。

良方。“网络空间是与物理空间不同的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网络与现实社会不同的场景和特性决定了把传统伦理道德的运行机制直接搬到网络空间中是行不通的,网络空间需要构建适合网络特性的新伦理秩序,而这种构造,核心的问题是网络行为道德伦理主体的建构。”① 因此,每个网络道德伦理主体要基于理性,关照网络“公共善”和共同体利益,养成网络自律的良好习惯和美德。

一方面,增强大学生自我规约的能力,推动网络他律向自律的转换。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面前,有效规制网络舆情失范现象,不能寄希望于关闭网站、删除网贴、禁止上网等强制性策略,而应倡导“慎独”的理念,敦促大学生严格约束自己,培养良好的网络人格,拥有健全的网络心理,开展正确的网络行为。唯有如此,外在的网络他律规范才能真正转化为内在的自律操守,形成稳定的网络人格特质和行为反应模式。

另一方面,号召大学生自发制定网络自律公约,加强自我管控的意识和能力。康德指出,道德的本质是“人为自己立法。”② 可依据或参考《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倡导制定诸如《校园文明上网公约》、《大学生网络行为规范》等校园规范性文件。要建立大学生互联网道德档案,充分发挥良心“道德法庭”的作用,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审判,矫正网络舆情表达的失范现象。要努力做到“慎独”,自我约束,洁身自好,遵纪守法,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切实维护网络道德秩序。

(六)社区营造:推进自媒体和网络社区伦理建设

随着高校网络社区的快速发展,网络社区逐渐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只有在管理和自我约束下,才能够形成融合了不同文化追求却有共同道德伦理规范的网络社区。”③ 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自上而下与大学生群体自下而上相结合,共同致力于自媒体和网络社区伦理建设,是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精神的体现。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已呈现出多中心共同参与的特点,管理者和大学生要相互合作、共同配合,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和渗透性,推动自媒体和网络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

其一,重视自媒体伦理建设,矫正自媒体网络行为。自媒体为所有人发表意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受限制的空间。要围绕网络技术、信息传播、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等对大学生开展自媒体伦理教育,重塑自媒体发布者的网络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教导大学生恪守伦理底线,不随波逐流,不迷信网络信息,走出失之于盲从,失之于浮躁,失之于肤浅,失之于迷惘的道德困境。

其二,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拓展网络社区伦理建设资源。要对“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把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意识发扬光大,增强高校网络文化社区参与者的责任观念和契约意识,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网络参与态度和行为。要借鉴传统“礼法合流”“德法共治”“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等思想,把网络立法管制同网络媒介主体自律相结合,让诚实守信遍布网络社区的各个角落,引导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社区的整体利益。

其三,要学习西方网络文化社区伦理建设的经验,规范网络信息发布与大学生个人或社团使用

① 严耕:《网络伦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4页。
③ 裘伟廷:《虚拟世界呼唤网络伦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信息的合法性。由于扁平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是网络社群的重要特征[①],这些特征也让参与网络社群的社会个体获得了不同于社会实体组织结构的文化—心理体验。[②] 要顺应网络文化和网民心理变化趋势,建构网络社区伦理规则,大力宣传公平、正义、责任、宽容等传统美德,引导大学生以理性态度参与网络生活,增强其伦理判断和抉择能力。

综上所述,从类型学角度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价值迷茫型、诚信缺失型、权利失控型、道德绑架型等若干类型。在高校网络舆情日益复杂的当下,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辨证施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解决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权利冲突,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发展,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二是创新高校网络舆情伦理规制手段,将市场规范、技术规范、法律规范、行政规范、文化规范等创造性转化并运用到网络舆情管理之中,做好网络舆情的指导和协调工作。三是实现网络舆情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予强调的是,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每一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发生的独特机理,推动研究兼顾学理层面的反思和实践层面的考察,并归纳和探索分类施治的精准策略。

责任编辑:董德英

Typology of Ethical Anomie in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Its Governance Strategy

Li Huiling Chen Honglian
Anti-corruption Research Center,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unique characteriza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rther reflect on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the ethical anomi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such as value confusion, lack of integrity, rights out of control, and moral kidnapping.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of ethical anomi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have different focuses. However, a single measure is often difficult to work. Therefore, we should adhere to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approach, and explore countermeasures from such aspects as value guidance, 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 rebuilding integrity, awakening responsibility, self-regul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thical anomie; typology; network morality

① 庞正、周恒:《场域抑或主体:网络社群的理论定位》,《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12 期。
② 于春洋、于亚旭:《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东方论坛》2020 年第 5 期。

富则思安与富而思进：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王克稳 于岩平

青岛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在创新驱动战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重要支撑的背景下，基于2007—2018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冗余资源三种机制在绩效期望顺差不同水平上截然不同的作用，企业同时表现出“富则思安”和“富而思进”的行为模式，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为先负向后正向的U型结构；由于年龄引致的组织惯性存在，相较于年龄较小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更为平缓。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企业绩效反馈视角系统剖析企业创新的动机，还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绩效期望顺差；企业创新；企业年龄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4-0106-11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创新驱动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来，对于企业创新的关注日益增加。但自2018年至今，中兴、华为和抖音等中国企业相继被美国等国家以各种借口进行了技术禁令，企业经营受到一定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关键技术的部分缺失。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为重要。企业创新常被视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已有研究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从企业实际绩效和期望绩效的比较角度分析了企业的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行为。一般认为，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即存在绩效期望逆差时，企业倾向于风险偏好[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社会责任解耦行为研究：制度冲突、资源依赖和行为反馈”（71902093）和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企业灾难捐赠的多元维度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J16YF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克稳，男，山东巨野人，管理学博士，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企业行为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于岩平，女，山东乳山人，管理学博士，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组织行为研究。

① Cyert R M, March, J G, "A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47(2), pp. 263-291；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葛菲：《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3期。

而当企业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即存在绩效期望顺差时，企业则倾向于风险规避[①]。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仍尚无定论，正向影响[②]、负向影响[③]、U型影响[④]和倒U型影响[⑤]多种争论结果并存。

那么对于企业创新而言，当面对绩效期望顺差时，企业是表现出“富则思安”的风险规避倾向，还是“富而思进”的风险偏好倾向呢？又抑或两者兼具？且无论是“富则思安”还是“富而思进”，均建立在企业可以根据绩效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创新战略的基础上。对于成立年限较早的企业，由于更为正式的层级结构而具有了较高的组织惯性，表现为组织结构和战略无法及时调整。那么对于这些年龄较大的企业而言，年龄引致的组织惯性是否会制约绩效反馈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企业行为理论的重要理论主题，还是推进战略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现实课题。

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企业行为理论出发，厘清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以及企业年龄对影响路径可能存在的抑制作用。并基于2007—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在丰富企业行为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企业实施和政府引导可持续的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行为理论

企业行为理论认为，在有限理性的限制下，企业更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和组织惯例进行决策[⑥]，因此常被用于从实际绩效和期望绩效的差距视角，解释和预测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规避行为[⑦]。该理论认为企业通过评估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的差距来决定后续的行为选择，当实际绩效低于

---

① March J G, Shapira Z,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on risk and risk taking", *Management Science*, 1987, 33(11), pp.1404-1418; Miller K D, Chen W-R, "Variable organizational risk preferences: Tests of the March-Shapira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1), pp.105-116.

② 钟熙、宋铁波、陈伟宏等：《经营期望顺差与企业商业腐败行为》，《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7期。

③ Miller K D, Chen W-R, "Variable organizational risk preferences: Tests of the March-Shapira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1), pp.105-116；张远飞，贺小刚，连燕玲：《“富则思安”吗？——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7期；蒋艳，金思瑶：《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4期。

④ 吴雨亭：《经营期望顺差与研发投入》，华南理工大学，2018年。

⑤ Ref O, Shapira Z, "Entering new markets: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near aspiration and well below and above i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7), pp.1416-1434.

⑥ Simon H 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5, 69(1), pp.99-118；Schwenk C R, "Cognitive simplification processe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2), pp. 111-128.

⑦ Cyert R M, March, J G, "A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March J G, "Variable risk preferences and adaptive aspi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8, 9(1), pp.5-24；Greve H R, "Performance, aspirations, and risky organizational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 43(1), pp.58-86；Greve H 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om performance feedback: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and change by Henrich R. Gre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期望绩效时,有限理性的管理者会将这种状态界定为企业的损失状态[①],从而驱动管理者更高的风险偏好以使企业绩效回到期望水平之上[②];而当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时,企业则倾向于风险规避[③]。由于成功率较低,企业创新常被视为一种风险偏好行为[④],因此企业行为理论可以用来深入剖析企业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假设

1. 绩效期望顺差与企业创新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相较于实际绩效略低于期望绩效的企业,实际绩效略高于期望绩效的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规避和更低的风险偏好[⑤]。但对于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的企业而言,其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程度可能随着期望绩效顺差的增加而有所不同,原因可以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三种作用机制展开。

当企业绩效略高于期望绩效时,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可能使得企业创新随着期望顺差的增加而降低。具体而言:其一,高管自信。当绩效期望顺差较小时,随着顺差逐渐增加,管理者倾向于相信企业现有的经营战略是正确的,对现有的经验、经营模式形成路径依赖[⑥],进而导致企业在面临创新机会时,自信的高管受制于已有经验,依赖于现有战略而忽视创新机会,表现出风险规避的特征。其二,失败风险。尽管企业创新往往伴随着较大的失败风险,当存在绩效期望顺差时,为避免重新掉入绩效逆差,仍然需要创新来保持绩效的持续提升。当绩效顺差较小时,企业需要较大程度的创新,但伴随着顺差的逐渐增大,企业只需要较小的创新便可以保证绩效的稳定增长,表现出风险偏好逐渐降低,避免创新失败使企业重新落入绩效期望逆差[⑦]。其三,资源冗余。当绩效期望顺差较小时,企业资源冗余较少,且随着顺差的增加,稳固现有经营水平所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越来越

① March J G, Simon H A,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② 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葛菲:《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3期;Harris J D, Bromiley P, "Incentives to cheat: 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on financial misrepres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 18(3), pp.350-367; Kellermanns F W, Eddleston K A, Sarathy R, et al, "Innovativeness in family firms: A family influence perspectiv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2, 38(1), pp.85-101.

③ 张远飞、贺小刚、连燕玲:《"富则思安"吗?——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7期;Lant T K, Milliken F J, Batra B, "The role of managerial lear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strategic persistence and reorientation: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8), pp.585-608; 蒋艳、金思瑶:《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4期。

④ 蒋艳、金思瑶:《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4期。

⑤ March J G, Shapira Z,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on risk and risk taking", *Management Science*, 1987, 33(11), pp.1404-1418p; Miller K D, Chen W-R, "Variable organizational risk preferences: Tests of the March-Shapira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1), pp.105-116; Bromiley P, "Testing a causal model of corporate risk taking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1), pp.37-59.

⑥ 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葛菲:《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3期。

⑦ Wiseman R M, Bromiley P, "Toward a model of risk in declin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risk, performance and decline",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5), pp.524-543; Lant T K, Milliken F J, Batra B, "The role of managerial lear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strategic persistence and reorientation: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8), pp. 585-608.

多，导致冗余资源更多地被投入到现有经营，而非创新的试错中，降低了企业创新。

而当绩效期望顺差进一步扩大到某一特定水平之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三种作用机制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其一，高管自信。企业绩效远超期望水平可能使得高管过度自信甚至是自大，过度自信的高管倾向于高估自身的能力和创新行为的成功率，进而进行激进的企业创新[①]。其二，失败风险。当企业绩效远高于期望水平，即便大规模的企业创新失败，所导致的损失也难以让企业掉落到绩效逆差[②]，企业的创新行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企业会倾向更为激进和更大规模的创新行为。其三，资源冗余。企业绩效远高于期望绩效时，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和人力不会无限制增加，从而使得冗余资源逐渐积累，丰富的冗余资源为企业实施高风险的创新战略提供了资源支撑，促进了企业创新[③]。

综上，随着绩效期望顺差的逐渐增加，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对企业风险偏好截然相反的作用机制，会使得企业创新先降低再增加。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 U 型，随着绩效期望顺差的增加，绩效期望顺差先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后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2. 企业年龄的调节作用

面对同一水平的绩效期望顺差，年轻的企业和年老的企业可能具有不同水平的风险偏好，原因可能来自于企业年龄引致的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其一，组织惯性。组织生态学表明，年老的企业具有更高水平的可再现性，由于存在更为正式的层级结构、更大的规模，而具有更高水平的组织惯性[④]。相较而言，年轻的企业由于成立年限较短，企业经营更多依赖于与新客户的合作，企业之间的信任和长期关系需要时间来建立，企业经营惯例同样需要时间来积累，这使得年轻的企业具有更低水平的组织惯性。其二，管理者惯性。相较于年轻企业，稳定运营的年老企业的员工需要更长时间才可以晋升至高管团队，由此导致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也可能更高。相较于年轻的管理者，年老的管

① Malmendier U, Tate G,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6), pp.2661-2700; Galasso A, Simcoe T S, "CEO overconfidence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11, 57(8), pp.1469-1484；王山慧、王宗军、田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科研管理》2013 年第 5 期；林慧婷、王茂林：《管理者过度自信、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经济管理》2014 年第 11 期；Tang Y, Li J, Yang H, "What I see, what I do: How executive hubris affects firm innov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6), pp. 1698-1723; Wang D, Sutherland D, Ning L, et al,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on R&D intensity in China's large-scale private sector firms", *Technovation*, 2018, 69, pp.40-53.

②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47(2),pp. 263-291.

③ Maccrimmon K R, Wehrung D A, "Assessing risk propensit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oundations of utility and risk theory",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6; Antonelli C, "A failure-inducement mode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talian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1980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9, 12(2), pp.159-180; Wehrung D A, "Risk taking over gains and losses: A study of oil executives",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989, 19(1), pp.115-139.

④ Hannan M T, Freeman J,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5), pp.929-964；Le Mens G, Hannan M T, Polos L, "Age-related structural inertia: A distance-based approa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 26(3), pp.756-773.

理者由于体力和精力有限、更偏好稳定的工作环境,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①]。

因此,由于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的存在,当绩效期望顺差处于较低水平时,即便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促使企业降低创新投入,但老企业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重新评价和调整现有的创新战略,年龄带来的高管团队的惯性也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保持现有创新战略的稳定性,从而导致随着绩效期望顺差的增大,相对于年轻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得更慢。当绩效期望顺差处于较高水平时,绩效期望顺差带来的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资源冗余促发企业更为激进的创新。但老企业带来的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不仅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识别创新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制定新的创新方案、创建新的创新团队和实施创新战略,也可能导致管理者的风险规避而不能有效地进行创新、甚至抵触创新,从而造成企业错失创新机会而被迫降低企业创新水平。最终造成随着绩效期望顺差的增大,相对于年轻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创新水平上升得也更慢。

综上,即便企业出现绩效期望顺差,企业年龄所带来的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调整创新战略。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年龄负向调节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U型关系,相较于年龄较小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U型关系更为平缓。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A股主板2007-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删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ST类样本,共得到包括3511家上市公司的24791个观察值的非均衡面板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测量方式可以分为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两种类型。鉴于专利申请、专利获批、新产品销售等创新产出相较于创新投入决策的滞后性,可能无法准确反映绩效反馈的即时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创新投入来测量企业创新,具体借鉴余明桂等[②]、李溪等[③]、蒋艳和金思瑶[④]的研究,使用研发支出和营业收入的比值测量企业创新,对于未披露研发支出的样本,赋值为0。

① Carlsson D, Karlsson K, "Age, cohorts and the generation of gen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0, 35(4), pp.710-718; Child J,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mpany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y*, 1974, 11(3), pp.175-189.

② 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

③ 李溪、郑馨、张建琦:《制造企业的业绩困境会促进创新吗——基于期望落差维度拓展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④ 蒋艳、金思瑶:《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4期。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绩效期望顺差，基于资产收益率（ROA），借鉴 Bromiley[①]、Baum et al.[②]、连燕玲等[③]的研究，使用实际绩效（$P_{i,t}$）和历史期望绩效（$A_{i,t}$）的差值计算绩效期望顺差。历史期望方式的计算公式为：$A_{i,t}=(1-a)P_{i,t\text{-}1}+aA_{i,t-1}$。其中 a 代表权重，取值范围为 [0,1]，本文取值 0.75。企业期望绩效差距为 $P_{i,t}-A_{i,t}$，企业绩效期望顺差设置为 $\left(P_{i,t}-A_{i,t}\right)\times I_{i,t}$，当企业期望绩效差距大于 0 时，设置 $I_{i,t}=1$，否则 $I_{i,t}=0$。

调节变量为企业年龄，使用企业 IPO 日期到报告日之间的天数与 365 的商表示，这一算法相较于使用整数，可以更为精细地测量企业年龄。

3. 控制变量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变量遗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除引入了企业规模、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股权集中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率、组织冗余、行业丰裕度、行业动态性和行业集中度等被已有研究验证的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之外，模型还控制了行业效应、省份效应和年份效应。除此之外，还控制了绩效期望逆差，与绩效期望顺差一起引入回归模型，企业绩效期望逆差为 $\left(P_{i,t}-A_{i,t}\right)\times I_{i,t}$，当企业期望绩效差距小于 0 时，设置 $I_{i,t}=-1$，否则 $I_{i,t}=0$。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定义和测量方式具体见表 1。

（三）模型设定

Hausman 检验结果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和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为避免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所有模型的因变量均做了滞后一期处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R\&D_{i,t+1}=\beta_0+\beta_1 PGAP_{i,t}+\beta_2 PGAP_{i,t}^2+\sum\beta_c Controls+FE_{industry}+FE_{region}+FE_{year}+\varepsilon_{i,t} \quad (1)$$

$$R\&D_{i,t+1}=\beta_0+\beta_1 PGAP_{i,t}+\beta_2 PGAP_{i,t}^2+\beta_3 Age_{i,t}+\beta_4 Age_{i,t}\times PGAP_{i,t}+\beta_5 Age_{i,t}\times PGAP_{i,t}^2 +\sum\beta_c Controls+FE_{industry}+FE_{region}+FE_{year}+\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模型（2）用来检验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

---

① Bromiley P, "Testing a causal model of corporate risk taking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1), pp.37−59.

② Baum J A C, Rowley T J, Shipilov A V, Chuang Y T, "Dancing with strangers: Aspir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search for underwriting syndicate partner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4), pp.536−575.

③ 连燕玲、贺小刚、高皓：《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4 年第 11 期。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知,企业创新的均值为2.8202,标准差为3.9920,高于均值,说明上市公司之间的研发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绩效期望顺差的均值为0.0140,标准差为0.0376,同样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3931(限于篇幅,相关性系数未列出),且整合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在1.05–1.73之间,均值为1.26,远小于临界值10,因此回归模型不太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企业创新	R&D	研发支出/营业收入	2.8202	3.9920
企业年龄	Age	企业IPO日期到报告日天数/365	9.9461	7.0151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	22.0257	1.4440
国有企业	SOE	国有企业赋值为1,其他为0	0.3971	0.4893
董事长总经理兼任	Duality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编码为1,其他编码为0	0.2590	0.4381
股权集中度	Topten	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58.7585	16.0874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率	Separation	CSMAR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率	4.8618	7.5879
组织冗余	Slack	财务冗余和人力资源冗余标准化之后的均值	0.0025	0.0010
行业丰裕度	Munificence	使用t,t–1,t–2,t–3,t–4年的行业销售额对相应的年份变量进行回归,用所得年份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反自然对数测量该行业t年的行业丰裕度	1.2215	0.2138
行业动态性	Dynamism	使用t,t–1,t–2,t–3,t–4年的行业销售额对相应的年份变量进行回归,用所得年份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测量该行业t年的行业动态性	0.0384	0.0407
行业集中度	HHI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0.1047	0.1110
绩效期望逆差	NGAP	企业绩效期望逆差为$\left(P_{i,t}-A_{i,t}\right)\times I_{i,t}$,当企业期望绩效差距小于0时,设置$I_{i,t}=-1$,否则$I_{i,t}=0$	0.0172	0.0393
绩效期望顺差	PGAP	企业绩效期望顺差为$\left(P_{i,t}-A_{i,t}\right)\times I_{i,t}$,当企业期望绩效差距大于0时,设置$I_{i,t}=1$,否则$I_{i,t}=0$	0.0140	0.0376

(二)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了缓解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考虑到异方差的因素,回归结果均按公司进行聚类,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1)仅引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组织冗余、行业丰裕度和行业集中度均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说明企业创新受到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行业环境的双重影响。模型(2)引入了自变量的一次项,结果显示绩效期望顺差的回归系数为–1.2348,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①,说明企业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的程度越高,企业越不倾向于进行创新。

① 蒋艳、金思瑶:《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4期。

模型（3）进一步引入了绩效期望顺差的二次项，回归结果显示绩效期望顺差一次项的回归系数为 −4.5867，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 16.8152，且均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 U 型，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模型（4）引入了企业年龄和绩效期望顺差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乘积项，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年龄和绩效期望顺差一次项的回归系数为 0.7466，与模型（3）中绩效期望顺差一次项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企业年龄和绩效期望顺差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 −3.6854，与模型（3）中绩效期望顺差二次项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且均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相较于年龄较大的企业，对年龄较小的企业而言，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之间的 U 型关系更为陡峭，验证了假设 2。

表 2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onstant	3.4360 （4.1690）	3.8067 （4.4455）	3.8715 （4.4547）	4.0847 （4.4467）
Age	−1.3606 （0.9965）	−1.4290 （1.0812）	−1.4298 （1.0842）	−1.4935 （1.0838）
Size	0.0775 （0.0515）	0.0707 （0.0518）	0.0691 （0.0518）	0.0734 （0.0518）
SOE	0.0042 （0.2134）	−0.0012 （0.2136）	−0.0101 （0.2138）	−0.0024 （0.2135）
Duality	−0.0465 （0.0818）	−0.0483 （0.0818）	−0.0496 （0.0818）	−0.0498 （0.0817）
Topten	0.0038 （0.0030）	0.0041 （0.0031）	0.0041 （0.0031）	0.0036 （0.0031）
Separation	−0.0031 （0.0059）	−0.0031 （0.0059）	−0.0034 （0.0059）	−0.0034 （0.0059）
Slack	132.6632*** （35.7657）	133.5727*** （35.7719）	131.4665*** （35.7857）	124.9523*** （35.7314）
Munificence	0.2625* （0.1329）	0.2633* （0.1329）	0.2660* （0.1329）	0.2656* （0.1327）
Dynamism	0.4342 （0.7193）	0.4364 （0.7201）	0.4446 （0.7195）	0.4410 （0.7180）
HHI	0.7597† （0.4596）	0.7551 （0.4597）	0.7425 （0.4594）	0.7330 （0.4592）
NGAP		0.4707 （0.5397）	0.2198 （0.5420）	0.2415 （0.5411）
PGAP		−1.2348* （0.5527）	−4.5867*** （1.0820）	−13.6290*** （2.7942）
$PGAP^2$			16.8152*** （4.6895）	62.6153*** （14.4849）
Age × PGAP				0.7466*** （0.2050）
Age × $PGAP^2$				−3.6854*** （0.9740）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 R^2	0.1640	0.1645	0.1650	0.1660
N	24791	24791	24791	24791

注：*** 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了三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一,替代自变量的测量方式。基于ROA,将 a 取值0.5计算绩效期望顺差。其二,使用子样本进行回归检验。依据上市公司所属的证券交易所,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两个子样本。其三,使用Heckman两步法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由于37.84%的观察值未披露研发支出信息,单独使用披露该信息的样本或将未披露该信息的观察值赋值为0,可能导致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而使得研究结果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创新行为。鉴于此,本部分使用Heckman两步法,首先以是否披露创新支出信息作为因变量,通过Probit样本选择模型构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 IMR),其次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第二步的回归模型。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绩效期望差距对企业创新的U型影响和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均保持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变量	ROA(α=50)		上交所		深交所		Heckman两步法	
Constant	3.9125	4.2504	0.8933	0.9718	8.4825	8.8769	0.6512	0.5830
	(4.4634)	(4.4459)	(2.2503)	(2.2532)	(13.7728)	(13.7748)	(3.6971)	(3.6655)
Age	−1.4336	−1.5227	−1.0524	−1.1077†	−1.7959	−1.8544	−2.4551	−2.5465
	(1.0855)	(1.0826)	(0.6694)	(0.6729)	(2.0985)	(2.1004)	(1.6549)	(1.6655)
Size	0.0666	0.0686	0.0835	0.0875	0.1420†	0.1428†	−0.0583	−0.0541
	(0.0521)	(0.0519)	(0.0711)	(0.0711)	(0.0734)	(0.0735)	(0.0824)	(0.0824)
SOE	−0.0111	−0.0004	−0.1236	−0.1114	0.1006	0.0992	0.0839	0.1158
	(0.2140)	(0.2132)	(0.3617)	(0.3607)	(0.2411)	(0.2406)	(0.3878)	(0.3882)
Duality	−0.0488	−0.0499	−0.0862	−0.0833	0.0125	0.0072	0.0466	0.0456
	(0.0819)	(0.0819)	(0.1128)	(0.1129)	(0.0940)	(0.0934)	(0.0994)	(0.0994)
Topten	0.0043	0.0038	0.0110*	0.0105*	−0.0138**	−0.0139**	0.0088†	0.0083
	(0.0031)	(0.0031)	(0.0043)	(0.0043)	(0.0047)	(0.0047)	(0.0047)	(0.0047)
Separation	−0.0034	−0.0035	0.0052	0.0051	−0.0101	−0.0099	0.0088	0.0087
	(0.0059)	(0.0059)	(0.0091)	(0.0091)	(0.0067)	(0.0067)	(0.0086)	(0.0086)
Slack	132.4369***	126.9088***	163.2221***	157.1894***	−54.6184	−57.2170	163.9591***	157.7815***
	(35.8489)	(35.8879)	(45.9666)	(45.8670)	(47.1997)	(47.3932)	(49.3927)	(49.2931)
Munificence	0.2698*	0.2725*	−0.1341	−0.1362	0.8491***	0.8460***	−0.3170	−0.3226
	(0.1330)	(0.1327)	(0.1918)	(0.1916)	(0.1788)	(0.1780)	(0.2139)	(0.2137)
Dynamism	0.4417	0.4323	0.4952	0.4761	−0.4674	−0.4462	−0.8960	−0.9149
	(0.7195)	(0.7178)	(1.1473)	(1.1445)	(0.7096)	(0.7100)	(0.8967)	(0.8953)
HHI	0.7403	0.7399	0.4570	0.4520	0.8174	0.7987	0.9611	0.9543
	(0.4598)	(0.4595)	(0.6809)	(0.6807)	(0.5925)	(0.5926)	(0.6839)	(0.6853)
IMR							0.4987	0.5366
							(0.3444)	(0.3435)
NGAP	0.1411	0.1024	−0.2101	−0.1925	0.9977	1.0497	1.2395	1.2646
	(0.5878)	(0.5872)	(0.7838)	(0.7834)	(0.6988)	(0.6998)	(1.0416)	(1.0432)
PGAP	−4.2298***	−15.3905***	−4.9694**	−11.7322***	−2.9075*	−13.5307**	−5.4288**	−13.3261***
	(1.2307)	(3.1470)	(1.5782)	(3.4571)	(1.4597)	(4.5900)	(1.8211)	(3.4130)
$PGAP^2$	14.6166**	80.5722***	18.8645**	50.9341**	11.8895*	68.8320***	17.9453†	52.2217*
	(5.3692)	(16.6934)	(7.1365)	(19.8272)	(5.8298)	(19.9557)	(9.4398)	(22.4173)
Age × PGAP		0.9093***		0.6271*		0.7814*		0.7263**
		(0.2266)		(0.2785)		(0.3180)		(0.2517)

Age × $PGAP^2$		−5.2205*** （1.1257）		−2.8978* （1.4016）		−4.1107** （1.3163）		−3.1185* （1.4010）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 R^2	0.1649	0.1664	0.1311	0.1316	0.2700	0.2712	0.0382	0.0391
N	24791	24791	14641	14641	10150	10150	15411	15411

注：*** 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和讨论

在创新驱动战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甚至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提升重要支撑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由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冗余资源三种机制在绩效期望顺差不同水平上截然不同的作用，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 U 型，即随着绩效期望顺差的逐渐增加，绩效期望顺差先负向影响企业创新，后正向影响企业创新；（2）由于存在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企业年龄负向调节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 U 型关系，即相较于年龄较小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 U 型关系更为平缓。

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企业绩效反馈视角系统剖析企业创新的动机，还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对于企业而言，当面对创新战略调整机会时，企业年龄带来的惯性会限制企业行为，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调整创新战略。因此，企业一方面可以尝试通过实时监控创新机会、评价企业现有创新战略来提升响应速率，为调整创新战略创造时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优化高管团队年龄多样性，克服组织惯性；除此之外，战略联盟被证明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①]，因此企业还可以与年轻的企业建立创新联盟，通过自身的资金实力和年轻企业灵活性的互补，把握创新机会。对于政府而言，如何解决企业创新的后顾之忧则成为激励企业创新的关键。对于实际绩效略高于期望绩效的企业而言，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补贴[②]、无息贷款等方式，激励企业积极创新。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系统梳理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冗余资源三种作用机制在绩效略高于期望和绩效远高于期望下截然不同的作用，更为清晰地剖析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2）验证了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 U 型关系。相较于已有研究发现的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风险偏好的正向或负向的线性影响，本文发现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可以同时存在，这一非线性关系的验证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3）控制了选择性偏差问题。由于企业创新投入存在缺失值，即部分企业未披露创新投入，由此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可能严重影响数据结果，相较于已有研究直接将缺失值赋值为 0 或者删除观察值的处理方式，

① 吴松强、黄盼盼、曹新雨：《企业关系资本、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先进制造业产业技术联盟的实证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② 苏屹、林雨侬：《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 R&D 投入影响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21 年第 1 期。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基于Heckman两步法控制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探讨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时,从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角度出发,但并未直接测量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鉴于组织惯性包括文化惯性、认知惯性、知识惯性、资源惯性等丰富的内涵,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直接测量组织惯性和管理者惯性,挖掘组织惯性及其不同维度对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另外,企业以历史期望和行业期望所形成的绩效期望差距可能对企业风险偏好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行业期望测量绩效期望顺差,来检验这一可能性。

责任编辑:董德英

Contentment with Wealth and Progress Driven by Wealth: the Curvilinear Impact of Positive Performance–Aspiration Gap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Wang Kewen Yu Y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mprovement, the impact of positive performance-aspiration gap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tested by using a fixed effect model, based on samples of Chinese firm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07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distinct roles of executive self-confidence, failure risk and redundant resourc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ositive performance-expectation gap, firms show a behavior pattern of both contentment with wealth and progress driven by wealth. This U-shaped curve indicates that corporate innovation decreases at low level of positive performance-expectation gap, and increases at high level of positive performance-expectation gap. And compared with younger enterprises,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is less pronounced for older firms due to the age-induced inertia. The results not only help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motivation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but also provide several key implications for firms as well as governments.

Key words: positive performance-aspiration gap; corporate innovation; firm age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崔明德[1]　王　硕[2]

1.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烟台 264005; 2.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

摘　要: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共伐魏虏”“柔远能迩”思想、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范云的“抚以恩德”思想、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是刘宋时期“修复旧境”思想的延续,又为萧梁时期“求通交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大多适应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现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 南齐; 民族关系思想; 通和; 特点

中图分类号: C95; K2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117-12

南朝诸政权中,南齐存在时间最短,灭亡速度最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动乱不安的政治局面,南齐的民族关系却较为平稳,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动荡,这与南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有着直接关系。本文拟对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实践活动及显著特点进行初步梳理与探讨。

一、齐高帝、齐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

齐高帝萧道成,东海郡兰陵县(今山东临沂市)人,为南齐开国皇帝。齐武帝萧赜为萧道成长子,南齐第二位皇帝。总体来看,齐高帝和齐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一脉相承,主要包括“共伐魏虏”[①]与“柔远能迩”[②]两大思想观点。

(一)“共伐魏虏”

早在南北朝初期,南朝就积极联合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北魏,并将这一策略当做处理与北朝关系的重要手段。如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卢水胡盖吴起兵十余万反于杏城[③],宋文帝派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18AMZ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明德,男,山东莱西人,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国文化史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硕,男,山东枣庄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① 《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3页。

②《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页;《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页。

③ 卢水胡盖吴起兵时间,《魏书·世祖纪》记载为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而《宋书·索虏传》记载为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此从《魏书》。

遣使者前往联络,并“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①]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时,也曾叱责刘宋“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②] 最迟在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即南齐建立前一年,萧道成也产生了联合柔然对付北魏的想法。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载:“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③]

萧道成的“共伐魏虏”思想,基本延续了历代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外交关系所采用的“远交近攻”策略,也是刘宋联合卢水胡、柔然、吐谷浑等势力夹击北魏战略的延伸,但这一思想的具体形成,则与南齐当时紧张的内外关系局势有着直接联系。

南齐初建时,政权并不稳固。在南齐内部,因萧道成是阴谋篡位夺取政权,来路不正,从而遭到多人反对。荆州刺史沈攸之、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等人密谋起兵时,朝廷“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④],可见当时心存宋室、反抗萧氏的势力十分强大。南齐的外部形势也很严峻。刘宋灭亡后,北魏趁机扶持宋文帝第九子刘昶,封其为丹阳王,许诺他“以克复旧业,世胙江南,称藩于魏”[⑤],同时派遣梁郡公元嘉、陇西公元琛、河东公薛虎子三路人马南侵,威胁南齐边境。所以,对刚刚建立政权的萧道成来说,与柔然合力夹击北魏既可以将南齐军民的注意力由政治斗争转移到外部战争,以消弭内患,也能为南齐赢得安稳发展的外部环境。

此外,自永嘉之乱后,北伐收复中原继而统一天下,是东晋、南朝政治家普遍的理想追求,如东晋丞相王导就曾想“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⑥],晋成帝时主政的庾亮也有“开复中原之谋”[⑦],谢安在淝水之战后“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⑧]。刘裕为了统一天下,更是多次北伐后秦、南燕等政权,其子刘义隆在位时也想“修复旧境”[⑨]。东晋以来渴望“一统”的政治思潮与历代追求“一统”的思维惯性自然会对萧道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在称帝时的诏书中就明确表示:“朕以寡昧,属值艰季,推肆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龛暴,一匡天下。”[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齐初年复杂的政治局面、紧张的民族关系形势以及“一统”的思想潮流,共同促进了萧道成“共伐魏虏”思想的形成。

已在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柔然对“共伐魏虏”的提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早在延兴三年(473年),柔然为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曾发兵“寇敦煌”[⑪],结果为北魏镇将乐洛生击退。在此关头,南齐遣使邀约夹击北魏,予成可汗立即出动三十万骑兵南下。因北魏防守得当,据守不战,予成可汗“于燕

①《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1页。
②《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46页。
③《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页。
④《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12页。
⑤《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高帝建元元年十一月癸丑”条,第4233页。
⑥《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7页。
⑦《晋书》卷73《庾亮传》,第1923页。
⑧《晋书》卷79《谢安传》,第2075页。
⑨《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31—2332页。
⑩《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2页。
⑪《魏书》卷7《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页。

然山下纵猎而归”[①]，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

萧道成也在南方集结力量积极备战，他一方面“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②]，另一方面派遣徐州刺史崔文仲进取淮北，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建元二年（480年），北魏“步骑号二十万”[③]主动出击，南齐上下乱作一团，百姓“皆惊散奔走”[④]，幸赖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将军周盘龙等人借助地势，采取水攻策略，魏军“人马溺死数千人，众皆退走。”[⑤]

此战过后，柔然对“共伐魏虏”依旧保持很大的热忱。建元二年（480年）、三年（481年），予成可汗“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⑥]，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更是致书萧道成，称“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⑦]柔然为了维持与南齐的合作关系以对付北魏，不仅以收复中原旧境相诱，甚至还打出了“光复中华”的旗号，而萧道成却一改之前积极北伐的态度，对柔然的邀约十分冷淡，没再继续出兵北魏。建元四年（482年），萧道成在临终前还特意嘱托辅政大臣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说：“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⑧]

可见，以攻打淮北失败为标志，萧道成思想发生了逆转，他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开始转换，由激进走向和缓，由战争转为和好。萧道成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会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在综合实力上，由于刘宋多次北伐失败以及北魏屡次南侵，南朝“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⑨]，战线也由黄河拉至淮水，北强南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南齐初建时，军国政务百废待兴，力量十分弱小，当时“连年虏动，军国虚乏”[⑩]，出征淮北的“诸戍士卒多褴缕”[⑪]，后勤保障严重不足，基本不具备发动进攻战争的能力。

其二，萧道成与北魏交锋所产生的恐惧心理。萧道成早年常与北魏正面交战，大都失利，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魏大战时，萧道成率军支援宁朔将军臧质，结果“为虏所攻围，甚危急”[⑫]；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萧道成击败武兴戎与兰皋戎后趁势攻入关中，但随即被北魏军驱赶，萧道成“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⑬]这些战争经历使萧道成对北魏实力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建

①《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页。
②《南齐书》卷23《褚渊传》，第429页。
③《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高帝建元二年二月丁卯”条，第4236页。
④《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481页。
⑤《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第462页。
⑥《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页。
⑦《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4—1025页。
⑧《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页。
⑨《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59页。
⑩ 朱铭盤撰：《南朝齐会要·食货·垦田屯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1页。
⑪《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9页。
⑫《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4页。
⑬《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4页。

元年间的这次惨痛教训又加深了他对北魏的忌惮。而且,作为一个“沈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①]的政治家,萧道成有着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显然不会意气用事,非要与北魏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第三,萧道成虽有“一匡天下”的想法,但他更想“身率天下,移变风俗”[②],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他曾多次表示,“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③]。所以,相较于其他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放弃收复中原对萧道成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心理负担或心理落差。

(二)“柔远能迩”

“柔远能迩”在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尚书·舜典》就提到“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诗经·民劳》也说:“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汉书》认为,“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幕朔,莫不来庭。”[④]“柔远”即怀柔远方,“能迩”主要是指安抚邻国与之和睦相处。可见,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以柔和的方式,怀柔远方,优抚近地,从而使民族关系达到一种比较安定的状态。

虽然齐高帝没有机会亲自将“柔远能迩”的思想落实到实践中,但他临终前的这个遗愿却为后世所继承,齐武帝在永明七年(489年)就重申:“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迩,兆民所以允殖。”[⑤]因此,“柔远能迩”是齐武帝和齐高帝共同的思想成果。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柔远能迩”呢?其实,萧道成在遗诏中已做出了解释,那就是“缉和内外”,即与“内”、“外”都和平共处。所谓“外”主要指北魏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内”则指南齐境内诸“蛮”、“僚”、“傜”等族。

对于如何处理与北魏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齐高帝已定下了“和”的基调,齐武帝基本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

首先,稳固边防,改善民生,不给北魏以可乘之机。国家要想获得长久的和平,前提是自身有足够的力量,尤其要在边防上下足功夫,让敌人无法从外部攻破。萧道成就深知这一点,当北魏退兵时,他就指出,“虏经破散后,当无复犯关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⑥]齐武帝在位期间更是以“富国为先”[⑦],多次减免百姓赋税,并着重恢复淮北各地经济,如永明六年(488年)他就下诏称:“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边接疆场,民多悬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调。”次年,他又补充说:“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⑧]经过数年努力,到永明末年,南齐“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⑨],一扫立国初年的颓

①《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页。
②《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9页。
③《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9页。
④《汉书》卷100《序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8页。
⑤《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页。
⑥《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页。
⑦《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2页。
⑧《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页。
⑨《南齐书》卷53《良政·序》,第913页。

势，经济获得极大发展，边防力量得以巩固，为实现和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册封周边诸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睦邻友好。南齐周边除了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之外，西北还与氐族建立的武兴国以及宕昌羌、邓至羌接壤，这些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地势险要之处，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在南北之间摇摆不定，“提挈于魏，时通江左”①，成为南北朝争相拉拢的对象。齐武帝比较重视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搞好关系，即位当年（483年）二月，他就接连“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辛丑，以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② 永明四年（486年），又“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永明六年（488年）又封“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③。宕昌王梁弥承受封后，还遣使向南齐求取“军仪及伎杂书”④，齐武帝向其赠送了《五经集注》《论语》各一部。一系列册封以及后续的交往交流活动密切了南齐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筑牢了与邻国和睦的根基。

最后，积极通使，巩固与发展和平局面。建元二年（480年），齐魏战争告一段落后，北魏荆州刺史李崇主动将南齐俘虏放归，南齐“亦还其生口二百许人”，于是“二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⑤，由此拉开了双方和平交往的序幕。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双方都积极派遣使者。齐武帝先后派遣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司徒参军萧琛、范云以及“有将命之才”⑥的裴昭明等人出使北魏，北魏也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房景高、宋弁等人赴南齐。清人赵翼就指出，当时“南北通好，尝藉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⑦ 李彪第一次出使南齐，齐武帝就“为之置燕设乐”，李彪后来多次出使，南齐都“甚重之”。李彪返回北魏时，齐武帝“亲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赋诗以宠之。”⑧ 可见，齐武帝对北魏使者相当重视，将此视为与北魏结好的重要渠道。

南齐境内诸“蛮”“僚”各族居住地分散，大小强弱不一，对待南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⑨ 再如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⑩。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接受南齐册封，也有的“与虏通”或者是直接起兵“寇掠郡县”⑪。要想让数量众多、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都表示服从，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齐武帝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存名以训殊俗”⑫，即按照少数民族的聚居范围划分“左郡左县”，任命当地酋豪为官，在不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基础上，让他们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如永明六年（488年），齐武帝就一次性以田驷路、田驴王、田何代分别为北遂安左郡、宜人左郡、新平左郡太守，他

①《南史》卷79《夷貊传下》，第1977页。
②《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47页。
③《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1、54页。
④《南齐书》卷59《宕昌羌传》，第1033页。
⑤《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高帝建元四年九月丁巳”条，第4250页。
⑥《南齐书》卷53《良政·裴昭明传》，第919页。
⑦ 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卷14《魏齐周隋书并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4页。
⑧《资治通鉴》卷137《齐纪三》，“武帝永明九年三月甲戌”条，第4309页。
⑨《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7页。
⑩《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2页。
⑪《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8页。
⑫《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7页。

们三人“皆郢州蛮也”[①]。另外,有些少数民族会因为语言、服饰或生活习俗与汉族不同而受到地方官员的歧视,如傒族人胡谐之就被当时梁州刺史范柏年嘲笑为“傒狗”[②],但齐武帝对他很宽容,不仅没有嘲讽胡谐之及其家人,相反倒派宫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即使宫人“顿成傒语”,齐武帝也并不介意,只是一笑了之,并依旧对他非常信赖和重用,最后使其官至“度支尚书,领卫尉”[③],成为朝廷重臣。可见,齐武帝对少数民族成员没有太多成见,比较注重吸纳他们进入国家政治管理体系当中。

总体来看,齐高帝、齐武帝“柔远能迩”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践成效也非常显著。自建元三年(481年)到永明十年(492年)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南齐与北魏基本没有爆发正面冲突,双方交流来往不断,一度出现了“北怀戎款,南献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宁和”[④]的良好局面。此外,在“柔远能迩”思想的指引下,南齐许多官员都自觉将“恩”“德”等理念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当中,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如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认为,对少数民族应该“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⑤]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长史、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王奂上任时,希望能“使边民乐业,有司修务,本府旧州,日就殷阜”[⑥]。豫章王萧嶷治理荆州时,考虑当地“邻接蛮、蜑”,他下令属官“皆缓服”[⑦],即穿上宽袍大袖的官服而不穿戎装,拉近与少数民族的距离,使少数民族消除戒备之心。刘悛担任武陵内史期间“善于流俗”,率领当地各族百姓兴修水利工程,年过百岁的蛮王田僮亲自前来拜见,在他离任时,出现了“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⑧]的感人场面。

不过,当南齐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起兵反抗的时候,齐武帝也会毫不留情地出兵镇压。如永明四年(486年),湘州蛮起兵,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齐武帝立即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代其为湘州刺史,出兵“讨平之”[⑨]。次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是东晋桓玄后裔,“与雍、司二州蛮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⑩],齐武帝命令新吴侯萧景先“宜时剿荡”[⑪]。在讨平“蛮僚”过程中,一些官员也会滥用武力,恣意妄为,如益州刺史陈显达因“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他派人去征收赋税,僚帅又抗命不从。陈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⑫]以武力镇压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山夷震服”[⑬]的效果,但一些残忍的屠杀性做法,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无法弥合的裂痕,长远来看并不可取。

---

①《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9页。

② 参见《南史》卷47《胡谐之传》,第1177页;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③《南史》卷47《胡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6—1177页。

④《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3页。

⑤《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第526页。

⑥《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8页。

⑦《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408页。

⑧《南齐书》卷37《刘悛传》,第650页。

⑨《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二》,“武帝永明四年四月丁亥”条,第4272页。

⑩《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二》,“武帝永明五年正月”条,第4274页。

⑪《南齐书》卷38《萧景先传》,第662页。

⑫《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页。

⑬《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页。

二、南齐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

南齐时期的一些大臣在思考民族关系形势以及处理具体民族关系事务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颇具时代特色的思想观点。其中，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以及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丰富了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内涵。

（一）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

自永明末到南齐灭亡的十年时间里，南齐与北魏多次大打出手，双方互有征伐，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常态。永明十一年（493年），南齐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增，齐武帝“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北魏孝文帝得知消息后，也“大会公卿于经武殿，以议南伐”①，南北关系开始紧张。建武元年（494年），齐明帝萧鸾废掉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引发政局动荡，孝文帝以此为契机，先派遣征南将军薛真度、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徐州刺史拓跋衍、平南将军刘藻五路大军南下，次年又率军亲征，双方在钟离、寿阳、义阳等地展开拉锯战。建武四年（497年），孝文帝再次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兵马进攻南齐。永元元年（499年），孝文帝病重，南齐趁机反击，齐东昏侯萧宝卷派遣“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欲复雍州诸郡”②。孝文帝强撑病体，率军击退陈显达等人。永元二年（500年），北魏大将军李丑、杨大眼攻下寿阳，南齐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等人反攻失利，以至“淮南遂入于魏”③。

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双方的和战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北魏为了消灭南齐，摆出了很大阵势，孝文帝不但集结了数十万军队，更是多次御驾亲征，但战争始终维持在淮河一线，没有继续扩大的势头。这一局面的出现，既与北魏方面“鼎迁草创，庶事甫尔”④以及高车各部“相率北叛”⑤有关，也与南齐方面宗室残杀、政局不稳有关。此外，南齐的一些大臣，如孔稚珪、崔庆远、张欣泰等人在战争期间积极与北魏“通和”，他们的思想动向和做法也影响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走向。

会稽山阴人孔稚珪，在齐高帝时因文采出众担任记室参军一职，之后一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尚书左丞、廷尉、御史中丞等官职。齐明帝建武初年，时任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的孔稚珪痛感于“虏连岁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伤”⑥，上表请求与北魏通和。

孔稚珪认为，自古以来对付少数民族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庭”⑦。孔稚珪更倾向于后者，希望齐明帝能够派遣使者与北魏讲和。他认真总结了“通和”的四条理由：一是鲜卑人的习性。他认为，鲜卑人是“戎狄兽性，本非人伦”，而且“蚁聚蚕攒，穷诛不

①《资治通鉴》卷138《齐纪四》，“明帝永明十一年正月”条，第4326页。
②《资治通鉴》卷142《齐纪八》，“东昏侯永元元年正月戊寅”条，第4433页。
③《资治通鉴》卷143《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八月乙酉”条，第4470页。
④《魏书》卷40《陆俟传附陆睿传》，第912页。
⑤《北史》卷98《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73页。
⑥《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页。
⑦《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页。

尽,马足毛群,难与竞逐",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发雷电之怒,争虫鸟之气。"[①] 二是历代经验教训。在他看来,汉宣帝爱惜民命,采取"抚纳安静"的政策,民族关系非常稳定,汉武帝"连兵积岁","大事匈奴",结果导致"国储空悬,户口减半"[②]。宋文帝元嘉初年,南北双方本来相安无事,只因刘义隆"复挑强敌",结果导致"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到了南齐建元初年,北魏又来侵扰,齐武帝选择"复结通和",这才有"十余年间,边候且息"[③]的局面。三是遣使通和是以小博大的良策。孔稚珪认为,如果使者能发挥作用,当然是"为不世之福",退一步说,即便北魏"不从命",也只不过"如战失一队耳"[④]。当然,孔稚珪也没有天真到认为在战争状态下,单凭一队使者就能圆满解决所有问题,他的建议是先派遣大军,广张声势,"据险要以夺其魂,断粮道以折其胆,多设疑兵,使精悉而计乱,固列金汤,使神茹而虑屈",然后再"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吉凶"[⑤]。在他看来,"北虏顽而爱奇,贪而好货,畏我之威,喜我之赂,畏威喜赂,愿和必矣。"[⑥]最后,孔稚珪非常激动地表示,如果齐明帝能够采纳他的计策,那么"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⑦]

建武二年(495年)二月,孝文帝率军攻至寿阳,驻守城池的丰城公萧遥昌派遣参军崔庆远、朱选之出使,主动与北魏讲和。崔庆远劝诫孝文帝元宏"和亲则二国交欢,苍生再赖;不和则二国交怨,苍生涂炭",希望双方能够"宪章圣人,不失旧好。"[⑧]同年三月,北魏主力为萧坦之击败,部分军队留在邵阳洲筑城据守,豫州刺史崔慧景"虑为大患",准备强行进攻将其消灭。领军长史、谘议参军张欣泰则认为,"虏所以筑城者,外示姷大,实惧我蹑其后耳",建议"说之以彼此各愿罢兵"[⑨]。之后,张欣泰亲至北魏军营讲和。魏军请求"输马五百匹,假道以归"[⑩],崔慧景"欲断路攻之",张欣泰再次劝说"归师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轻也。胜之既不足为武,败则徒丧前功。不如许之。"崔慧景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听虏过。"[⑪]

综上可见,在南齐后期,朝廷内外出现了一大批积极主张与北魏"通和"的官员,他们或在中央劝告皇帝不要轻易出兵,或在战争中多方寻找机会与北魏沟通,希望不要将冲突扩大。虽然单凭这些人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阴霾,但他们的举动在促进双方走向和平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崔庆远出使北魏后,孝文帝元宏笑称"朕来为复游行盐境,北去洛都,率尔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坞,卿勿以为虑。"[⑫]

---

①《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页。
②《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页。
③《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页。
④《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页。
⑤《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页。
⑥《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页。
⑦《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页。
⑧《南齐书》卷45《宗室·始安王萧道生传附萧遥昌传》,第793页。
⑨《南齐书》卷51《张欣泰传》,第883页。
⑩《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三月"条,第4380页。
⑪《南齐书》卷51《张欣泰传》,第883页。
⑫《南齐书》卷45《宗室·始安王萧道生传附萧遥昌传》,第793页。

（二）王融“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

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出身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六世孙。其祖父王僧达，官至南朝宋中书令，其父王道琰，官至庐陵内史。王融是高门大族后裔，“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①，与萧衍、沈约、谢朓等人号称“竟陵八友”，在政坛和文坛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王融一生多数时间是在中央做官，先后担任秘书丞、中书郎、主客郎等官职，主要任务是接待北魏使者，负责各项招待事宜。这一工作经历，让王融有更多机会直观深入地了解北魏政局的动态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也能直接参与到涉及双方核心利益问题的讨论，这为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融担任主客郎期间，正值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北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孝文帝改革的诸多措施中，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方面的变革处于核心地位，但推行起来却十分不易，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顶层设计中缺乏标准的典章制度作为参照，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②因此，孝文帝不但秘密派遣蒋少游到南齐“观京师宫殿楷式”③，而且多次遣使向南齐“求书”，希望以此作为其汉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及参考。南齐多数大臣不愿让鲜卑人掌握正宗的文化典籍，更怕北魏汉化改革成功，所以他们主张“不与”④。王融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认为应“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⑤

王融上书指出，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中原地区的广大百姓“婚葬之晨，犹巾裸为礼”，仍然保持汉族的文化传统，北魏一开始“禁令苛刻，动加诛轘”，但这种做法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民族关系十分紧张。也正因如此，孝文帝才“曲从物情”选择变革，但北方存留的典章古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⑥，北魏没有办法，只能“稽颡郊门，问礼求乐。”⑦可见，王融对北魏的社会矛盾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动机都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种理智的认识，王融大胆预测北魏的汉化改革必定会失败，而赠送文化典籍正是推动其走向失败的关键一步。

王融的整体思路是，由于孝文帝元宏“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倚重汉族官僚，北魏内部的汉族大臣或汉化官员已经牢牢掌握政权，“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如果南齐答应赠书，让“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这些人“必欲遵尚”，进而将汉化改革推行更深一层。如此一来，势必会遭到鲜卑旧部的疯狂反扑，到时“风土之思深，愎

①《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7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
③《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0页。
④《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8页。
⑤《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页。
⑥《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8页。
⑦《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页。

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①

王融的这一招可谓毒辣,体现了他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应当说,王融对北魏汉化改革结果的预料颇有先见之明,因为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动机是好的,但由于其制度设计不太科学,而且又想急于求成,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鲜卑族的族情,在多数鲜卑贵族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汉化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性手段大力推行,很难收到理想效果。即使取得一定的效果,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②正因如此,王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齐武帝特地下诏说“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③

(三)范云“抚以恩德”思想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其父范抗,曾任郢府参军。范云八岁时与刘宋豫州刺史殷琰相遇,席间“风姿应对,傍若无人”,赋诗“操笔便就”④,在座者无不惊叹。范云起家任郢州西曹书佐,转任法曹行参军。齐高帝时,范云因能诵读碑文,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后得到齐高帝的信任,升迁为尚书殿中郎,并被授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等职。长期以来,范云为官四平八稳,既无为人特别称道之处,也没有令人诟病之过失。范云出任零陵内史和始兴内史,迎来了其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后步步高升,出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任零陵内史时,范云“在任洁己,省烦苛,去游费,百姓安之。”⑤

范云出任始兴内史时其“抚以恩德”思想及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起初始兴郡内抓获外来的奴婢,皆交由作坊将其卖出,所得银两归于官府。范云一到,“乃先听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⑥同时,他将郡相承后堂的劳工全部遣送回家,使民众脱离差役。除此之外,郡中还有诸多豪滑大族,一旦郡守不能善待他们,他们或将其杀死,或将其赶走。边郡更是蛮俚聚居之地,盗贼猖盛,以往诸任内史都是身佩兵刃以自卫,唯有范云“抚以恩德,罢亭候”,使得“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⑦范云的这些举措,不仅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于永元元年(499年)六月升迁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⑧,而且也得到了“百姓悦之”⑨的充分认可和普遍赞誉。

(四)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

顾欢的这一理论观点虽然并非就民族关系而阐发,但也能体现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顾欢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曾师从豫章雷次宗学习儒学、玄学,后在天台山聚徒讲学,名气很大,被萧道成征为扬州主簿,但很快隐居山林,晚年“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⑩顾欢对宗教文化很有研究,他所提出的“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⑪等观点,

①《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页。
②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4—265页。
③《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20页。
④《梁书》卷13《范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29页。
⑤《梁书》卷13《范云传》,第230页。
⑥《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8页。
⑦《梁书》卷13《范云传》,第230页。
⑧《南齐书》卷7《东昏侯纪》,第57页;《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8页。
⑨《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7页。
⑩《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0页。
⑪《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页。

引起了佛道两家空前的大辩论，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外，顾欢在其所著《夷夏论》一文中，通过对佛道思想的探讨，间接阐述了他对“胡俗”与“汉法”的一些看法。

顾欢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坚决反对“以夷变夏”。在他看来，佛法教人向善的道理本是可贵的，但佛教是“西戎之法”，一些宗教礼仪是源自胡人的文化习俗，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天壤之别，“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①] 顾欢坚定的认为，华夏传统礼仪是“继善之教”，而胡人那些习俗是“毁恶之学。”[②] 在此认识基础上，顾欢坚决反对“以夷变夏”，认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③] 在顾欢眼里，丢弃华夏传统文化，学习胡人的习俗，是“不义”的事情，是不符合华夏传统伦理规范的行为。顾欢对“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的行为十分看不惯，极力主张“国有旧风，法不可变。”[④]

此外，顾欢“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说，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民族”一词的最早记载[⑤]，其以礼仪和文化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多民族交往速度加快、各族文化交流程度加深的历史状况。

三、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

通过以上初步梳理，可以看出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尽管南齐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看待民族关系的角度不尽一致，民族关系思想的侧重点也各有区别，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大都与儒家学说息息相关。如齐高帝、齐武帝的“柔远能迩”思想就直接出自《尚书》和《诗经》。王融是世家子弟，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其“修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的目的虽是为了削弱北魏，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儒家学说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⑥] 的观念。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则完全继承了《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也与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⑦] 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见，他们的思想观点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以儒家思想道德观念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行动指南。

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往往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有助于协调人际关系、外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如晋文公“退避三舍”不与楚国相争，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西汉初期的几代统治者也是多次对匈奴做出妥协。南齐时期，在综合国力明显不敌北魏的情况下，妥协让步依旧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萧道成从“共伐魏虏”变成“柔远能迩”，

①《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页。
②《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页。
③《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2页。
④《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4页。
⑤ 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辩》，《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杨伯峻译注：《论语·季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0页。
⑦ 左丘明著，杜预注：《左传·定公十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64页。

既是一种与北魏妥协的策略,也是一种自我妥协的体现,目的是换取恢复国力的时间。再如永泰元年(498年),齐明帝命陈显达收复沔北五郡,在出征时他就强调说,“兴师扰众,非政所先,用戢远图,权缓北略,冀戎夷知义,怀我好音”,只因北魏“专事侵掠”①,他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出兵讨伐。可见,妥协让步的思维贯穿南齐始终,这种思维和做法既能有效避免争执,也能提前给冲突双方留下转折的余地。

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君臣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基本达成了以和为贵的共识,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民族关系思想氛围。齐武帝晚年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就曾说“朕思念旧民,永言攸济,故选将开边,劳来安集,加以纳款通和,布德修礼。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② 再如崔庆远等人在战争时期也想与北魏孝文帝“和亲”。可见,期望和睦、谋求和好、推动和平,是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在这种思想潮流的推动下,南齐不但有效协调了境内的民族关系,而且与北魏的矛盾也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化解,更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如南梁武帝北伐失败后,也是及时调整思想路线,主动与东魏“求通交好”,从而形成了“十余年间,南境宁息”③ 的和平局面。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Though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Southern Qi

Cui Mingde[1] Wang Shuo[2]

1.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2. Nor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Southern Qi serves a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thought and the following thought in history. There wer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t that time: Emperor Gao and Emperor Wu of Southern Qi advocated sending troops to suppress Northern Wei and pacifying faraway ethnic groups; Kong Zhigui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maintaining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them; Wang Rong proposed treating them with propriety and offering them classics; Fan Yun supported the idea of placating them with kindness; and Gu Huan held the theory of giving up things of Huaxia and adopting those of other ethnic groups. All those thoughts are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hought of "restoring the old territory" in the Liu-Song Dynasty,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of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good relations" in the Southern Liang period. The thoughts of ethnic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Confucianism as the guidance; compromise as the principl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s the basic goal. Most of the thoughts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rn Qi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ethnic relations at that time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actice.

Key words: Southern Qi; thought of ethnic relations; friendly exchanges; characteristic

①《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91页。

② 严可均辑:《全齐文》卷12《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

③《魏书》卷98《岛夷萧衍传》,第2179页。

介词认知语义模型及语法化机制

崔 云 忠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介词只具有语法意义,不具备词汇意义,其语义性质需要根据介词结构中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介词的语义以网络状、层次性分布。每一个网络节点可看作一个概念。介词语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织,构成一个有层次的网络系统。每一级语义均处于相应的节点上,各节点又以其共性特征与上一级语义相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系统,即介词语义层次网络。介词的每一语义特征都会出现在网络层次模型中的固定位置。根据网络节点激活情况,语义漂白、语义泛化是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主要机制。语法化项的源义是判断介词语义的重要参照项。从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可以观察介词语义的层次分布。

关键词: 介词; 语义模型; 语法化机制; 语义层次

中图分类号: H13;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129-13

语义是介词研究的基础。Hagège给英语中的介词区分了51种语义,Haspalmath也对介词语义之间的关联从语法化的角度给出了一定的结论。[①] 国内早对汉语介词的语义有所关注,《助字辨略》《语助词》等都从语义的角度解释介词。香坂顺一、太田辰夫、吴福祥、冯春田、何洪峰、陈昌来等也都直接、间接地进行了介词语义的归纳。[②] 在讨论动词和介词的区分时,马贝加提出义素分析法,通过介词所在结构中名词的语义考察介词的功能演化;何洪峰从介词结构中各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及介词本身的语义弱化角度判定介词的性质。[③] 但是对介词语义之间的衍生关系,学界尚未有系统性的成果;对于介词语义和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学界也鲜有论说;对于介词语义发展与介词语法化的机制也值得进一步考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研究"(18FYY028)、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日本山口县立大学图书馆等14馆藏汉籍编目与复制"(20BHBJ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云忠,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① Haspelmath Martin,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Tomasello M.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3, pp. 211-243.

② 参见香坂顺一:《白话词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太田辰夫:《中国语的历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福祥:《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何洪峰:《"去"字可作时间介词辨》,《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1期;何洪峰:《动词"去"向处所介词语法化的终止与回归》,《语言研究》2011年第4期;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何洪峰:《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语文研究》2014年第1期。

一、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介词只具有语法意义,不具备词汇意义,其语义性质需要根据介词结构中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介词的语义以网络状、层次性分布。每一个网络节点可看作一个概念。介词语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织,构成一个有层次的网络系统。每一级语义均处于相应的节点上,各节点又以其共性特征与上一级语义相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系统,即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介词的每一语义特征都会出现在网络层次模型中的固定位置。介词语义按照其顶位节点的特征可概括为空间域、时间域、对象域和概念说明域四类,其中"概念说明"域包括"行为"类和"说明"类。

(一)"空间"域介词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空间域介词涉及处所和方向。空间域介词的介引成分(NP)是可容纳的、有边界的、可附着的处所义名词,如"山河路桥建筑类名词""地名方位类名词""器具类名词""身体部位类名词"等。核心动词(V)是有运行方向或执行方向特点的动词,如"执行义动词(戏、玩,窥,制等)""遭遇义动词(生,逢,现、没等)""持拿义动词(拿、取、采、持)等""放置义动词(站、坐、着、置等)""言谈义动词(谋、说、应、答等)"。以上动作的实现,"处所"是必要条件,即只有在一定的处所中才能实现。介词表达空间语义概念可以表示处所和方向,其中处所有起点、经由和终点;经由又可以离析出"表面"和"沿顺"特征。表示"表面"经过时,V必须在N所表示的处所上运行,如:

(1)a 经庭前桃树边过。(《齐民要术》卷十,第1028页)

b 恶不复由耳目鼻口入。(《六度集经》卷七,第39页)

上例中,N"庭前桃树边""耳目鼻口"是V"过""入"实现所必须经过的处所,带有[+附着]特征。表[+沿顺]时,N不必然是V所经过的处所,但是N是重要的参照物。如:

(2)a 从彼河岸,顺流下行。(《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第822页)

b 遂被狂寇顺风放火,红解连天。(《敦煌变文集》卷八《苏武李陵执别词》,第908页)

例(2)中,N(彼河岸、流、风)不必然是V(行、放火)经过的处所,而是[+沿顺]N所延伸的方向,"河岸、流""风"是"行""放火"实现的参照物。空间域介词结构中,NP为具有"可容纳""有界点"类的处所名词,且VP为运行类动词时,介词表处所义。界点在前表示起始,界点在后表示终点或方向。若V主体或受体附着于N,表终点,否则表方向。处所类介词按照上下级的关系组成网络模型,每个概念和特征处于节点中的固定位置,介词的语义也要根据该节点的特征进行判断(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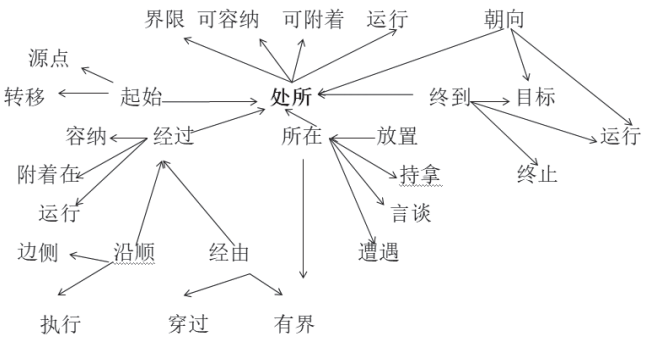


图1 "处所"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图 1 中，每一个子节点通过一定的共性指向母节点，如“经过”。“$P \cdot N_{容纳} \cdot V_{运行/附着在}$”结构中，“经过”必须运行于某一处所，且该处所必须具备“容纳”特点，故“经过”义是“处所”义的下层语义，处于“处所”义语义模型的第二层，当运行主体附着于经过处所时，表示“经由”处所，由“运行”“表面”共性指向“经过”子节点；当运行主体和“处所”互为“参照”时，介词表示“沿顺”处所，通过“边缘”和“表面”特点区别于“经由”，通过“延伸”特征指向“经过”处所，故“沿顺”“经由”处于处所类介词的第三子节点。

（二）“时间”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时间类介词结构中，N 为具有“持续”“容纳”“变化”特征的名词性成分，为允许某一事物或动作存在或发生的一维时间。V 为具有“变化”和“作用”特征的动词性成分，在某一时间内动作具备变化性或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时间类介词有从、自、起、到等。该类介词结构中，N 有 3 类：“具体时间名词”“表时间的动词或短语”“表示天色、时节的成分”。V 有 5 类：“遭遇义动词”“执行义动词”“运行义动词”“言谈义动词”“转移义动词”。“时间”介词结构中，N 为表“时间点”名词，V 有非运行特征。如：

（3）a 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搜神记》卷二，第 25 页）

b 在今宁得息谈邪？（《南齐书》卷五十四，第 927 页）

当 N 为表示时间段的名词时，V 有两种情况，一种为状态动词，一种为动作动词。当 V 表示状态，且具备“持续性”特点时，介词结构表示时间起始。如：

（4）从四月一日又阴雨，昼或见日，夜乍见月。（《南齐书》卷十九，第 370 页）

当 V 表示动作，介词语义有两种情况，一是 V 具有“运行”特征，表示所在时间；一是不具备“运行”特征，介词结构表示时间起始或者时间所到。如：

（5）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齐民要术》卷二，第 148 页）

根据时间类介词结构中 V 和 N 的性质，“时间”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可概括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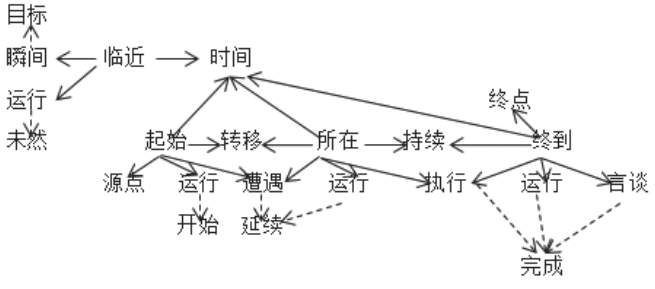


图 2 “时间”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三）“对象”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对象类介词的语义特征为：某一对象和另一对象之间具有互相作用的关系。这种作用关系包括主观作用（受事对象、比较对象、师从对象、伴随对象、言谈对象）和客观作用（施事对象）。介词结构中，N 有“客观”“受动”特征，如“表人名词”等；V 有“同现性”“交互性”“作用性”特征，如“遭遇义动词”“执行义动词”“言谈 / 情貌义动词”“放置义动词”“运行义动词”“性质形容词”。对象类介词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可建构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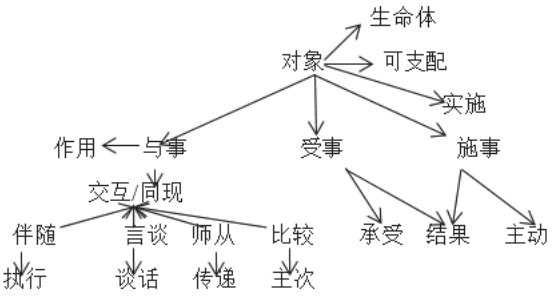


图 3 “对象”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四)“概念说明”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1.“依据”类

“依据”类介词,表示动作发生所依据的条件、工具、手段和方式等[①],其成员有:“取、持、以、用、乘、逮、因、缘、寻、随、依、据、论、于(於)、仗(杖)、由、凭”等。该类介词结构中的 N 表示工具、时间、标准、条件,如“实物类名词”“时间类名词”“条件能力类名词”“性质形容词”等。“依凭”类介词结构中,名词具有“可利用”“客观”“优势”的特征,VP 有“影响”“结果”和“行动”特征,如“转移义动词”“执行义动词”“放置义动词”“持拿义动词”等。“行为”类介词结构中,当 NP 具有时间延续特征,VP 具有“运行”“执行”“影响”特征。若 NP 为表示时间点的名词(短语),意为“某一时间点是做某一事件的最佳时机”;当 NP 为表示时间段的名词(短语)时,意为“在某一状态没有出现或完成之前做某事”;NP 为表示工具的名词时,VP 为行为动词,且具有“结果”“影响”特征,意为“NP 是实施某一动作 VP 的工具”。如:

(6)a 用热食。若不即食,重蒸取气出。(《齐民要术》卷九,第 958 页)

b(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余级。(《三国志》卷三十,第 833 页)

(7)用蚕沙与土相和,令中半。(《齐民要术》卷二,第 200 页)

“行为”类介词结构的语义特征为“N 是某人或某物施行某一动作的凭借或方式”,其语义网络层次模型可以概括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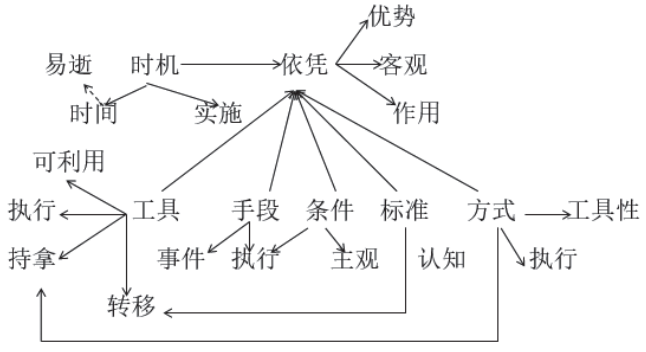


图 4 “依凭”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2.“说明”类

“说明”域介词包括动作施行的原因、目的和范围(详见图 5)。介词结构中,N 多具有主观性、范

① 何洪峰:《汉语方式状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6 页。

围、致使性特征；V 具有“致使”“结果”特征，如“执行义动词”“遭遇义动词”“运行义动词”“言谈义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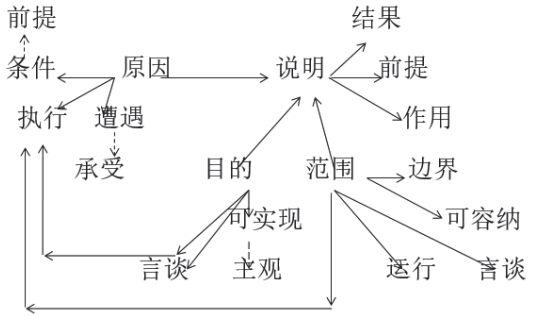


图 5“说明”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二、介词语法化的机制

Heine 和 Kuteva 定义语法化机制为（发生语法化的词汇的）源义对语法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不是语法化得以实现的手段。他们还分析了语法化的 4 个相关机制：1. 去语义化或曰语义漂白（desemanticlization or semantic bleaching）；2. 扩展或曰语境泛化或在新语境中的适用（extension, context generalization or use in new contexts）；3. 去范畴化或曰词汇形式或具有较少语法性质的成分的句法形态特征消失（Decategorization or loss in morphosyntactic properties of lexical or other less grammaticalized forms.）；4. 销蚀，也指某个音节中语音实体的丢失或弱化（Erosion, phonetic reduction or loss in phonetic substance）。[①] 汉语介词的语法化是语义漂白和结构扩展互相作用的结果。结构扩展是语法化产生的前提条件，语义漂白是语法化产生的决定因素。一个实词成分只有出现在特定的语境（结构）中，词汇项才有可能产生语义漂白，只有产生语义漂白才能失去概念义，语法化为功能词。

（一）语义漂白

“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 是指丧失实词意义。动词虚化为介词就是丧失了动词义，虚化为介引功能义。这是汉语动词介词化的语义机制。[②] 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一个词汇形式只有当他们被用作一个具有话题功能的成分时才能够变为语法形式。[③] 每一个动词都是一个事件结构（event constitute），在该结构中某些动词需要一些特定的成员来进行搭配。每个动词除了概念义外，都隐含一些背景信息，如时间、地点、运动、范围、生命、特点、方式等。如运行义动词“行”“走”“沿”“往”。行，本义“道路”，引申为“行走”。其概念意义可以描述为 [人][运行]，其背景信息为 [运行 [道路]]。如：

（8）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诗经·国风·唐风》，第 85 页）

① 他们定义语法化为：从词汇形式到语法形式和从语法形式到更多语法形式的发展过程。详可参阅 Heine B., Kuteva T.,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

② 参见何洪峰：《汉语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语文研究》2014 年第 1 期 .

③ Haspelmath M.,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irreversible?" *Linguistics*, 1999, 37(6), pp.1062.

在其概念结构中,有施事(人)、动作(运行)及其处所(道路)。这三者是"行"的语义结构中必备要素。由于运动事件的完整性,"行"一般不能发展为降级结构。走,本义"疾驰""奔跑"引申为"前往",即"人在某处所运行",其背景信息有"处所、方向"。如:

(9)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韩非子·五蠹》,第1040页)

(10)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第384页)

当"疾走、奔跑"讲时,"走"自带背景信息,非必需,若凸显背景需增加额外信息;当"前往、趋向"讲时,若凸显其背景必须出现,故容易降级,如"走水路>走水路去梁州>走银行转账>走账上划过去"。又如"沿":

(11)王沿夏,将欲入鄢。(《左传·昭公十三年》,第1347页)

"沿"的事件结构缺乏明确的动词性质,只有抽象的"方式"意义,语义表达的完整性原则要求"沿"需要寻找"施事""处所"论元,因为缺乏明确指示动作的特征,所以"施事·沿·处所"结构还需要另外明确表示动作的概念。因此,"沿"出现的结构中都会出现其他动词,"沿·处所"容易发生语义降级。如例(11)中"沿夏"只能看作"入鄢"的方式。"沿"概念结构中,"江河""道路"等元素由其处所论元充当,"沿"语义漂白,剩下"运行""方式"特征。同时,"沿·处所"结构需要另外的动词V_2,若V_2的语义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和"沿"的核心概念中有部分重合,则"沿"进一步漂白。如:

(12)里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门,入去沿溪到那石上。(《朱子语类》卷一八三,第3295页)

上例中,"沿"与"到"同现,"到"的语义框架为"人/物运行到达某处所",是一个完整的事件结构。"沿"的"江河""道路"概念特征由其处所论元承担,"运行"特征由另一事件动词承担。"沿"失去所有表示概念的特征,宜分析为介词。

由"行""走""沿"的发展过程可见,"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第一步,其中语义中概念和背景的结合程度是决定语义能否漂白的重要因素。

(二)语境泛化

语法化语境泛化的第一步是结构扩展,即由动宾结构扩展为连动结构。其次是激活其他语境,即再语境化(retextulization)。再语境化后,具有新功能的元素在新语境中被接受,并规约化。如俄语的指示名词(predicative noun)发展为工具格(instrument)助词。①

介词语法化句法环境有两类:1. $N+V_1 \pm N_1+V_2 \pm N_2$:$V_1$或$V_2$→前置介词(preposition);2. $N \pm N_1+V_1 \pm N_2+V_2$:$V_1$或$V_2$→后置介词(postposition)。② 汉语动源介词一般认为源于连动结构的前动词V_1。"V·N"结构是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③,可扩展成"V_1·NP·VP_2"连动结构。"V·N"只有简单的动词与论元的关系,扩展成连动结构后,彼此的句法语义关系就复杂得多,成为汉语动词介词

① Johanna, "Grammaticalization as retextual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1991, pp.129-131.

② Hagège Claude, *Le Problem linguisitique des preposition et la solution chionoise*, Paris: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irs & Lounvain: peters,1975, pp.121.

③ Bisang W., "Grammticalization without coeverlu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The case of tense-aspect-modality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In Bisang W.Himmelman,and wiemer B. eds", *What Makes Gramm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amponents*, Berlin: Mounton de Gruyter , 2009, pp.109-138.

化的句法结构基础。

以“行顺”义介词为例。“行顺”义介词来源于“行顺”义动词($V_{行}$)。$V_{行}$开始语法化的标志就是出现在“$V_{行}$·N·V_2”结构中。据王力,在原始汉语中就已经出现了连动结构,不过以“趋向动词·动词”的连动结构最为常见。[①] 如:

(13)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庄子·逍遥游》,第 8 页)

先秦时期,连动结构扩展为“V_1·N_1而/以V_2·N_2”或“V_1·N_1·V_2·N_2”结构。$V_{行}$于先秦时期进入“V_1·N_1·V_2·N_2”结构,如:

(14)IA 顺彼长道$_{(a)}$,屈此群丑$_{(b)}$。(《诗经·鲁颂·泮水》,第 282 页)

B 就其深矣$_{(a)}$,方之舟之$_{(b)}$;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诗经·国风·邶风》,第 25 页)

C 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_{(a)i}$行$_{(b)}$国邑$_i$,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礼记·月令》,第 432 页)

(15)IIA 顺风$_{(a)}$激靡草$_{(b)}$,富贵者称贤。(《后汉书》卷八十,第 2631 页)

B 协日就郊$_{(a)}$而刑杀$_{(b)}$。(《周礼·秋官·司寇》,第 56 页)

C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_{(a)}$而走$_{(b)}$,亦莫余敢侮。(《左传·昭公七年》,第 1275 页)

(16)IIIa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三国志》卷十,第 328 页)

b 就王身上剜作千疮。(《经律异相》卷二十四,第 131 页)

c 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三国志》卷一,第 25 页)

例(14)中,A_a和A_b是并列结构,表示顺序进行的动作;B_a、B_b是前一动作完成接着进行后一动作;C_a和C_b中表示两个同时进行的动作。除A外,B、C都是并列结构。语境I中,$V_{行}$的宾语与$V_{行}$相融,V_a和V_b之间地位平等。语境II中,$V_{行}$的宾语和V_2之间不相融。$V_{行}$宾语的语义范围扩到“$V_{行}$·V_2·N_2”结构,且“V_2·N_2”结构中V_2分享$V_{行}$的直接论元N1,“$V_{行}$·N_1”发生语义降级,成为V_2的修饰成分,但是V_2和$V_{行}$仍具有语义融合性,故$V_{行}$仍为动词。当$V_{行}$出现在III类语境中时,$V_{行}$的论元以及V_2之间没有概念框架语义上的关联,$V_{行}$语法化为介词。例(16)a中,V_2“下”在其语义框架中需要有[+运行处所]特征,b中“剜”不具备[+运行]特征,V_2和$V_{行}$没有语义上的交叉,$V_{行}$为介词。c中“来”需要[+路径]特征,且“循”自始至终都具有[+处所]特征,不能激活其他特征。激活扩散理论认为,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节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沿该节点的各个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直接相连的界点,再扩散到其他节点。第III类语境中,“顺”“就”等已经发展为介词,在介词结构中,V_2是核心成员,事件框架语义模型和句子成分相对应。如:

(17)a 将为天明,严驾顺路行至城南。(《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第 406 页)

b 而今若顺这个行,便是。(《朱子语类》卷三十二,第 812 页)

c 顺情说好话,千直惹人嫌。(《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第 234 页)

(18)a 我有美酒一榼,鱼肉五斤,饼有十播,饭有一罐,请来就船而食。(《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

①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55 页。

第 366 页)

b 就分明处用力,则一日便有一日之效。(《朱子语类》卷三十二,第 817 页)

c 就此文中分之为六,即六种是也。(《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六,第 430 页)

例(17)中,V_2(行)要求有[施事][运行]等必要论元和[路径][目标][方式]等次论元。V_2不直接支配次论元(*行路/路行),需介词结构补偿其[路径][目标]论元,如 a(顺路行),该结构的事件框架为:[施事][运行[路径][起点][目标[方向][终点][方式]。b 同 a,其中[目标]隐现,句意不受影响。c 中,V_2为"言说"义动词,N_1(情)有"路径"特征,被激活,"顺"表"依据标准"。"就"受源义的制约,用于[运行][处所]语境中,随着语境的扩展,出现在"非运行类处所"语境中。例(18)a 中,"船"为处所名词,"食"不具备[+运行]特征,"就"语义进一步虚化,进入"停滞"语境中,表示处所所在。b 中,"用力"不具备[+运行]特征,"分明处"为抽象处所。c 中,"分"已与"处所"没有直接关系,"文中"已不能表示"处所",而是"分"的对象范围,故"就"在"范围"事件中,实现再语境化。"就"在处所语境中泛化时,N 还可以是指人名词,V 为非运行义动词。如:

(19)a 时青州刘玄石善能饮酒,故来就狄饮千日之酒。(《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八,第 878 页)

b 吾当不用弟语,远来就父同诛,奈何!奈何!(《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 3 页)

例(19)中,"狄"为指人名词,"饮"为非运行义动词,"就"表"伴随对象"。运行类介词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实现再语境化,如"沿"始终表"处所":

(20)兔儿沿山跑,还来归旧窝。(《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七回,第 1310 页)

再语境化的能力越强,介词性质就越强。"运行"类介词在处所语境中都得到规约化,但是"就""往"还能在时间语境中实现再语境化;"顺""循"能够在"依凭"语境中被接受。"运行类"介词的语义分布涉及"处所""方向""时间""依凭""对象"。以"处所"为母节点,其语义激活情况如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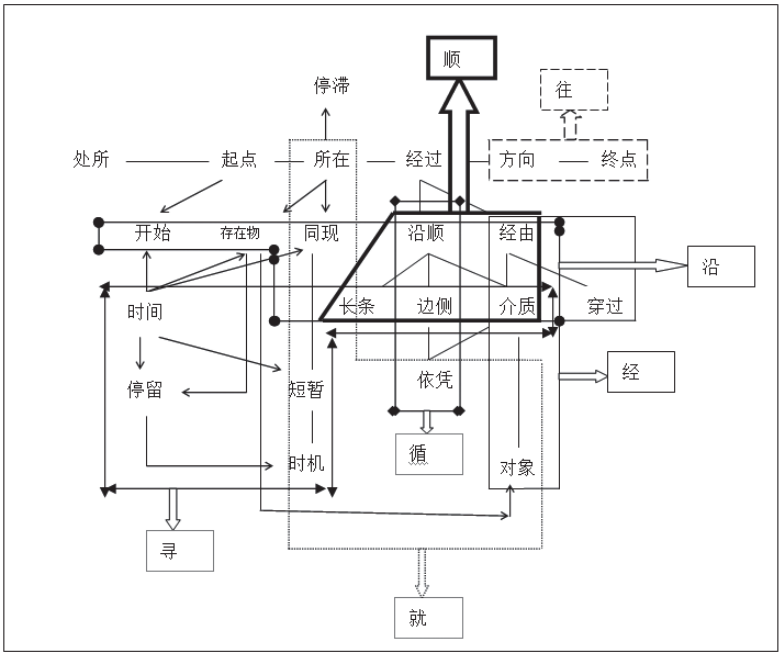


图 6 "沿顺"类介词的语义激活模式

激活扩散理论认为，激活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概念越是长时间的受到加工，释放激活的时间也越长，但激活在网络中扩散将逐渐减弱，它与连线的易进入性或强度成反比，连线的易进入性越高，则激活减弱越少；反之则越多。[①] 图 6 中，离介词初始语境（处所）越近，与语境义的融合度越高，介词性越低，如“沿”。距离初始语境越远，介词语义脱离原范畴越多，语境约束力越强，介词性越高，如“就”。启动效应认为，先前的加工活动对随后的加工活动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行顺”义介词保留“路径”因素。以“路径”为原点激活“出发”“经过”“方向”“终到”等元素。通过隐喻和转喻等的作用，“出发”“终到”和“时间”语境相连接，激活“时间”语境。“经过”作为第二层事件框架，又暗含“位置”“约束性”“客观性”“不可改变性”“执行性”等特点，由“约束性”“不可改变性”“执行性”激活“依凭”类语境，如“就”“顺”“循”“寻”。由“经过”事件的“穿过”“中介”激活“对象（人）”语境，如“经”“就”。这种激活是特定源的激活，虽有扩散但可以追踪出产生激活的原点。独立的词汇项可以表达大量的认知域，但是他们还是会在一定的层次秩序上，他们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依赖于语境同时也依赖于他们所在的结构存在的。[②]

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初级阶段。动词语法化为介词后，通过结构语境的泛化使介词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同时通过语境的泛化使介词语义得以拓展。在语境泛化的过程，隐喻是激活其他认知域的重要机制。隐喻和转喻是来自于一个成分的不同构件，同样经历由具体到较为抽象的语法概念的转换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由具有转喻关系的两个临近的实体构成；另一方面，他又包括一些小的凸显的、不连续的范畴，例如空间、时间或性质。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隐喻性关系，也可以描述为是大量转喻扩展的结果。另外，转喻是该过程中较为基本的组成构建，隐喻是以转喻为基础的。[③]Lehmann 关于语法化自主性的概念只能解释句法组合关系的变化，而忽视了结构之间的关系。[④]

（三）源义的决定作用

Bybee 等提出了 8 个语法化理论假设，第一个就是“源义决定”(Source determination)，即进入语法化项目的源义独特地 (uniquely) 决定着其语法化路径、走向及其语义结果。但并非所有动词都能进入连动结构实现介词化，也并非所有进入连动结构的 V_1 都能介词化。介词语义网络层次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介词语义的判定对源义的依赖性越强。如“对象”类介词，母节点的语义判定根据结构中 N 或 V 的性质可判定；第二节点需要根据 N 和 V 之间的关系来判定，如例（21）（22）；第三节点不仅要根据 N、V 性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判定，还要根据介词源义进行判定，如例（23）。

（21）莫言鲁国书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戏醉生》）

（22）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 52 页）

（23）a 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南齐书》卷九，第 133 页）

---

① 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94 页。

② Bisang W., "Grammticalization without coeverlution of form and meaning:The case of tense-aspect-modality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Bisang W.Himmelman,and wiemer B eds", *What Makes Gramm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amponents*, Berlin: Mounton de Gruyter, pp.27.

③ Heine B., Ulrike C., Friederike H.,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pp.73-74.

④ Lehmann C.,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2015, 73(3), pp.670.

b(菩萨)常从五百猕猴游戏。(《六度集经》卷六,第32页)

c孔稚圭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南齐书》卷五十四,第927页)

例(21)中,介词结构中V“欺”为二价动词,其词义框架中要求出现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其中受事论元要求是有“生命”“判断性”特征的名词,根据介词“把”的标引对象N(刺史)和动词V(欺)之间的语义关系便可判断介词“把”的语义性质。例(22)中,主要动词“谪”需要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同现,施事论元要求是具有[+施动性]特征的人或物,受事论元要求是具有[+承受性]特征的人或物,句中“魏武”是具有施事特征,“祢衡”具有受事特征,根据主要动词“谪”和标引对象“魏武”之间的关系可判断“被”标引施事对象。例(23)中,“求”“戏”“受”具有[+协同性]特征,根据V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从”表示对象,但是对比“求”“戏”“受”和“我”“其”“猕猴”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判断“从”标引的具体对象,根据“从”之源义的制约,例(23)a中,“从”处于动词向介词过渡的阶段,即可以理解为“宋氏诸帝”“跟随”“我”“求食”,也可以理解为“宋氏诸帝”“向”“我”“求食”;b中,“从”偏向介词,首先“游”多为[+人]发出的动作,“猕猴”被动跟随,故“从”宜理解为伴随介词;c中“受”具有传导性(抽象转移)特征,转移的目的地(接受方)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若接受方是个体则表示师从对象、若接受方是群体则表示伴随对象。所以,例(23)中对于介词“从”语义性质的判断还要借助对“从”源义性质的判断。相对,其介词性质较“把”“被”要弱,其对标引对象和动词的语义要求也就越具体。

Hagége总结了介词的核心语义和非核心语义。[①] 非核心意义可以由核心意义发展而来,但是非核心意义不能向核心意义映射。汉语介词的语义发展与英语有所不同,除了语境扩展外,源义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源义丰富的介词其介引能力强。受隐喻和转喻因素的影响,比较活跃的“就”还可以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元素,而“沿”的源义为“沿着(江河、道路)等”,语义所指明确,源义的约束力较强,被激活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沿”不具备被激活的次论元特征,不具备隐喻的相同特征。因此,隐喻(转喻)是介词语境扩展过程中的基本机制。

三、介词系统语义模型与语法化层次

(一)介词系统语义模型

1. 介词语义激活模型

Hagège把介词语义分为3种“语义域”(Semantic domains):核心意义域、时-空域、关系概念域。对于一个具体的语义域内的若干介词成员来说,具有竞争关系,其标引能力有差异,有的是主标介词,有的是次标介词,前者在一定时空内,在某个具体语义域内的复现频次要高很多,后者相对低。对于一个系统内的具体介词来说,其标记能力也有差异,有的仅标记一个语义域,有的标记多个语义域。介词各子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特征相互关联。如“空间”介词结构中,N_L有“起点”“边界”“终点”“可

① 参见Hagége Claude, *Le Problem linguisitique des preposition et la solution chionoise*, Paris: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irs & Lounvain: peters,1975, pp.261-262.

容纳”等特点，V_L 有“运行”“穿过”“执行”等特点，“时间”介词结构中也具有相同特点。“对象”介词中，N_O 具有和 N_L 相类似的特点，如指人名词也可以具有“起点”“可容纳”等特点。据我们观察，各语义域之间通过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点进行联接，激活其中一个义域便有可能使其他义域处于苏醒状态。其空间联接模式详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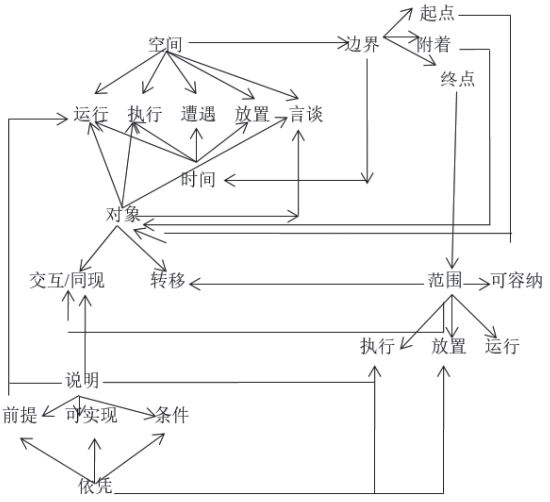


图 7 介词结构语义激活模型

2．介词系统语义层次模型

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语言中表示空间的词是派生其他词语的基础。派生是通过隐喻（metaphor）或引申从空间域转移到其他认知域，如时间域等。如“就”由表示空间义引申到对象、时间。《说文》：“就，就高也。”桂馥注：“此言人就高以居也。”，后发展出趋向动词用法，由趋向动词发展出介词用法。如：

（24）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礼记・曲礼》，第 20 页）

（25）a 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第 161 页）

b 先就东郡张恭祖受周礼、礼记、春秋传。（《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第 104 页）

c 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搜神后记》卷二，第 25 页）

d 咱每休磨拖，趁清凉，就马每吃的饱时，赶动者。（《老乞大》，第 47 页）

例（24）中，“就”均为空间范畴，表示“物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生位移”。例（25）a 中，“就”可分析为趋向动词，也可分析为介词，表示“空间处所”；b 中，“就”为介词，但语义也可两解，一表空间义，即“到东郡张恭祖处学习……”，也可理解为“到东郡跟张恭祖学习……”，前者为空间范畴、后者为对象范畴；c 中，“就”表对象义，为对象范畴；d 中，“就”表时间，为时间范畴。空间类介词成员在所有介词语中分布最广。

介词系统中，空间类介词结构中可以激活的节点最多，扩散范围最广，语义覆盖区域最多，基在介词语义扩散的过程中，空间域是向其他语义域扩散的主要节点。通过图 8 可以看出，介词语义系统中，空间域可通过各个节点与时间域、对象域相联系，其中和对象域有互相激活的关系。空间域可激活时间域、范围域，通过范围域间接激活说明域。根据激活扩散的范围，说明域距离空间域节点最远，因此其介词化程度最高。因为对象域和空间域有互相激活的关系，对象域又可直接激活说明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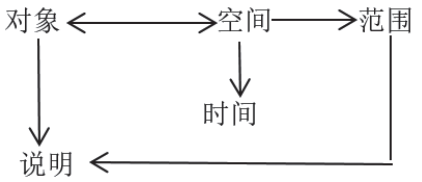


图8 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二)介词语法化的层次

语法化过程中,旧的形式和意义有时会稽留一段时间,在同一共时层面上存在同一语法功能的多种变异形式,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但是同一语法化项在同一时期不同的语义表现,有的保留较多动词性,有的具备较多介词性。就同一系统内部成员而言,不同的搭配形式显示其语义漂白程度。共时情况下,有的成员摆脱源义束缚较多,语法性强,语法化程度高,如"就";有的受源义约束较强,具有介词性质,但是搭配对象受限,与源义的匹配性较强,语法化程度较低,如"沿"。介词的层次性表现在N_1和V的语义匹配程度上。距离源义越远的界点,源义的约束力越小,介词化程度越高。Heine等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隐喻的发展路径:人>物>空间>时间>性质。[①]Hagége总结的介词核心语义和非核心语义中,核心意义为对象类介词,表示施事、受事、与事(归属者、所有者);非核心意义包括空间、时间、关系等意义,这体现了由自身到外界的认知过程。但是在汉语中,这一规律并不必然如此。汉语或许会有一些独特的认知方式。如"就"初始介词语义为空间(处所),第三者所在的位置也可以看作抽象的处所。当其标引对象为表示人所在的位置时,V具有自主性,获得语境的认可之后,"就"便融入到对象语境中。由此,"就"便实现了由"空间>人"的激活过程。

在介词系统的语义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形式介词化程度越高。这说明,语法化过程中形式和意义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意义的发展要快于形式结构的发展。介词系统中各成员也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如"行顺"义介词成员中,"经""顺""循""沿""寻"产生于处所类语义层次的第二层节点处,据上文分析,语义网络层次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初始介词对源义的依赖性越强,介词性越差。"就""往"产生于第一层节点处,语义范围要宽,源义的约束性弱,相对来说介词性要强,同时被激活的可能性越大。第一层筛选中,"就""往"的介词性大于其他五个。根据上文分析,被激活的节点越多的成员,其介词性越强。第一层成员中,"就"被激活"时间""对象""依凭""范围"四个语义域;"往"只激活"时间"一个语义域,则"就"的介词化程度高于"往"。第二层次的介词成员中,"顺"被激活"依凭""时间"两个语义域;"循""寻"被激活"依凭"语义域;"经"被激活"对象"语义域。第二层次的语法化程度可以描述为:顺>经/循/寻>沿。根据介词和动词语义重合越多其介词性越差,反之越强。第二层成员中,"经""循""寻"被激活一个语义域。第二语义中,"经"的标引对象为表示施事(教授)对象的"人",与源义的联系不甚密切。"循""寻"标引的对象为"道理、尺度/标准"名词。"循"与"道理""规律"融合性较差,"寻"本义即为"量度单位"。因此第三层次成员的介词化程度可以描述为:经>循>寻。"行顺"义介词的语法化程度为:就>往>顺>经>循>寻>沿。激

①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Friederike Hu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活扩散理论认为，一个概念被激活的时间越长，其释放的时间也就越长，但激活在网络中扩散将逐渐衰落。行顺义介词中，“就”被激活的节点最多，源义的控制能力最差，语义虚化程度最强，常需要其他手段的语义强化，而且强化的手段多是实词性质的成分，且需要加强的语义部分是距离母节点最远的语义环境。

综上可知，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前提基础，语境扩展（泛化）是语法化再发生的基本方式。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经历两个类型的语境泛化，一是述宾结构向连动结构的泛化，第二阶段是连动结构向介词结构的泛化。其中第二阶段的泛化比较复杂，我们以“行顺”义介词的语境泛化为例，在激活扩散理论的背景下分析了介词语境泛化的方式和结果。介词源义决定介词的语义及其发展方向。介词结构中 V_2 的次要论元意义不能由 V_2 直接支配，但是 V_2 的事件框架中这些元素又是必须出现，因此需要介词结构来补偿次论元的语义结构。因此，介词源义的支配能力决定了介词的补偿能力。源义支配能力强的介词所补偿动词语义越多，介词性越强，再语境化能力越强，语义范围越广，如“就”。在同一语义网络中，层次越靠近母节点的成分，源义的支配能力越强，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可能性就越大；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地方，语义越具体，对支配对象的语义要求越高，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介词性程度越差。在同一层次中，激活节点相同的情况下，与 V_2 与源义的语义交集越多，介词性越差；相反，介词性程度越高。隐喻和转喻是一切节点激活的连线。Lehmann 等认为，使用频率也是判断介词程度的标准之一，如果 V_2 和介词源义的距离相同，则需要通过使用频率来判断其语法化程度。[①] 对汉语介词来说，语义漂白、语境泛化和源义的影响足以判断介词的语法化程度。

责任编辑：潘文竹

Cognitive Semantic Model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Prepositions

Cui Yun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Prepositions have only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no lexical meaning, and their semantic properties need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onents in the structure of prepositions. The semantic distribution of prepositions takes the form of networks and hierarchies. Each network node can be viewed as a concept. The semantics of prepositions i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certain logical relations and constitutes a hierarchical network system. Each level of semantics is on its corresponding node, and each node is connected with the upper level of semantics by it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a relatively closed network system, namely, the semantic hierarchical network of prepositions. Each semantic feature of a preposition appears in a fixed position in the model of network hierarchy. According to the activation of network nodes, semantic bleaching and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ing Chinese prepositions. The source meaning of the grammaticalized term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judge the meaning of prepositions. The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preposition semantics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 of preposition semantics.

Key words:preposition; semantics model;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semantic hierarchy

① Lehmann Christian,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Second, reversed edition)*, Erfurt: Seminar für Sprachwissnschaft der University，2002.

近代日本敬语政策的嬗变及其影响

洪仁善 姜言胜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敬语是日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日本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肩负了维持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二战以来,日本敬语的使用经历了由“绝对敬语”到“相对敬语”的演化过程,敬语本身亦从之前表示阶级上下身份关系的封建主义产物转型为国民语言中表示民主平等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与日本政府和学界先后组织的三次敬语审议活动以及分别出台的《今后的敬语》《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敬语指针》等政策密切关联。这些政策不仅规范了敬语的使用,也反映了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变革、国民思想演变、社会变迁等因素。

关键词: 日本;敬语;《今后的敬语》;《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敬语指针》

中图分类号: H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4-0142-13

敬语是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首次出现在今存日本文献中的时间是1874年[①],但日本人使用敬语的时间当早于这一时间。至二战前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日语敬语在形式、用法、属性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形成了非常发达的体系,堪称日语的一大特色。从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日本敬语的使用经历了由“绝对敬语”[②]时代到“相对敬语”[③]时代的演化过程,敬语本身亦从之前表示阶级上下身份关系的封建主义产物逐渐转型为国民语言中必不可少的表示民主平等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演变进程,与近代日本政府先后发布的三次敬语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变革、国民思想演变、社会变迁等因素密切关联。

一、《今后的敬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同年9月2日,盟军受降仪式在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项目“战后日本的敬语问题研究”(JJKH2020196SK)、“修辞受众视角下的修辞诉诸研究”(JJKH2019301SK)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洪仁善,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姜言胜,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① [日]田中義廉:『小学日本文典』1—3,東京:雁金屋清吉,1874年。

② 绝对敬语概念由金田一京助提出,指对于特定的人或阶层,不管谁论及,都要使用特殊的语言;一般来说,能够作为绝对敬语尊敬对象的只有帝王与神。详可参阅金田一京助:『国語研究』,八雲書林,1942年。

③ 相对敬语指话题人物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根据与听话人关系的不同而确定是否使用敬语,且所用敬语也可因听话人不同而有所变化。

停泊于东湾外的美国海军密苏里战舰上举行，日本自此进入了为期7年的美军占领时期[①]。1946年1月1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首次否定了天皇的神性，让天皇重新做回普通人。同时，在美国当局的建议下，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民主改革，并把罗马字[②]定为日本国字。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置日语中与原有政治体制密切关联的敬语，是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日本国语审议会于1950年6月设置敬语委员会，以著名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为会长，正式开始了敬语审议、修正工作。

对当时的敬语审议工作，《朝日新闻》这样报道："国语审议会已开始审议'敬语的正确使用方法'，日本国民满怀期待民主主义时代的敬语的存在方式。"[③]在还处于美军主政时期的日本，敬语问题的走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日本国语审议会近两年的工作，《今后的敬语》于1952年4月正式公布。这一在特殊背景下出台的敬语政策，反映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时代主题。

（一）政治体制变革与敬语政策的走向

1946年颁行的《日本国宪法》，是区隔日本战前与战后的根本界标。它的出台，意味着政教分离、神道废止、天皇虚位、主权在民等近代性原则首次在日本获得了学理和法理的保障[④]，标志着西方现代民主制在日本的开始施行，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在日本的正式确立。而政治体制的变革，直接决定了日本敬语政策的走向，并最终导致敬语性质的变化。

对于敬语的使用问题，当时的国语审议会有过争论，主要意见有三：1. 敬语是日语的特征之一，应继续使用；2. 在民主主义国家，不应使用敬语；3. 敬语表尊敬之意，民主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互相尊敬对方，因此应在一定程度内保留敬语。[⑤]最终，国语审议会依据第3种意见进行审议。在该意见的选定过程中，金田一京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研究，当时向国语审议会提交敬语提案的敬语委员会成员，只有金田一京助一人。[⑥]对敬语问题，金田一京助早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有过深入研究。此次敬语问题的审议工作，基本是按照他的构想推进的。但颇具戏剧性的是，此前他曾这样批判来自美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有人认为日语的敬语规则特别繁琐，应废除敬语，从而实现四民平等。这种观点是来自美国等国家的万恶的平等观，他们根本不了解日语的独特优势。"[⑦]而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出台，直接确立了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并对当时敬语政策的走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金田一京助不得不与日本政府保持同一步调。他一改此前的批判话风，大力呼吁国语审议会在民主主义前提下讨论敬语问题，从而最终促成了《今后的敬语》的出台。

---

① 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267—288页。

② 罗马字：此指使用拉丁字母来表记日语的一种方法。

③ [日]朝日新聞社：「敬語の正確な使用方法」，『朝日新聞（朝刊）』，1950年12月4日。

④ 韩东育：《从近代化到近代性：日本新旧宪法的思想史解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⑤ [日]国語審議会：『第1期第15回総会議事録』，1952年6月2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01/bukai05/index.html.

⑥ [日]安田敏朗：『金田一京助と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平凡社，2008年，第20頁。

⑦ [日]金田一京助：「女性語と敬語」，『婦人公論』(9)，東京：中央公論社，1941年，第109頁。

(二)男女平等原则与人称代词的变迁

对于人称代词,日本政府1933年颁行的《中等学校礼节要项解说》和1941年颁行的《礼法要项》都规定,对同辈通常使用表第二人称的"あなた"一词。[①] 而1952年颁行的《今后的敬语》中,国语审议会明确建议:在公共场合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私"(わたくし),第二人称代词使用"あなた"。这一变化与战后日本日益强化的男女平等原则关系紧密。

较之其他语言,日语其实很少使用第二人称。"あなた"一词的表敬意程度,在二战前属于中等,二战后则逐渐降低,而且多用于夫妻之间[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词由表敬意的第二人称代词逐渐演变为需要审慎使用的人称代词。日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则较为常见,但此前用法极为烦琐。前述《礼法要项》即规定:"通常使用'私'(わたくし)[③],对长辈也有使用姓氏或名字的时候。男性对同辈可以使用'僕'(ぼく),但不能用于长辈。对有特别关系的长辈,想表达格外敬意的时候,不使用'私',使用姓氏或名字更加郑重。对'吾輩'(わがはい)'吾々'(われわれ)'僕'(ぼく)的用法一定要注意。这些不是女性使用的语言。"[④] 这里强调的,显然是使用对象的性别差异。但《今后的敬语》明确取消了这一差异:"原则上男女都以'わたし''わたくし'为标准。""女性语言中使用着非必要的敬语或美称(例如对'お'的过度使用等)。希望通过女性的反省与自觉,逐渐纯化女性用语。"[⑤]

日语中人称代词的变迁,明确反映了二战后逐渐强化的男女平等原则。1945年10月,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发布了五项重大改革指令,其中第一项就是解放妇女,给予妇女参政权。1947年,日本颁行《日本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了女性的合法权益,并提出了一系列与男女平等问题相关的理念与基本原则。如其第24条则提出了"家庭生活中的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等理念,其第14条第一则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中,都不得意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就为日本历史上男女不平等划上了终止符,也奠定了《今后的敬语》取消敬语使用中性别差异做法的法律基础。

(三)神性否定与皇室用语的修订

词汇是语言中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时候,词汇系统总是异常活跃,以其敏感、活跃的特点及时而又直接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⑥] 日本皇室用语特别是昭和天皇所用人称代词的变化,即真切地反映了这个道理。

在1947年6月23日召开的新宪法下第一届国会开幕式上,昭和天皇说:"今天在第一届国会开幕式上,能与代表国民的人士们齐聚一堂,我深感欣慰。"[⑦] 这里的"我",使用了"私"(わたくし)这

① [日]帝国実行教育会:『中等学校作法要項解説』,東京:帝国教育学会発行,1933年,第43頁;[日]礼法研究会:『礼法要項解説』,東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41年,第60頁。

② 该词偶尔也用于处在同等地位和同龄人群间,抑或称谓下属,但使用频率都不高。

③ 其中的日语读法是笔者补注,下同。

④ [日]礼法研究会:『礼法要項解説』,東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41年,第59頁。

⑤ [日]国語審議会:『これからの敬語(建議)』,1952年4月14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01/tosin06/index.html.

⑥ 王红梅:《当代汉语新词语专题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⑦ [日]第1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会議録(第6号),1947年6月23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0105254X00619470623&current=1.

个日本国民普遍使用的人称代词。但在1945年8月15日通过广播宣读的《终战诏书》中，他使用的仍是“朕”这个天皇专属用词。天皇所用人称代词的改变，是1946年颁行的《人间宣言》的直接结果。该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从而提出了关于天皇及皇室敬语的使用问题。稍后颁行的《日本国宪法》，更使天皇及皇室敬语的调整问题变得刻不容缓。因此，同年8月，宫内厅与媒体之间就皇室敬语的使用问题达成协议。在天皇及皇室用语方面，日本开始使用一些普通词汇范围内最表敬意的词汇，如将“玉体/圣体”改为“身体”，将“天颜/龙颜”改为“御颜”，等等。皇室用语的这一变化，表明日本从“绝对敬语”时代进入到了“相对敬语”时代。

综上可知，美军占领时期颁行的《今后的敬语》，反映了日本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时代主题。首先，敬语从表示阶级上下身份关系的封建主义的产物，在战后转型为表示民主平等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敬语性质发生了由封建性、阶级性到民主性、平等性的实质性变化。正一如《今后的敬语》中所说：“修正之前的繁杂、封建等属性以及过度使用敬语的状况，努力使敬语变得简单、易懂。”[①] 国语审议会有关敬语政策的转变也体现在了“战前把敬语研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糅合，强化日本民族主义历史”[②] 这一层面。《今后的敬语》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敬语的具体使用问题，但划清了与旧时代的界限，体现了民主主义、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其次，《今后的敬语》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为日本敬语的使用指明了方向。《今后的敬语》颁行后，国语审议会会长土岐善麿指出：“敬语问题的方向已定，今后将继续讨论关于敬语的具体问题。”[③] 不过，在1981年文部省颁行《常用汉字表》之前，日本国语审议会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如何处置中国汉字问题上，敬语问题的讨论被长时间搁置下来。当然，这也间接证明了《今后的敬语》对敬语问题的具体规定比较合理这一事实。

二、《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

与1952年相比，日本1990年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日本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最终确立，日本开始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形成国家新秩序”的建议。1992年1月，日本首相首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表明“入常”诉求。[④]1993年，小泽一郎从国际贡献角度提出了“宪法当然也应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修宪意见等。[⑤] 同年，自民党单独执政的“55年体制”结束，日本的政党政治进入了变革与转型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敬语的使用

① [日] 国語審議会:『これからの敬語(建議)』,1952年4月14日, 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01/tosin06/index.html.

② [日] 山下仁:「敬語研究のイデオロギー批判」,『「正しさ」への問：批判的社会言語学の試み』,東京：三元社,2000年,第60頁。

③ [日] 国語審議会:『第2期第15回総会議事録』,1952年6月2日, 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02/sokai015/04.html.

④ 详可参阅杨伯江:《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2页。

⑤ [日]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東京：講談社,1993年,第134頁。

问题再度提上议程。

1993年11月,日本文部大臣赤松良子就“适应新时代的国语政策”咨问了国语审议会。其中的“适应新时代”一词,与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紧密呼应,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1996年,日本国语审议会于设置敬语委员会,由著名的语言学家北原保雄担任主任。2000年12月,在经过近4年的审议之后,敬语委员会审议出台了《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其中对敬语问题,主要讨论了五方面内容。

(一)“敬意表现”与“礼貌原则”

在这次审议中,国语审议会提出了“敬意表现”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交流过程中,基于相互尊重,在考虑对方与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具体来说,说话人尊重听话人的人格与立场,用敬语及敬语以外的形式,选择得体的自我表达形式。”[①] 这把一直以来的“敬语”问题拓展为“敬意表现”,即把表达敬意的非固定表达方式也纳入到了这次审议当中。因为在学校让孩子们正确使用敬语比较有难度,但是从“敬意表现”的角度来看是可行的,比如在教室向别人借铅笔时,说“借给我铅笔”与“非常抱歉,能否借给我铅笔”的交流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对国语审议会提出的这一概念,一些日本学者并不认同。宇佐美即批判它反映了国粹主义精神论:“被讴歌为新概念的‘敬意表现’并非国语审议会的独创。其实这一概念无非就是把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原则’中的‘根据威胁面子的程度,选择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措辞部分,改为了日式的对‘受话者的关怀’等精神层面的表达方式而已。所以说将之称为国语审议会只是把‘礼貌原则’改为了日式的‘敬意表现’也不为过。”[②]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首先,“敬意表现”的确“并非国语审议会的独创”,且与“礼貌原则”理论有着密切关联,但宇佐美的言论有其偏激之处。日本确实很早就有“待遇表现”一词,但这一词汇多用于业内学者之间,因此国语审议会使用了更为通俗的“敬意表现”。而且时枝诚记、宫地裕、辻村敏树等日本学者,也很早就开启了礼貌视角的研究。[③] 但“礼貌原则”在很多语言中普遍。从敬语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说“敬意表现”完全抄袭了“礼貌原则”的观点,还是比较偏激的。

其次,在这次敬语政策的审议中,国语审议会把审议方向从敬语本质问题拓展为“敬意表现”,这一转变与当时日本语言学界盛行的在“礼貌原则”视角下强调敬语特殊性的学术背景直接关联。敬语小委员会的审议多次言及“礼貌原则”,撰写《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的负责人井出祥子更是围绕“礼貌原则”理论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审议会记录还有这样的记载:“敬语小委员会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学习了井出祥子的全球化视域下的日语敬语问题研究。”[④] 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这一时期日本

① [日]文化庁:『現代社会における敬意表現』,2000年, 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2/tosin02/index.html.

② [日]宇佐美まゆみ:『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から見た<敬意表現>』,《月刊言語》30号,東京:大修館書店,2001年,第24頁。

③ [日]時枝誠記:『国語学原論』,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日]宮地裕:『敬語の解釈一主としていわゆる「謙譲語」とその周辺一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2』,『ことばの研究(第2集)』,東京:秀英出版,1965年,第187—204頁;[日]辻村敏樹:『現代の敬語』,東京:共文社,1967年。

④ [日]国語審議会:『第22期第3回総会議事録』,1997年6月19日, 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1/sokai005/02.html.

敬语政策的走向。

最后，“敬意表现”的观点中没有提及“礼貌原则”的理论，只是强调了日本视角。这与“在国内学界只要涉及欧美理论，不仔细斟酌其理论内容，批判其为欧美倾向或说其没有文化独创性的根深蒂固的想法不无关联”①，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时代背景也密切关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敬语委员会急需一种既能在国际上通用、又可以彰显日本独有文化的视角。把日本固有的敬语理论与“礼貌原则”理论相结合的“敬意表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但是该视角一经出炉，敬语委员会就陷入了日本学界的剽窃“礼貌原则”理论非议浪潮之中。

（二）女权运动与女性用语

女性用语在敬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田一京助曾提出“敬语与女性用语是同源关系”的主张。② 该主张虽非的论，但谈论日本敬语问题时，女性用语的确是绕不开的话题。

如前所述，二战后的日本政府有意在敬语政策中体现男女平等观念。但《今后的敬语》中虽出现了男女平等的导向，实际生活中的女性用语还是有别于男性。据1995年4月文化厅进行的调查结果，有44.1%的日本国民认为两性用语还是该有区别。③ 与1979年的82.8%④相比，该数据虽有显著降低，但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对此，佐竹久仁子指出：“因战败，日本政治和经济制度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两性用语规范方面，可以说战前和战后并没有出现断层。”⑤ 两性用语没有因战后男女平等思想的趋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性别用语成为热议对象的原因，还与二战以来日本的女权运动密切关联。1970年代开始，受国际妇女运动的影响，日本民间成立了“国际女性教育会馆”，日本政府也开始制定促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政策。1980年，日本首位女党魁、首位女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在国会提出了性别歧视法问题，就“男女雇佣歧视”“只用女性必修的家庭科”“只认可父系的国籍法”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于1985年批准了《废除女性歧视条约》，颁布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1986年4月1日实施）。后者规定了推进男女在雇用方面享有均等机会和待遇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为日本女性劳动者的福利以及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法律依据。1999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并开始施行《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性别用语逐渐变成敏感话题。

在1952年的敬语政策中，“君”用于男同学，也可以用于年轻男性。⑥ 但在1993年8月开始、由土井多贺子担任议长的约3年时间里，国会众议院的历次会议纪要对男性议员没有使用“君”，而是将男女统一敬称为“さん”。虽然男性议长上任后，国会众议院会议用语又恢复原样，但土井多贺子

---

① [日] 宇佐美まゆみ：『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から見た＜敬意表現＞』，『月刊言語』30号，東京：大修館書店，2001年，第24頁。

② [日] 金田一京助：「女性語と敬語」，『婦人公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41年，第104頁。

③ [日] 文化庁：『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95年。

④ [日] 国語審議会：『第20期第5回総会議事録』，1994年10月20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0/sokai005/03.html.

⑤ [日] 佐竹久仁子：「「女性語」の形成と衰退」，『日本語学』(31−7)，東京：明治書院，2012年，第47頁。

⑥ [日] 国語審議会：『これからの敬語（建議）』，1952年4月14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01/tosin06/index.html.

在任期间的这一做法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敬称走向。1999年,日本《读卖新闻》刊出“关于东京都内不断增加的男女平等学校”特辑,其中称越来越多的学校点名册不再将男女分别排列,而是按姓名的50音图顺序排列,称呼亦统一为“さん”。[①] 日语教科书中的男女敬称,1990年代是“君”和“さん”并存,2002年开始亦都统一为“さん”。[②]

这次审议过程中,虽然也有委员提出应该对女性用语进行特别叙述,不应在无差别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不言及日本女性语言的美。其中,北原保雄列举了四国地区一首登上新闻的高校校歌的例子,因为其中有“女孩应有女孩样子”的表述而被质疑为有性别歧视意味。[③] 北原保雄的言外之意是,国语审议会最好不要言及性别用语,从而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而对两性用语这一敏感问题,最终定稿的《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只称“不管是哪个性别,主要问题是如何选择符合受众和语境得体的词汇来表现自己的人格与表达自己的想法”[④],而没有给出任何导向性建议。

(三)信息化时代与敬语误用

敬语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997年,在关于敬语问题的调查中,日本文化厅发现,不认为敬体“ます”是敬语的人达到了85.3%,不认为“なさい”是敬语的人也达到93.0%。[⑤] 随着一些敬词在口语中的普及,人们逐渐地不把它们视为敬语。这一现象表明,1952年颁布的《今后的敬语》中以“です、ます”为基本语体的建议已在社会中普及。

1990年代,敬语的误用现象逐渐增多。1992年,在日本总理府进行的“现在的国语使用是否混乱”抽样调查中,近75%的日本国民认为“混乱”,这与1977年相比增加了近5%。这种混乱现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敬语错误使用问题。敬语误用现象主要有三种,即把自谦语当作尊敬语、在商界和服务行业使用双重敬语、过度使用敬语。其中,商界过度使用敬语问题在1952年的审议中即曾提及。但在日益盛行的“客人至上”理念下,该现象非但没有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而且,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敬语误用借助媒体迅速地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已经影响到日本人传统的语言习俗。据统计,83.3%的日本国民认为报纸和广播等媒体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应该规范媒体用语。[⑥]

解决敬语误用问题是日本政府这次修订敬语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敬语小委员会须对敬语的具体问题进行审议,但这与本次敬语政策宽泛的“敬意表现”视角不符。因而,本次审议最终也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违背了其修订敬语政策的初衷。而为了纠正社会与学校教育层面的敬语误用现象,日本政府确实有必要出台相关白皮书。

---

① [日]読売新聞社:「東京に増える男女平等校に関するレポート」,『読売新聞』朝刊,1999年1月1日。

② [日]放送用語委員会:第1415回「ちゃん/君/さんし」動物が「死亡する/亡くなる」について,2017年7月7日,第100頁,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kotoba/pdf/20171101_1.pdf.

③ [日]国語審議会:『第20期第7回総会議事録』,1995年6月23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0/sokai007/index.html.

④ [日]文化庁:『現代社会における敬意表現』,2000年,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2/tosin02/index.html.

⑤ [日]文化庁:『平成8年度「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1996年,https://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tokeichosa/kokugo_yoronchosa/h08/.

⑥ [日]国語審議会:『第20期第4回総会議事録』,1994年6月15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0/sokai004/05.html.

（四）民主原则与敬语使用

与 1952 年相比，1990 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同，制定敬语政策的原则亦迥然不同。而且，二战以来的日语深受美国语言表达形式的影响，日常生活用语中流入了不少来自美国的表达方式。在“适应新时代”的主题下，日本国语审议会选择了当时语言学界盛行的“敬意表现”方向，以为“敬意表现富有多样性，积极认可这种多样性，我们应承认这是我国国语丰富性的一种表现，让每个人能够从中选择自己所能接受并能表达自己人格的表达方式，该做法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①。这种让民众自主选择使用与否的敬语理念，反映了当时敬语政策所具有的鲜明的民主特色。

不过，与《今后的敬语》中极力推行的敬语政策中所体现的民主主义与平等理念相比，《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有所不同，它试图在敬语政策中体现出“敬语使用的民主化”。其理论依据一如敬语委员会委员、语言学家井上史雄所指出的：“敬语使用的民主化和敬语递减的法则视为世界很多语言中存在的普遍变化，认为敬语使用的民主化与平等是一个趋势。”② 敬语使用虽有“民主化与平等”的趋势，但是在敬语政策中体现“敬语使用的民主化”的原则是把选择何种敬语的权力交付给国民。日本国语审议会做出这一决定的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动漫文化兴盛而生成的广大民众对人称代词的自主选择。在 1952 年发布的《今后的敬语》中，日本国语审议会建议男性在公共场合使用第一人称“僕”“私”，不使用缺乏敬意韵味的“俺（おれ）”。但这一建议因动漫文化的兴起而深受影响。从 1960 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漫画中青少年主人公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就从“僕”变更为“俺”。而漫画中帅气、强大的青少年主人公，不仅深受青少年青睐，且被整个社会追捧。“俺”在日语中的使用率逐步提高。但是“俺”这个来自汉字的人称代词，本为方言，因有不雅之意，故一直以来未纳入日本常用汉字之列。不过，2010 年修订《常用汉字表》中增加了该字。对此，《现代社会的敬意表现》只称：“人称代词‘俺’与‘私’，因对话人的不同关系，建议人们选择符合表现自己人格与人际关系的词汇。”③ 从而把是否使用敬语的选择权交给了广大国民。

二是与学校教育理念、敬语习得理论相伴而生的广大师生对敬语使用与否的自主选择。在 1998 年日本文化厅的调查中，77.2% 的民众认为学校教育中的敬语习得很重要。因而，日本国语审议会提出，敬语习得不仅要在国语课教育中进行，还应体现在学校生活当中。但随着人们对学者教育、敬语习得等理论的认识，学校教育中的敬语使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平等意识的驱使下，一些老师为了增进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强求学生使用敬语的情况很普遍。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容易与学生沟通，持有“像朋友一样的老师”这种观念的教师不断增加。④ 文部省对东京都内中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在老师办公室交谈时，90% 左右的学生表示对老师使用敬语，但是在走廊或上课时很少

① [日] 国語審議会：『第 21 期第 9 回総会議事録』，1998 年 6 月 24 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1/sokai009/02.html.

② [日] 井上史雄：『敬語は怖くない』，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1999 年。

③ [日] 文化庁：『現代社会における敬意表現』，2000 年，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2/tosin02/17.html.

④ 这部分参照了 [日] 国語審議会：『第 22 期第 3 回総会議事録』，1999 年 5 月 11 日，[日]https://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sisaku/joho/joho/kakuki/22/sokai003/02.html.

使用敬语。比起老师,对社团前辈和高年级学生使用敬语的情况更多一些。大多数学生虽然使用“です”“ます”体,但是使用敬语、谦语的比率很少。[①] 学校教育的确是敬语政策普及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平等教育理念的普及与接受,让学生们像过去一样在学校生活中学习和使用敬语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这就不如将敬语习得和使用的选择权交还给广大师生。

综上可知,《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的视角过于宽泛,已偏离了敬语本质问题,从而导致该政策无法解决敬语使用这一本质性问题。这一点,在该政策分布之前一些教育专业人士的咨询意见中已有所反映:“若把该政策直接公布于众,至少在教育现场会出现混乱”,“这种政策的指导无法教学生”。但是国语审议会最终还是颁布了该敬语政策,以致该政策被后人定性为“如同在读教科书,没有使用价值”。[②] 而仅仅5年之后,这一耗时4年始颁行的敬语政策便不得不迎来了再次重新审议的局面。

三、《敬语指针》

2001年1月,日本文部省更名为文部科学省,其下辖的文化审议会取代了原国语审议会,国语问题改由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审议。在2003年度进行的《关于国语的舆论调查》中,认为“需要敬语”的日本国民达到96.1%[③],敬语审议问题又一次提上议程。2005年3月30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就“关于敬语的具体方针问题”咨询文化审议会。与1993年赤松良子的敬语咨问相比,本次咨问反映了从强调“新时代”语言使用这一宽泛问题回归敬语本质问题的要求。因此,同年7月5日召开的日本第30次文化审议会分科会决定成立敬语小委员会。参照《今后的敬语》与《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日本敬语小委员会重新审议敬语问题,并于2007年2月2日提交了《敬语指针》,该政策主要讨论了以下议题。

(一)审议文献的回归

2000年出台的《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把敬语问题扩大为“敬意表现”。但2007年出台的《敬语指针》,将审议方向重新回归到“敬语”问题本身:“这次审议对《今后的敬语》中提到的敬语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且聚焦于《现代社会的敬意表现》中提到的敬语问题。”[④] 这一方向的回归,与日本国民敬语意识的变迁密切关联。

二战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迁,敬语的使用环境和日本民众的敬语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初期的年轻人,在大家庭里中随时可以听到大人使用敬语,在学校里也要时常对老师使用敬语,因而具有潜在的敬语使用意识。但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的大家庭聚居生活方式逐渐为小家庭所取代,小家庭的夫妻、亲子间不再使用敬语;学校教育中的敬语使用环境也发生变化,师生间不再强制使用敬语。结果是年轻人除了商业敬语之外,接触敬语的机会骤然减少,其敬语意识也发

① [日]国立国語研究所:『私たちと敬語』,東京:ぎょうせい,2008年,第14頁。

② [日]国語分科会:『第29回議事録』,2005年5月16日, 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okugo/kokugo_29/gijiroku.html.

③ [日]文化庁:『平成25年度「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東京:大蔵省印刷局,2013年,第14頁。

④ [日]文化審議会:『敬語の指針』,東京:文化庁,2007年,第1頁。

生了变化。根据日本文化厅 2003 年度的调查，对“使用敬语的理由”①，有 66.8%的人选择“因为能表达对对方的尊敬之意”，50.2%的人选择“使用敬语可以分清对方与自己的立场，划清界限”；其中，50 岁以上人群中超过七成选择的是前者，20 岁以下人群中选择最多的则是后者。② 可见，不同年龄段民众的敬语意识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的敬语意识正在日益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敬语指针》对敬语审议方向的调整，其实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现代社会的敬意表现》的深刻反省。对于《现代社会的敬意表现》提出的“敬意表现”概念，日本国语学者荻野贞树指出：“审议部门有意排斥表示上下关系的敬语的做法，实际上降低了社会生活中的‘标准敬语’的价值。”③ 这一概念的推行，会打破原有标准敬语的框架，助推敬语使用场合的愈加随意和敬请意识的愈加淡化。而《敬语指针》对敬语审议方向的调整，不仅迎合了 50 岁以上日本国民的普遍需求，且可强化 20 岁以下年轻一代的敬语意识。

（二）人称代词问题的重提

这次审议中，第一人称代词“自分（じぶん）”成为了议题。“自分（じぶん）”是日本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间确立下来的，曾经是日本陆军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故而与日本陆军改革密切关联。④ 因该词的军队色彩过于浓厚，在 1952 年的敬语审议中曾是热议话题，当时的国语审议会特意指出，日本国民应避免用“自分”来代替“私”。因为在《日本国宪法》鲜明的民主主义与彻底放弃武力原则下，采用军队用语显然不合时宜。但后来，“自分”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日本军队在公共场合使用该词，一些年轻人甚至有把“自分”当成自谦语使用的倾向。对此，《敬语指针》指出：“在典礼、会议、面试等场合使用‘私’比较适合，但是就具体场合而言，关于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并没有硬性规定，这与说话者的表达目的相关。”⑤ 相比于 1952 年出台的《今后的敬语》中的建议，《敬语指针》显然更充分地考虑了现代人多样的个性特征。综合而言，“朕”“俺”“僕”“自分”等人称代词在近代以来的使用情况，基本反映了日本敬语政策的这一特征。

（三）敬语分类问题的审定

传统日语语法中，敬语多分为“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三类。但这次审议中，敬语小委员会把“自谦语”又细分为两类，并把“美化语”纳入到敬语范畴，共计五类。该分类法并非敬语小委员会的独创，而是日本语言学界与敬语研究领域早已成为主流的做法。此前，敬语三分法已经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推广，并普及到社会层面；但日本学界研究发现，敬语三分法存在无法忽略的弊端，敬语五分法更为科学合理。因此，《敬语指针》公示期间，遭到了来自坚持三分法的学校方面的坚决反对，

---

① 该问题除“其他”“不知道”选项，还有 4 个选项，受访者可从中选择两个选项，这 4 个选项是：1. 因为能表达向对方的尊敬之意；2. 使用敬语可以分清对方与自己的立场，划清界限；3. 使语言表达更加柔和、人际关系更加和谐；4. 使语言表达变得更加优雅。

② [日] 文化庁：『2003 年度「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2004 年 7 月，https://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tokeichosa/kokugo_yoronchosa/h15/.

③ [日] 荻野貞樹：「簡単に使える敬語」，『日本語学』(298)，東京：明治書院，2005 年，第 63 頁。

④ [日] 木川行央：「一人称代名詞としての「自分」」，『言語科学研究』(17)，神戸：神戸外語大学大学院紀要，2011 年，第 39 頁

⑤ [日] 文化審議会：『敬語の指針』，東京：文化庁，2007 年，第 42 頁。

因为学校担心“从三类改为五类,学生们不好接受”①。

其实“美化语”“自谦语”两类,可说是日本敬语使用中必然涉及的内容。首先,“美化语”本指说话人为使语言柔和、优雅或使自身显得高雅、有教养而采用的表达形式,但有时也用于表示敬语的场合,与“郑重语”用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日本的学校教育和中学教科书中都涉及了“美化语”表敬语的内容②,只是没有列入敬语类别中。其次,“自己一方在涉及对方以及第三方的行为、事物时,将相关人员突出叙述的说话方式”与“将自己的行为、事物等,有礼貌地向对会话或文章中的人物叙述的说话方式”③,此前都笼统地称为“自谦语”;此次的细分,显然更符合“自谦语”的使用现状。因此,多次审议之后,日本敬语小委员会最终决定:“从现在的视角,重新审议敬语分类问题的话,还是应该承认敬语的五分类法。”④该做法终结了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与日本学界分类方式不统一的局面,使人们对敬语类别有了更为明晰的统一认识。

(四)敬语观念的总结

敬语起初被美化为日语之精髓,并与日本国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在进入民主社会之后,敬语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润滑剂,其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表面看,二战后的敬语问题逐渐回归到语言本体层面,敬语与日本国体的关联没有再被提及。实际上,敬语与日本国体一直密切相关,2006年日本国会的一场讨论,使这一问题再度摆上桌面。

在2006年6月8日的众议院会议中,保利耕辅提出,NHK报导中对皇室使用的敬语特别恰当,有些报纸关于皇室的报导却完全没有使用敬语;关于日本天皇陛下的报导,必须使用敬语。对此,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进行了解答。安倍首先指出,关于日本天皇陛下的敬语使用方法,因报社不同而有些许差异,这是每家报社各自商讨后的结果,政府对此无法干涉。⑤关于皇室用语,日本宫内厅早在1947年8月就与媒体达成协议,对皇室使用普通词汇范围内最表敬意的词汇,但是各报社对该协议的执行方针并不一致。日本三大报纸虽对天皇都使用“天皇陛下”的称呼,但在对天皇行程与言行的表述上,《读卖新闻》使用敬语,《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则不使用敬语。⑥其次,安倍从个人角度进行分析,以为:“天皇陛下是国民统合的象征。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若天皇陛下是我们一直编织的织锦,那我们则是织锦中的线,天皇与我们共同编织了日本历史。关于对天皇使用什么样的表达

① [日]国語分科会:『第9回敬語小委員会議事録』,2006年10月2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eigo/keigo_09/gijiroku.html.

② [日]国語分科会:『第5回敬語小委員会議事録』,2005年12月19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eigo/keigo_05/pdf/keigo_shouiinkai171215_gijiroku.pdf.

③ [日]文化審議会:『敬語の指針』,東京:文化庁,2007年,第15、18頁。

④ [日]菊地康人:『座談会　敬語の働きと難しさ』,2008年,https://www2.ninjal.ac.jp/past-publications/publication/catalogue/shin_kotoba_series/20_22/21/02/index.html.

⑤ [日]衆議院第164回国会議事録:『教育基本法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第12号,2006年6月8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6404048X01220060608&spkNum=47&current=20.

⑥ [日]松本敦:「朝日新聞における皇族の呼称および待遇表現の変遷—宮子内親王・真子内親王を例に」,『学習院大学大学院日本語日本文学』10号,2014年,第67頁。

方式，我认为因是否加入了这种情感而完全不同。”[①] 换言之，安倍认为敬语的使用与否，可以体现是否对天皇抱有崇敬之心。不过，安倍又强调，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他对报纸中使用皇室敬语的报道感到不适，但日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天皇陛下自己也不希望强制使用敬语，强制使用皇室敬语的做法与民主主义国家理念不符。

对此，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小坂宪次的观点也耐人寻味。他说：“好好学习敬语是为了传达日语的美，这关系到爱国心……刚才所说的报纸中关于皇室用语问题，不应该归结于因为是报纸的字数限制问题上。”[②] 强调皇室敬语、敬语与爱国心的关联，是近代日本政府经常提及的观点。如山下人即曾指出：“其实美化和强调敬语‘特殊性’的研究在战后亦可见。”[③] 只是这种语言国粹主义没有像近代那样成为主流。但这种敬语观在 21 世纪依旧被日本政界提及，这显然是整个日本社会都需提高警惕的事。

本次颁行《敬语指针》标题中没有添加“现代”“现代社会”等词汇，这里面蕴含了敬语小委员会的几种思考。首先，文部大臣咨问的内容为“关于制定敬语的具体指针”，《敬语指针》最能直接表达该主旨。[④] 其次，敬语分类法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时代范畴，彰显了日本政府关于敬语的基本想法。[⑤] 最后，其中蕴含了敬语小委员会希望该政策能够长久存续的愿望。在具体表述中，敬语小委员会把“现代标准”“现阶段的标准”等词以相近词汇进行了替换[⑥]，从中亦可看出其对短命的《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的反省态度。

与《今后的敬语》一样，《敬语指针》再次回归敬语本体问题，对敬语具体内容进行规范，并提出相应建议。正如常年参与战后日本语言政策的甲斐睦朗所指出：“我认为这次的《敬语指针》，对敬语的分类问题处理得特别好，如果《敬语指针》能成功取代 1952 年颁布的《今后的敬语》中的相关政策的话，该政策也有可能存续半个世纪。”[⑦]《今后的敬语》存续了近半个世纪，《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仅存续了 7 年，《敬语指针》自公布至今已经 15 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审议敬语问题的任何动向。这也侧面证明了日本社会对《敬语指针》的认可度。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先后发布的三次敬语政策，与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变革、国民思想演变、社会变迁等密切关联。首先，语言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受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战后初期日本的

---

① [日] 衆議院第 164 回国会議事録：『教育基本法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第 12 号，2006 年 6 月 8 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6404048X01220060608&spkNum=47&current=20.

② [日] 衆議院第 164 回国会議事録：『教育基本法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第 12 号，2006 年 6 月 8 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6404048X01220060608&spkNum=47&current=20.

③ [日] 山下仁：「敬語研究のイデオロギー性批判」『「正しさ」への問：批判的社会言語学の試み』，東京：三元社，2000 年，第 51 頁。

④ [日] 国語分科会：『国語分科会第 33 回議事録』，2006 年 10 月 2 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okugo/kokugo_33/gijiroku.html.

⑤ [日] 国語分科会：『第 9 回敬語小委員会議事録』，2006 年 10 月 2 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eigo/keigo_09/gijiroku.html.

⑥ [日] 国語分科会：『国語分科会第 33 回議事録』，2006 年 10 月 2 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okugo/kokugo_33/gijiroku.html.

⑦ [日] 国語分科会：『国語分科会第 33 回議事録』，2006 年 10 月 2 日，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okugo/kokugo_33/gijiroku.html.

政治体制变革直接决定了1952年颁行的《今后的敬语》,1990年代初的日本国家战略也深刻影响了2000年颁行的《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其次,语言政策的审定必须依据国民现实生活,不能过于宽泛与空洞。日本政府2000年颁行的《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就是典型的反例。它虽然反映了当时日本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但由于视角不聚焦,过于强调时代特点与人的个性问题,结果是在仅仅推行7年即不得不重新审议。最后,语言政策对社会具有绝对依附性,也有应变性。语言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语言使用意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据2021年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手机持有者占有69.3%,SNS利用率达到73.8%[①];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新的社交软件使用率的提高,敬语的使用也必将出现新的变化。早在2020年,日本政府即通过调查发现,"国语混乱"的比例比1999年减少了近20%。[②]这并不表示日本的"国语混乱"现象有所改善,而是因为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人们接触不同类型文本的机会大为增加,因而对于词典规范之外的不同表达方式也更为接纳。政府机关应时刻关注语言使用的变化,及时修订语言政策。

责任编辑:潘文竹

Evolution of the Policies on Honorifics in Modern Japan and Its Contributors

Hong Renshan Jiang Ya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imary feature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honorifics, imbued with rich political overtone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order of Jap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Japanese honorifics evolved from "absolute honorifics" to "relative honorifics" and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lubricant representing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from a product of feudalism marking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 of social classes. This evolution is closely tied up with the three deliberativ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hip in a row and the policies titled *Future Honorifics, The Manifestations of Honorific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Principles on Honorifics*, which were initiated respectively. All these policies which reflecte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and social changes lurking behind honorifics contributed to standardizing the use of honorifics.

Key words: Japan; honorific; *Future Honorific; The Manifestations of Honorific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Principles on Honorifics*

① [日]総務省:『令和3年版 情報通信白書のポイント』,2021年,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point.pdf.

② [日]文化庁:『「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結果の概要』,東京:大蔵省印刷局,2020年,第1頁。

金融与艺术的融合

——《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评介

胡 金 焱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惟我无双”,这既是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赞叹,更是文化自信的意象表现。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文化强国”,为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金融与艺术的碰撞孕育了艺术金融,二者循序渐进相互融合。但艺术金融与传统金融从理论背景到市场、资产的特征都具有较大区别,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使得艺术金融不断演化和创新。在此情境下,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的研究既是对艺术金融理论的系统研究,也是对艺术金融前瞻性的发展与预判。

欣闻张志元教授的新作《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由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有幸拜读,受益匪浅。该书共分为三个部分,上篇重视艺术金融理论基础的阐释,中篇明确艺术品投资的基本规律,下篇偏重艺术金融的风险监管。总体来看,该书对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理论创新,重视交叉融合的内在逻辑

新财经、新金融如何破题对金融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文科建设中,以交叉融合为主线的主动求变是关键,但“金融+”的内在逻辑与发展潜力同样不可忽视。金融学发展到今天,其交叉融合的学科特色充分彰显。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形成科技金融;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下,金融与环境治理的融合形成绿色金融。张志元教授所著的《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一书,可谓是拓宽金融学内涵与外延的力作。因为艺术金融恰为新文科发展中的新突破,一方面艺术资产的价值增值高度迎合了资本的逐利性,另一方面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破除了艺术资产交易的重重壁垒。

交叉融合的学科特色带来的是研究问题的跨领域、研究范式的跨常规,研究难度更是不言而喻。而在实践中,艺术品金融化创新频频受挫,使得艺术金融基础理论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一书从艺术金融的范畴与理论出发,既涵盖艺术品投资与收益,又囊括了其风险与监管,为我们讲述了艺术金融的理论脉络。该书内容兼顾了艺术金融研究的基础性与前沿性,同时兼具东方神韵与国际视野,是张志元教授近年来研究成果的高度凝练,更是对现实需求的充分呼应。

作者简介: 胡金焱,男,安徽太湖人,经济学博士,青岛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普惠金融、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二、重点突出,明晰艺术品投资的基本规律

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迅速腾飞,居民物质财富快速积累。在初期,股票、房地产等传统金融资产还能满足居民的投资需求。2008年,中宣部等多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这既是对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回应,更是对文化艺术消费与投资的有效刺激。彼时开始,单纯增值的金融资产已无法满足高净值人群的需要,兼具文化与金融属性的艺术品投资走入大众视野。艺术金融领域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践走在理论之前,在供给与需求极度不平衡下,艺术品的金融化创新"络绎不绝",而缺乏理论指导的金融化尝试又被监管强力叫停,致使艺术品市场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一书按照"理论—投资—风险"的框架,为我们揭示了艺术金融的基本规律:第一,艺术品是一种"慢资产",艺术品的投资收益具有显著的持有期效应,且随着持有期的增加,收益指数性倍增。第二,艺术品是"非对称资产",艺术品的投资收益存在杰作效应,优质作品的收益空间远高于普通作品。第三,艺术品是"情感资产",艺术品内涵的文化与金融属性决定了艺术品投资既能够得到财务收益,还能收获精神收益。第四,艺术品的投资风险也具有独特性,投资者既需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还需要足够的美育素养,否则只能是"击鼓传花"。

三、扎根前沿,擘画艺术金融的发展方向

现如今,艺术品早已不再是收藏者的"专利",而是逐步演变为新的财富管理工具。相较于国外成熟的艺术基金、艺术信托、艺术品质押和艺术品保险等艺术金融模式,国内艺术金融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艺术品市场中鱼龙混杂的作品乱象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财务回报导向的利益追逐迷失了投资者的本心。艺术产业的理性繁荣绝不是金融能够解决的,还需依靠鉴定评估、人才培养以及科技发展等多方的配合。

从现实到理论,从搜集数据案例到形成系统理论,该书凝聚了张志元教授十年的研究心血,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不仅阐释了诸多艺术金融研究的前沿问题,还具化了艺术金融发展的可能方向与路径。一方面,艺术金融本身是跨界融合的产物,但同时艺术金融想要大发展大繁荣还需要不断跨界融合,衍生出更多的"艺术金融+"产物。另一方面,艺术金融发展需要专业化,艺术品投资的特殊性决定了艺术金融发展既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又需要专业化的机构与人才。

艺术金融的交叉融合特性,决定了其研究的复合性与系统性。张志元教授在《金融与艺术融合理论及实现路径研究》中详细阐述了艺术金融的"前世今生",探寻了艺术金融的未来与可能性,用理性的金融回答了感性艺术的问题。该书既有学理性的探究,又存在实践性的思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孙继国



周海波，1958 年生于山东昌乐，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青岛大学特聘一层次教授，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文学秩序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等 15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东岳论丛》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1 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及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两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获得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另获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多次。



王刚，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青岛法学会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资源管理分会理事、青岛公共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风险治理、海洋环境治理、地方政府治理。近 5 年来，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共管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社会》《社会科学》等权威期刊以及《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50 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录。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 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项目 1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5 项，市厅级项目 10 余项。出版论著 1 部，教材 2 部。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一次，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获得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四次。

来稿须知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青岛大学主办、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一贯秉承学术办刊宗旨,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学术创新。本刊辟有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工商管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学人惠赐佳作。

一、本刊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征稿,来稿应主题鲜明、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字数 10000 字以上为宜。具体格式及参考文献注释规范见《东方论坛》官网(http://dflt.qdu.edu.cn)。

二、为便于匿名审稿,来稿请在正文中隐去作者姓名、单位等有关信息。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历、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箱。同时附上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和编号。以上内容请单独放在一页,置于正文前面。

三、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通联费等任何名目的费用,一旦采用作者稿件,会支付相应的稿酬。

四、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五、本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同行专家审稿制度。

六、本刊审稿周期为 60 天,若作者投稿 60 天后未收到本刊编辑部的任何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

七、作者文章一旦被录用发表,作者须拥有所投稿件的版权,并将其转让给本刊,版权包括本刊纸质出版、发行的权利,网络出版和文摘、转载和汇编的权利。

八、投稿方式:

本刊采用电子邮箱和网络在线投稿两种方式接受来稿。

1. 邮箱投稿

各责任编辑投稿邮箱为:

孙继国(理论经济、应用经济)qddxsjg@qdu.edu.cn

冯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dfltfengjiping@qdu.edu.cn

侯德彤(历史、法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社会学)dflt-houdetong@qdu.edu.cn

潘文竹(哲学、古代文学、文献学、体育学)panwenzhu-dflt@qdu.edu.cn

董德英(工商管理、旅游管理、文化研究、民俗研究)dfltwenhuaguanli@qdu.edu.cn

2. 网络在线投稿

进入青岛大学官方主页,点击主页下面东方论坛,进入东方论坛官网;点击投稿指南,进入投稿指南页面;点击左侧在线投稿,按照要求完成投稿 (http://dflt.qdu.edu.cn/tougao_dpzw.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17)。

编辑部电话:0532—85953730

联系邮箱:dflt@qdu.edu.cn

《东方论坛》编辑部